



引用格式:余斌. 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意义、成效及其启示[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01-15.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01-15

# 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意义、成效及其启示

## The background,significance,effectiven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余斌

YU Bin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从1921年起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有很大的关系,是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苏维埃俄国现实问题的成果。十月革命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否定小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导致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根本原因。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成效,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但是,由于今天中国的国情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当年的新经济政策来指导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能随便借鉴当年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我们可以向列宁学习,全面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苏维埃俄国;  
列宁

[收稿日期]2021-01-28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斌(1969—),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指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从1921年起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立大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联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把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允许私人经营企业,支持个体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以租让制、租赁制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坚持经济核算和物质利益原则,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发展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sup>[1]</sup>

由于新经济政策含有市场经济的内容,很多人常常用新经济政策来说明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但是,列宁采用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有很大的关系,该政策是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苏维埃俄国具体现实问题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在苏联也没有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今天,我们需要客观地、冷静地看待新经济政策。

## 一、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春,其后该党分裂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党代表会议将孟什维克派清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3月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7年俄历二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半年多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俄国。从最初的建党到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政党只用了19年的时间,从布尔什维克派独立建党到夺取政权只用了5年时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也遇到过一些曲折,但相比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十分顺利的。由于革命和革命之后开展建设的准

备工作不够充分,所以当时有人称俄国革命是早产儿。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身的发展也很不充分。20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其本身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农国家,主宰广大乡村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sup>[2]216</sup>。俄国资本主义起步时间不长,无产阶级的发展也不充分,在人口中占少数。虽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但党的力量还比较弱,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工人的工作,党在农村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沙皇俄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不足,工业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农业生产也受到破坏,粮食极度缺乏,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整个国家处于破产状态,布尔什维克利用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后,这些困境就需要由新的政权来克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迅速结束了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厮杀,转身对新生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扶持苏俄国内叛乱,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一切力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战争。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国内叛乱的战争,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新生政权早在1918年10月30日就通过了实物税法,但由于战争的压力,实物税法未能执行。战争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新危机也来临了。

这时,俄共(布)在工农兵三个阶层中组织工作不充分的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俄共(布)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叛乱,不得不利用原沙皇俄国的旧军人进行作战,尽管派遣了大量失业工人到军队担任政治委员以监督旧军官指挥作战,但是党的支部只能建立在团一级,而不能像中国工农红军那样建立在连一级。战争胜利后,大量军人无组织地复员回乡,给原本就因缺乏

运输车辆和燃料而陷入困境的运输工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而当大量军人复员回到乡村务农时却发现缺少牲畜等劳动条件,生产无法开展,不少复员军人沦为盗匪。之后,苏维埃俄国才开始像后来新中国组建建设兵团那样,组建劳动军。

其次,俄共(布)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十月革命后,地主被消灭,大耕作者和无地农民的数量减少了,中农增多了,中农在俄国农村中占了多数。但这些中农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各行其是。在反动势力的武装威胁下,这些受益于十月革命的中农愿意支援苏维埃政府打击反动势力,能够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敌人的消灭和退出国境,农民为了战胜敌人而付出牺牲的积极性消失了,余粮收集制开始受到农民的抵制。

事实上,由于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余粮收集制远没有收集全部的余粮,粮食投机倒卖十分猖獗。列宁在1919年7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今年春夏,城市工人的粮食大约只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而其余部分则不得不从自由市场,从苏哈列夫卡和投机者那里购买,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食售价的9倍。”<sup>[2]113</sup>列宁承认,“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农民充分的支持”<sup>[3]514</sup>。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由于很好地组织了农民,在当年的苏区和解放区都不存在如此猖獗的粮食投机。

1920年的粮食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余粮收集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食来恢复工业,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比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燃料危机,城市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农民经济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危机”<sup>[4]300</sup>。缺乏组织

的非党农民提出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正当列宁在1921年2月初准备满足非党农民的这一愿望时,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当月底发生叛乱,要求贸易自由和“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sup>[3]47</sup>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农民倒向俄共(布)的对立面。

更为重要的是,俄共(布)曾经派人“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sup>[4]53</sup>。这无疑加剧了组织农民的困难。

再次,俄共(布)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也不够,使得工业生产迟迟不能恢复。当然,这里面也有粮食和燃料缺乏的原因。但同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sup>[5]74</sup>。这样也就难以从农民那里交换回粮食和燃料。一些工人也去做投机生意,“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sup>[4]345</sup>,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提出的自由贸易的口号,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无产者在经济领域里不得不以投机倒把者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现”<sup>[4]305</sup>时就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特性。这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sup>[3]186</sup>。而且由于战争的原因,很多“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sup>[5]104</sup>,这些人也不具有无产阶

级特性。虽然粮食缺乏,但是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把工人组织起来去生产粮食。

最后,俄共(布)在政府人员中的组织工作也不充分。由于夺取政权过于顺利,苏维埃政府接收了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官吏。这些官僚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拖拖拉拉,效率低下,没有足够的人员监督和替代他们,担任机关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常常受他们愚弄。波兰愿意用1普特盐同俄国换1普特粮食,而俄国农民愿意用4普特粮食换1普特波兰盐,但官僚们阻碍了这种有利于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粮食的交换,从而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反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当然,在对外贸易方面,列宁仍然主张实行垄断,以便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交换最有利于恢复生产的物资并将垄断利润用于社会主义积累。

苏维埃政府本身的工作失误也加剧了困难局面。列宁指出:“到了1920年,我们的军队比波兰的军队多了,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燃料也有了(顿涅茨和西伯利亚的煤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东西我们却没有做好。”<sup>[6]367</sup>这样一来就使得本就有限的物资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在与外商做生意时,一项糖精生意就让对方赚了323%的利润。列宁得知后,自嘲地称“傻子要学习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sup>[3]277</sup>。这些工作失误表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文化修养水平不高,不具有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力,无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学习和锻炼。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sup>[3]347</sup>他还指出:“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sup>[5]332</sup>

俄国的产业分布也给经济恢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产粮区、工业区和燃料供应区相距较远,各区域所生产的物资来往需要大量的运输,

而运输车辆和燃料的缺乏,运输人员粮食供应的缺乏,以及运输系统旧管理人员的怠工等,使生产和流通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缺乏燃料,有限的黄金被用来进口煤,而不能用来进口生产煤的设备,恢复生产似乎遥遥无期。

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俄国对法国所欠下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sup>[4]59</sup>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一个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一个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sup>[4]51</sup>。列宁原来指望苏维埃俄国顽强战斗下去能够等来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这些发达的西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助俄国,但这一天他一直没有等到。这样一来,苏维埃俄国就只能通过第二个条件维持下去,而第二个条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不同的。在战争时期,面对共同的凶残的敌人,农民愿意牺牲一切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能够推行下去。但在和平时期,“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sup>[4]51</sup>。而在经济破坏、物资缺乏、生活贫困和广大农民感到绝望的情况下,“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sup>[4]51</sup>。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剥夺和赶走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但对于占人口较大比重甚至超过半数的小生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却不能这样做”,“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sup>[3]44</sup>。



十月革命后,为了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战争转向和平,苏维埃俄国曾经与德国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实行战略退却,这个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自然也就被废止了。通过这个战略退却,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和最后的胜利。因此,在经济方面同样实行战略退却,对于列宁来说并不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而且列宁也的确把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视为“赢得时间”<sup>[3]51</sup>的一个策略。

## 二、新经济政策的原理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sup>[7]</sup>

俄国革命也遇到了同样的发生退却的问题。列宁原来计划“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即农民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国家所需数量的粮食,国家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sup>[3]18</sup>。这个计划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有明显差异,可谓是一种“退却”。为了解释这个“退却”,列宁并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而是

举了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克俄军据守的旅顺口的例子。

日军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sup>[3]218</sup>。列宁认为,不能因为第二阶段采用了围攻,就否定第一阶段的强攻。这是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sup>[3]219</sup>。事实上,十月革命本身就可以看作一次强攻要塞的成功行动,检验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抵抗力量的软弱,因而不能认为俄国革命是“早产儿”,只能说这种强攻暂时不适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那里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比较长期的迄今还没有成功的围攻。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在面对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也可以同样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sup>[3]219</sup>这两个时期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开始时,俄共(布)“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sup>[3]221</sup>,设想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服从国家调节。但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采用战争手段来回应俄共(布)的这个设想,迫使俄共(布)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结果经济恶化了。到1921年春天,“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

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sup>[3]225</sup>,从而在第二个时期就需要“从‘强攻’转为‘围攻’”,“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sup>[3]226</sup>。显然,这两个时期是不能相互否定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保住了苏维埃政权,使得后一个时期有了退却的战略纵深,就好像强攻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破坏了敌人的军事设施,为围攻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强攻无效的情况下,那就“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sup>[3]219</sup>。列宁指出,与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sup>[4]50</sup>,这些“特殊的过渡办法”其实也就是退却的或者说围攻的办法。十月革命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否定小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发生退却或围攻的根本原因。余粮收集制引起农民的不满表明,这个任务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列宁不得不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sup>[3]186</sup>。这样也可以“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sup>[4]306</sup>。

列宁指出,当时的俄国国内有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sup>[4]196</sup>前四种经济成分不会因为政权更迭、国名变更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就立即转变成社会主义成分。

在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sup>[4]196</sup>。从而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sup>[4]197</sup>。

列宁上述所列举的五种经济成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层层递进的,因此,退却的第一步就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将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发展起来”<sup>[4]149</sup>。如果这一步退却还不够的话,还可以依次退却到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sup>[4]217</sup>

当然,这种退却是有限度的,它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为目的的,否则“这些小生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sup>[4]198</sup>。与政权被颠覆相比,列宁指出:“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sup>[4]199</sup>但是,

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必须面对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必须建立符合小生产者生存需要的经济条件,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正是这样的条件<sup>[4]22</sup>。只有这样,才能从农民经济中得到整个国家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以便恢复大生产。而“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sup>[4]74</sup>。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sup>[8]</sup>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发展起来曾经有一个“羊吃人”的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也需要一定的原始积累。十月革命后,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苏维埃俄国却只能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原始积累,对此,列宁指出:“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sup>[4]61</sup>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极其迫切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产生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度。”<sup>[4]150</sup>他认为,“工人国家掌握的各种手段足

以使这种在小生产条件下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主义关系只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足以监督这种关系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计算的适当方法(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sup>[4]269</sup>。列宁的这种自信来源于俄共(布)刚刚利用旧军队和旧军官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反抗。在列宁看来,“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sup>[4]230</sup>。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剥削制度,尽管国家发展需要积累,需要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剩余劳动,但不应当只给劳动者留下最必要的必要劳动,不能直接取走全部的剩余产品,对于取走的剩余产品要有相应的补偿。事实上,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也不全是白拿农民的粮食,是付了纸币的。列宁称之为“借来的”<sup>[4]208</sup>,这是因为,农民拿着这个纸币买不到工业品。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sup>[4]209</sup>。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这种交换如果从政府调拨改为商品交换的方式,那就是新经济政策。

事实上,放弃余粮收集制,农民也不会保留余粮,而是会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其他产品。列宁指出:“既然农民得了好处,摆脱了余粮收集制,可以把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拿去进行交换,那我们操作机床的工人也希望得到

这些好处。”<sup>[4]303</sup>因此,如果当余粮收集制并不能比粮食税更有效地得到恢复工业所需要的粮食时,那么放弃它也就很正常了。

为了避免同西欧断绝联系,列宁考虑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让西欧的资本家们来帮助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进而恢复俄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是“让你拿走500%的利润,而你为我们增加粮食、煤油等产品”<sup>[6]372</sup>。列宁还希望“每一项租让都将提供一些我们所无力生产的额外产品,因而我们可以拿这些产品去同农民进行交换,而不必采用税收的办法”<sup>[4]168</sup>。

列宁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sup>[4]70</sup>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大工业和农业大生产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在我国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搞穷过渡,不仅在实践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早就被列宁否定过。

最后,在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过程中,列宁注意到教育农民的问题,并在新经济政策中加以观照。他指出:“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sup>[5]367</sup>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工人或农民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和分配他们所必需的产品。产销合作社是小农或手工业者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和销售各种农产品(如蔬菜、乳制品等等)和非农产品(如各种手工业品、木器、铁器和皮革制品等等)。”<sup>[4]240</sup>列宁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sup>[5]366</sup>,但在苏维埃俄国,“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在我国的条件

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sup>[5]366</sup>。在列宁的安排下,苏维埃俄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一切商品都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工作者做生意是为了我们,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大工厂,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自己。”<sup>[4]315</sup>

综上所述,新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的辩证结合,对于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成效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意味着征粮数的下降,从而无法维持原有的财政供养人员,导致这些人员从1920年的3800万人减少到1921年年底的800万人<sup>[3]341</sup>。而征粮数的降低也“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改善”<sup>[4]145</sup>。同时,实行粮食的自由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sup>[4]63</sup>。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半之后,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sup>[5]280</sup>

除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提高农民扩大耕地和改进农业与畜牧业的兴趣外,新经济政策还鼓励振兴和发展不必由国家筹划供应大量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地方小工业。这些小工业不需要国家提供保证就能立即得到一些东西,“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某些产品”<sup>[4]176</sup>。俄国农民也积极参与到非农产品的生产之中。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列宁谈到顿巴斯的情况时指出:“生产发展得

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 30% 作为租金交给国家。”<sup>[3]227</sup>

俄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营工厂中的“工人们自己筹集燃料、原料和食品,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sup>[4]149</sup>。“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工人调到一些最好的工厂里,结果使产量大大增加。”<sup>[4]144</sup>当然,新经济政策也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以激励工人增加产量。“例如,纺织工人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得到一部分纺织品,并可以拿它去交换粮食。”<sup>[4]150</sup>但列宁对这个做法并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情况和困难才不得不这样做”<sup>[4]304</sup>。

新经济政策实行之时,虽然俄国经受了七年战争而经济困难,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起来,其国内过剩资本较少,对外资本输出的需求不大,加上俄国白卫流亡分子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鼓动,以及阻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因此,列宁虽然提出了租让的新经济政策,但很难吸引西方资本到俄国进行租让,成效不大,经过一年的努力只办成了 17 家与外资合营的公司。但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需要俄国的一些原料,同时也需要俄国这样一个市场和俄国的黄金,而且对俄贸易存在巨额的利润,例如,“亚麻在俄国值 4.5 卢布,在英国值 14 卢布”<sup>[5]220</sup>,加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家垄断集团之间存在一定的敌对关系可以利用,苏维埃俄国经过努力还是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往来,这也缓解了俄国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但美国当时拒绝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

列宁指出:“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

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sup>[5]75</sup>面对苏维埃俄国存在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了援助。例如,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 2 日致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的信中指出:“国际工人阶级对饥民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苏维埃俄国渡过和战胜了去年的严重饥荒。现在必须医治饥荒带来的创伤,首先是安置成千上万的孤儿,恢复由于饥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和工业。在这方面,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援助也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彼尔姆附近的美国拖拉机队,美国技术援助组织的农业队,国际工人援助会办的农业和工业企业,通过工人援助苏俄协会分配与认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公债——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人以兄弟般的援助来促进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这一事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sup>[5]308</sup>

新经济政策在放开商品交换的同时,也放开了纸币的发行。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应对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亏空,并积累可用于工业的资本。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揭露资本家“奖赏”退出内阁的帕尔钦斯基先生以“年薪 12 万卢布的肥缺”<sup>[9]</sup>,而到了 1922 年年底顿河粮食委员会水上警卫队违规征收在禁区捕鱼的特别许可费就达到“每网 4 亿到 5 亿卢布”<sup>[10]</sup>。列宁承认,“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 1000 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sup>[5]278</sup>。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俄国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纸卢布的通胀情况也有所好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1921 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 3 个月。1922 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 5 个月了。”<sup>[5]279</sup>

新经济政策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轻工业无疑正处

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sup>[5]281</sup>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巩固了工农联盟,而且也有效地加强了俄共(布)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在重工业方面,苏维埃俄国没有得到什么借款,“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sup>[5]282</sup>,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sup>[5]281-282</sup>。但是,商业活动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活跃还是使苏维埃俄国得到了一些资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sup>[5]282</sup>,尽管只有“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sup>[5]282</sup>。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sup>[5]75</sup>他强调,“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sup>[5]75</sup>。这表明,列宁并不是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时仍然注重为建立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进攻积累力量。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打下了基础。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周年时,列宁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sup>[5]77</sup>而七个月后,列宁就认为,“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sup>[5]302</sup>。这表明,按照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关于

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的原理去极力恢复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举措取得了加快生产发展的成效。

#### 四、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其一,制定和实施政策必须“中群众的意”。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sup>[5]109</sup>,“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sup>[5]92</sup>。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准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必须使各项工作能够“中群众的意”。

必须“中群众的意”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成果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列宁指出:“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sup>[5]301</sup>我们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还需要明确这种检验是由广大群众来检验的,而不是由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来检验的。

其二,必须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sup>[3]250</sup>他还指出:“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sup>[362]</sup>当然,要掌握商业并引导商业,进而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俄国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

顺的。列宁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不会经营”。对此他强调:“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sup>[5]80</sup>“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sup>[5]82</sup>苏联最后的失败也与此种竞赛未能最终取胜有一定的关系。列宁还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要“从头学起”。他指出:“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sup>[5]81</sup>

这表明,即便我们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正如我们引进外资那样,我们也需要加强学习,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已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sup>[5]96</sup>我们现在也在同国际资本进行竞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我们有能力在这场竞赛中取胜,但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我们还必须戒骄戒躁,继续学习和提高经济本领。当然,除向资产阶级学习外,我们还应当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sup>[11]</sup>与当年的苏维埃俄国不同,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这就要求我们要比当年的俄共(布)更加

会做经济工作,更加懂得政治经济学,以便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而承担起“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

其三,不能只凭热情做经济工作。列宁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sup>[3]176</sup>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也走过弯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些弯路表明:“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会成功的!”<sup>[3]349</sup>

提高生产力水平需要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经济效率需要缩短资本周转的时间,这些都需要科学分析和计算。列宁指出:“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sup>[5]299-300</sup>而要做好算计或经济核算,就需要重视知识和人才。列宁指出:“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sup>[3]374-375</sup>《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sup>[12]</sup>

其四，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最关心的政治。”<sup>[4]324</sup>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把经济工作作为大家的事情。列宁号召：“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sup>[3]193</sup>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sup>[11]</sup> 有些人认为，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与经济活动无关。事实上，提高这些部门的工作效率，使社会劳动成果在这方面的分配如财政支出少一些，人们花在该部门业务上的时间少一些，也能提高整个经济工作的成效。

既然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那就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各方面从事经济工作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sup>[4]232</sup> 今天我们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也应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创新，注意调动

好各方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更好发挥各级政府作用，不要随便搞“一刀切”，尤其是要允许一些具有更高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举措在一些地区先行先试。

其五，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sup>[4]151</sup> 邓小平也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sup>[13]</sup> 因此，虽然由于当前中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还需要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但决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sup>[14]</sup>

其六，要善于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列宁推行的租让是部分租让制，也就是只把一小部分同类企业或资源用于租让，希望通过这一部分租让能够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以便能够用这种先进的东西去改进没有租让的更大的部分：“我们不怕租让格罗兹尼和巴库的一部分；把四分之一格罗兹尼和四分之一巴库租让出去，我们就能利用这种租让——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只要有了根基（哪怕是用几亿金卢布换来的），我们就可以竭力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去。”<sup>[4]109</sup> 因此，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sup>[14]</sup> 的要求时，必须善于



学习和推广发挥两方面优势的先进经验,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

其七,要维护好工人的利益,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由于退向资本主义,而且“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sup>[3]366</sup>,这样不仅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里存在“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sup>[3]366</sup>,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sup>[3]367</sup>。对此,列宁要求,“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sup>[3]366</sup>。“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sup>[3]367</sup>。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工会也同样应注意这一点,在国有企业推行各项改革举措时,工会都必须充分维护工人的利益。

其八,必须注重改善民生。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应当尽力使这种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同时又要考虑到全国的经济,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比以前更迅速地恢复起来。”<sup>[4]151</sup>他还强调:“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 2000% 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sup>[4]168</sup>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应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应特别注重改善民生,使发展生产力的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强调“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sup>[14]</sup>的原因。

其九,必须掌握经济命脉。列宁指出,“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

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sup>[5]283</sup>。在苏维埃俄国,土地私有制已经被废除,即便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也是如此,“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sup>[3]190</sup>。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私有化,后来又通过合作化运动把农村土地集体化,从而避免了出现像苏维埃俄国早期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们应进一步掌握经济命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点也不担风险”<sup>[5]284</sup>,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不会出现出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好。

其十,发展人民军队,对外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由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俄国所欠下的对法国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如今中国的人民海军在亚丁湾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进行护航。很显然,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如今的市场经济早已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了,而西方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则在世界经济通道上耀武扬威,对经济活动的正常往来造成了威胁。

其十一,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sup>[5]300</sup>这里的“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指的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战略退却不等于要一退到底,退却的同时也是要尽量保持一定的进攻态势的。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后新经济政策就

没有实行下去的必要了,而苏联经济在这之后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有人认为,列宁能够正视国情,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sup>[15]</sup>。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要把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落到实处,跟是否“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无关<sup>[16]</sup>。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谈到“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同时还指出:“有人在贫困饥饿的时候按照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谈问题,他们说:如果我单独出卖粮食,就能够多赚些钱;如果我单独去弄粮食,就能比较容易地弄到。谁要这样说,谁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好走的道路,不过他绝对不会走到社会主义。停留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旧阶段上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走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要求全体人民有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组织性,需要更多的时间,会产生许多错误。”<sup>[17]</sup>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不仅仅是因为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转,而且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发展。苏维埃俄国通过召开农业代表大会无偿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还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sup>[5]263</sup>。苏维埃俄国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以及工人阶级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对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相比之下,“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现在都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在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压迫下的德国已被长期夺去了在国际上立足的资格。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压得连生意都不能做”<sup>[3]260</sup>。

## 五、结语

应当指出,今天中国的国情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既不存在用当年的新经济政策来指导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的问题,更不能随便借鉴当年的新经济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经济政策包括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有所启发的,事实上在有些方面我们今天的主张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展示了列宁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于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习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学习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列宁的这些论述,决不是或决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建立在现实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才能走通。如今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复兴之后的道路将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既不能继续以俄为师,也难以借鉴已经过时的西方文明成果,反而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向列宁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全面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

##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

- 社,2014:1.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4.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6.
- [9]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
-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38.
- [11] 习近平.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N].光明日报,2014-07-09(01).
- [1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光明日报,2020-11-04(04).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 [14]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光明日报,2015-11-25(01).
- [15]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63.
- [16] 余斌.再论准确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5.
- [17] 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7-468.



引用格式:黄炼,赵长太. 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探析: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考察[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16-21.

中图分类号:A81;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16-06

# 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探析

——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考察

## Analysis of Marx's thought of social structure

—A text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黄炼<sup>1</sup>,赵长太<sup>2</sup>

HUANG Lian,ZHAO Changtai

- 1.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社会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其对现代性社会批判的中心线索和主要内容。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变革动力、实现方式和科学建构的科学论述,马克思阐释了其社会结构思想的科学内涵,揭示了其从民族性到世界性、从传统性到现代性、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对我们认识当代全球化的现实运动和历史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社会结构;  
现实的人;  
共产主义

[收稿日期]2020-10-1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SY19033)

[作者简介]黄炼(1996—),女,湖北省利川市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赵长太(1968—),男,河南省正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革命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的深入剖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而又系统的批判,而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中心线索和主要内容。在当代世界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要科学认识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就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基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而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方法。鉴于此,本文拟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科学内涵,揭示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领会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

## 一、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是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类社会,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理论超越、“抽象的人”的前提批判,将自己的理论关注与社会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基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逐步形成的。

### 1. 对市民社会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虽然深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但其并没有沿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等抽象概念,而是从现实出发,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从抽象思维逐步转向现实的人类社会,立足现实的实践活动来反对“绝对精神”的抽象理念,赋予“现实的人”丰富的内涵来取代“自然的人”的抽象概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其奠基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思想也随之脱离了抽象的外壳和

纯粹逻辑的形式,成为其社会观中的一个具体范畴。马克思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1]502</sup>通过阐述新旧唯物主义二者立足点的不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与社会的本质联系,进而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绝对理念演进的一个过程,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以抽象的思维和逻辑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历史。黑格尔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理念,而不是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让黑格尔头脚倒置的世界观重新以脚立地。马克思强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sup>[1]513</sup>。马克思将研究视角从国家拉回到市民社会,立足于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考察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国家,由此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揭示了正是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由此就跳出了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束缚,为科学地解剖市民社会、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结构奠定了理论前提。

### 2. 对“抽象的人”的前提批判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与黑格尔所设定的“抽象的人”、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截然不同。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1]519</sup>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过程。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这些利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去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他们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类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

人类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整体,社会结构离不开现实的人的参与,其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提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人是社会存在物,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与现实性,这既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类”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思想形成的逻辑支点。社会是人独有的存在方式和人的活动结果,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人而独自存在,因为“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sup>[2]</sup>。可见,真正完善的、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现实社会关系、现实社会结构之中的人,是有生命肉体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表现自己生命生活和世界历史意义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马克思反对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而孤立地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质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sup>[3]</sup>。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现实的人孤立地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个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和他人他物的联系中、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中。

## 二、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是对现实社会本质结构的揭示,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以下着重从决定因素、变革动力、实现方式和科学构建四个方面来揭示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科学内涵。

### 1. 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现实社会生产力

现实的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物质性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是由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中,这种联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表现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社会生产

力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也是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sup>[4]252</sup>,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才能得到说明。不同的经济生产和交往方式会催生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他们发现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需求时,他们必然会相应地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而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必然会催生新的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从传统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正是社会的经济生产发生了变化,社会上层建筑才随着发生改变,相应地从封建主的统治发展到工业资本家的统治。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推进,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促使现代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不断发展,使其逐渐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 2. 社会结构的变革动力:阶级矛盾

社会结构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也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而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直接动力则是阶级矛盾。现实的人只有在社会之中并通过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而人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特定的思想,统治阶级压迫着被统治阶级,由于主体意识和客体环境双重因素的发展,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自身的发展,必然会发生阶级矛盾。在《宣言》中,马克思既肯定了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无情的金钱交易和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资产阶级利

用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和一个丰富的物质世界,通过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让资本不断增值。随着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随着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发展且达到尖锐程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会采取阶级斗争形式,而愈加尖锐和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会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直接动力。

### 3. 社会结构的实现方式: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社会结构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宣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社会结构必然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这一变化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

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结构的变化始终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人们主要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联系起来的,体现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对立;在封建社会,人们是以人身依附关系联系起来的,体现为封建统治集团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以物的关系联系起来的,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虽然形式不同,但究其本质,都属于阶级斗争,均会导致上层建筑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革命的进程。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对人类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革命,这一革命是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现实的阶级矛盾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社会形态演变的质的飞跃,是用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sup>[5]</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社会革命使无产阶级意识

到需要改变现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够使人类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 4. 社会结构的科学建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不仅批判了市民社会所遮蔽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也批判了资本现代性所束缚的人的生存和自由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这一批判具有现实性与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象。首先,资本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的这些产品需要通过交换来实现,交换的媒介从实物到金银再到货币,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资本家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让工人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从而榨取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和雇佣工人的劳动相结合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其次,资本具有社会性。资本是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物质生产所必然导致的历史结果,而资本的积累又必然导致社会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分化。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地位,是一种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力,而不是单个人的权利。正是这种绝对权力束缚着人的生存与自由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在横向和空间上不断扩展、在纵向和时间上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日益发展,人类社会结构日趋变化。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工人阶级不再是作为非主体性的力量被市民社

会所忽视,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具有历史性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形成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联合,工人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其所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突破地域性的局限,推动着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进步、现代文明等的基础性存在和决定性力量,工人阶级对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其历史目标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建立一个超越“市民社会”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 三、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马克思通过考察社会的经济活动来阐述社会结构的演变逻辑,即从民族性到世界性、从传统性到现代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

#### 1. 从民族性到世界性

自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开辟,人类社会便拉开了世界性的序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社会的物质交换需求,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到处寻求扩大产品销售的渠道,使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4]276</sup>。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止境扩张,资本家通过自由竞争和资本积累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进行物质生产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在全世界各地进行销售。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各民族的东西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财产,打破了地方或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逐渐

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普遍东西。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人类文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各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财产,当民族的精神文化去除自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之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就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总之,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不再单纯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所独有的,而是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此时,社会结构中的各个方面日益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纯粹的民族性的东西日益成为不可能,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世界性的东西。

#### 2. 从传统性到现代性

从传统性到现代性,是世界市场和工业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结构日益发展完善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既肯定了大工业的、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也肯定了人类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又肯定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合理性。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开端,而现代性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当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性因素迅速发展时,社会结构的各方面也在日益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增加,社会性的交往得到巨大发展。同时,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机器化大工业,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根基,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sup>[4]276</sup>。社会化的工业革命推动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体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发生改变,促使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从实践上来看,工业革命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使现代生产方式代替了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社会结构从单一



静态的存在到多元动态的运动的转变,从而确立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现代工业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加快了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与变革,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

### 3.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

社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现实社会矛盾运动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sup>[4]278-279</sup>,“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sup>[4]278</sup>。此时,“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4]273</sup>。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其实质就是资本和劳动、资本逻辑和生存逻辑的现实对立。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建立、自由贸易的实现、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变革,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看到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发现了资本增值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利润而剥削工人的劳动,为自身利益创造更大的可能性;而无产阶级希望通过现实的斗争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从而建构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

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人。在《宣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旧世界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建构,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前提,采取“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组织起来,把资本主义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彻底地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四、结语

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生产力、经济生产、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人类命运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利益深度融合,社会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当代全球化的现实运动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和国家根据国内外发展形势对社会结构的发展所提出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结构从民族性日益走向世界性的发展逻辑,是从多方面对“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也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建构。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彰显,这为我们科学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关系到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处境和发展命运,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结构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
- [3] 刘国胜,黄炼.马克思“人类社会”概念的逻辑建构:以《共产党宣言》为中心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59.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王丽颖.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4):105.



引用格式:毛菲. 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22 - 28.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1. 02. 003

文章编号: 2096 - 9864(2021)02 - 0022 - 07

# 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and individual'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毛菲

MAO Fei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0

**摘要:**与寄托于抽象的应然假设不同,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其在现阶段的实现应立足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之上。资本逻辑的演进路径为“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资本”,这表明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会产生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应辩证审视资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既要利用资本又要规制资本,从而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关键词:**

资本逻辑批判;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收稿日期] 2020 - 09 - 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6)

[作者简介] 毛菲(1992—),女,贵州省遵义市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资本逻辑主导之下的当今世界,关于资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人指出,资本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应全力推崇。亦有人认为,资本十恶不赦,资本和人的发展是完全对立的,由此几乎把资本等同于“压榨人的恶魔”的代名词。究竟该如何理解资本的本质?资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面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资本本质的理解,继而立足现实,以进一步审视和处理当下资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更好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个历史性的规定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和价值旨归。不同于站在虚幻的“彼岸世界”抽象地审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规定。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首先,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与物质生产条件有关,并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来认识“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501</sup>也即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sup>[1]520</sup>。由此可见,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与物质生产条件结合起来。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概括为“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

性……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sup>[2]172</sup>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立足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越来越狭隘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之中。由此,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基于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并在具体社会关系的改造中才能得以实现。

再次,马克思将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立足于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形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形态是基于人的依赖关系形成的,“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sup>[2]52</sup>;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sup>[2]52</sup>,在该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sup>[2]52</sup>;第三大形态则是在第一、第二大形式基础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sup>[2]52</sup>。由此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其必须基于前两大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阶段里方能得到实现。

总之,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三大历史阶段的剖析可以看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第二个阶段发展基础之上的,需要充分吸收第二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发展成果。这样一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与否的关键就在于第二大阶段的发展。而第二大阶段的核心逻辑是对资本的批判,由此便将问题聚焦到对资本的剖析上。

## 二、资本逻辑的演进路径

不同于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分析资本主义、对资本进行道德抨击,马克思立足于生产方式的形式特征,揭示出资本逻辑的演进路径是“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资本”的矛盾运动,进而推导出资本的历史性,由此说明资本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其一,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即商品经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的转化成为货币的过程。(1)商品简单价值形式的形成。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该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的关系,即通过价值形式被表现出来,这便是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它使得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通过外部对立——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一种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就是它自身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2)简单价值形式转化为扩大的价值形式。不难发现,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商品A同另外某一种商品发生的是个别关系,因此,A的价值固然只表现在一种商品上,但这个商品具体是什么,效果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种种的价值表现,商品的个别价值表现因而便会过渡成为可以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进而形成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3)从扩大的价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仍非价值的完成形态,因为它还未获得统一的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是未完成的。与此同时,尽管这些特殊形式的总和就是人类劳动完全或总和的形式,但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都是特殊等价形式,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这是一种具有局限性的、不统一的等价形式。因此,扩大的价值形式必然会过渡到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一般价

值形式的出现是商品世界中商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使得一种商品的价值同一切其他使用价值相区别,表明一般价值形式通过“全面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了。(4)当一般等价形式发展到“所有商品互相排挤得只剩一种商品时,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一商品便是货币。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可以看到,货币金光闪闪的“神秘面纱”背后,其本质是价值运动的结果,是一种一般等价物,货币通过与其他商品的相互关系产生社会独占权,而形成排他的普遍交换能力。

其二,从货币到资本的发展。货币产生后,价值形式运动并未结束,它继续着更复杂的运动,进而转化为资本。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其中的秘密在于一种特殊商品的出现,这便是劳动力商品。货币向资本的发展是市场上各生产者之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对此列宁曾精辟地指出:“货币……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sup>[3]</sup>劳动力成为商品,其实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普通商品相比则是特殊的。劳动力的价值与普通商品的价值类似,是指维系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保证劳动力能够存续下去的最低限度,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能创造出比其自身更大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指劳动能力的运用价值,不同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是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商品能创造出比其自身更大的价值,这便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秘密。因此,正是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决定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而“资本家购买劳动

力,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sup>[4]</sup>。概言之,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自身成为目的时,价值就成为普遍的主体,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其三,从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发展。当职能资本进一步发生垄断融合、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相融合时便形成一种新型资本——金融资本。垄断形成之前,银行只起普通中介人的作用,但当银行形成垄断而成为“万能的控制者”时,银行和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从一般信贷关系变成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新型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其形成途径主要是通过银行垄断组织和工业垄断组织互相占有对方股份而融合的。

至此,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形式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出发,通过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资本,展现了资本发展的逻辑进路。这表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其物的外衣之下的本性是:不断寻求增值扩张以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对资本作为一种历史性社会关系的揭示,展现出资本在物的外表下自身不断寻求增值扩张以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的逻辑力量。因此,卢卡奇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sup>[5]</sup>概言之,资本的这一本性决定其“以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得以具体体现”<sup>[6]</sup>,使自身获得增值、获取剩余价值。

### 三、资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作用

资本强大的逻辑力量使得其成为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消极因素。

#### 1. 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一,资本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把世界从“自在的”变成“为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2]19</sup>。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自然界不再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而成了人的对象。概言之,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出了普遍的产业劳动,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sup>[2]90</sup>。

其二,资本第一次和机器大工业自觉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为生产力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sup>[2]356</sup>,“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sup>[2]169</sup>。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它要不断提高效率以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了更强动力,并且第一次和生产力结合起来,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手段。

其三,资本把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sup>[7]</sup>,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参加众多领域、众多层次的社会交往,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单一、内容简单。而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普遍交往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sup>[8]</sup>,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sup>[9]</sup>,人类因为资本运动而连通起来,人的社会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丰富。

其四,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集中体现了资本的上述积极影响。金融资本的生产性是指其通过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具体来说,作为掌握着职能资本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将通过职能资本的革命即通过生产革命、流通革命、信用革命来进行积累。同时,金融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继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这尤其体现在二战之后金融资本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到工业4.0、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的时代。总而言之,金融资本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集中地体现了资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

## 2. 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一,导致人的积累欲的无限膨胀。作为自我增值的主体,资本必须通过不断追逐利益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对逐利的无限追求,使得人形成了远超出自身发展所需物质资料的“需要的界限”,由此导致人的无限膨胀的积累欲。

其二,引发人类生活资本化,进而导致人的异化。过去由权力、地位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血缘关系、族群关系等等都被资本逻辑所取代。资本“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10]</sup>,导致人精神家园的崩塌。人类生活的

资本化使得人处在一种非人化的状态中,人类“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sup>[11]</sup>,由此导致了人的异化,使人的一切发展在对立之中异化地进行着。概言之,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人的现实境况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背离。

其三,资本的消极作用在其最高形态——金融资本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自身成为寻租性、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的主体<sup>[12]</sup>。首先,金融资本借助垄断定价权来进行积累,直接从市民社会搜刮财富。其次,地产寻租。在金融资本时代,地产成为向市民社会征收“货币税”的部门。再次,股票投机。股票本来的意图是动员社会过剩资本来推动技术先进的企业,但在资本的裹挟之下,股票成为赌博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金融技术的载体、金融寡头剥夺中产阶级的手段。最后,通过国债制度支配公共权力。在金融资本的运动中,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越来越向非生产性逻辑转变,由此导致金融资本自身阻碍自身发展,最终造成自身危机。当资本的生产性危机出现时,其试图通过利用和加剧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即试图通过加剧剥夺性积累、投机性积累、制造资产泡沫、房地产投机、国债操纵等方式来消除危机,其结果是: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消除,反而愈加深重,由此造成金融资本内在的深刻矛盾。金融资本自身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人的操纵,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到更大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危机的转化,表明金融资本全球化已经暴露其内在的限度<sup>[13]</sup>。金融资本的统治加强了对人的操纵,造成中产阶级的贫困,由此将资本阻碍人类发展的一面进一步凸显出来。

总之,通过对资本本性及其逻辑悖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资本可以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克服人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把自然神化的现象、闭关自守的生活方式,创造普遍的产业劳动、普遍的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人与人之间全面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等。但与此同时,资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有消极影响,导致人的积累欲无限膨胀,引发人类生活资本化,并在金融资本上得到最明显而深刻的体现。资本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较大地影响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四、资本逻辑下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

基于对资本本性的认识,在资本逻辑下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应该基于资本自身的矛盾,积极寻求能够利用资本积极职能、克服其消极职能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当下历史阶段处理资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合理制度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将得以充分发挥,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则得到最大程度规制。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资本、利用资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关系,通过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sup>[14]</sup>。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充分并利用资本高效率的组织生产能力和对生产力的

巨大促进作用,鼓励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的一面,进而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克服资本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对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的逻辑,把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所垄断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转变为社会联合所有(一定历史阶段采取国有制的形式)。同时,土地等不动产资源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的积极调节,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了克服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制度潜能<sup>[15]</sup>。

综上所述,资本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其自身的逻辑悖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会产生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了资本生产性的一面、有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克服了资本的放纵性积累,避免了金融寡头的垄断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机制,从而为利用资本、规制资本、消灭资本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避免了资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背离的一面,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当下中国,应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有意识地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4:69.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5.
-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4.
- [6] 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5.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4-275.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
- [12] 宋朝龙.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J].前线,2019(2):32.
- [13] 宋朝龙.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析[J].海派经济学,2018(4):145.
-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15] 宋朝龙.全球化转向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竞争力: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经济学”专题评析[J].海派经济学,2018(4):210.





引用格式:迈克尔·R.劳伦斯,[译者]蓝江.加速崩溃?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29-38.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29-10

# 加速崩溃? 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

## Speed the collapse? Using Marx to rethink the politics of accelerationism

迈克尔·R.劳伦斯<sup>1</sup>,[译者]蓝江<sup>2</sup>

Laurence M R<sup>1</sup>, [Translator] LAN Jiang<sup>2</sup>

1. 伦敦大学 戈德史密斯学院,伦敦

2.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2013年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宣布需要加速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霸权,而不是抵抗他们。加速主义要求将眼下的政治条件推到极限,他们提出资本主义自己就会炸裂,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就能得到实现。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加速主义政治学是有问题的,他们在政治上给出了一种惰性的主体理论。如果资本主义被超越,那么资本主义的主体也会被超越,共产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主体只能通过否定和阶级斗争来实现。

**关键词:**

加速主义政治学;

马克思;

崩溃

[收稿日期]2020-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9ZDA020)

[作者简介]迈克尔·R.劳伦斯,伦敦大学研究员;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一、加速坠入深渊

马克·费舍在其畅销书《资本主义实在论》中将资本主义与1982年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电影《怪形》做了个比较:它是“一个怪兽,不断变形的实体,能够转化和吸收它所接触到的一切”<sup>[1]</sup>。该电影讲的是由麦克雷迪率领的南极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怪异而神奇的有机体,正在消化和复制他们的雪橇犬,他们感到震惊不已。接下来,这个有机体转向了考察队的队员,通过完全消化和模仿队员而继续存活着。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我们逐渐弄清到底谁是真正的人(怪形之前存在的人),谁是仿品(怪形的效果或产物,或者说怪形本身)。每一个人都是可疑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消化吸收掉,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就像资本一样,像怪形一般存活着,力量得到增强,通过宿主的身体来繁殖。没有我们,它将一事无成\*。和资本一样,怪形需要占有一切生命形式,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剩下为止,毫无例外。

在资本开始实质性消化生活中所有方面之时,出现了加速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策略。它开始呼喊,资本主义再没有任何外部,它诊断出了这样的结果,即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理论上已经广泛地瘫痪了。这样,当代加速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一方面谈到了毫无羁绊到处吸血的资本形象,另一方面指出当代左派一事无成,遭遇挫折。在面对所有生活领域都被新自由主义化时,我们说过,左派已经被掏空了,再也没有它的激进性和变革性的力量了<sup>[2]</sup>。在政治行动方面,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战略成果逐渐被牺牲,换成了直接的地方性和水平论\*\*的政治,他

们的行动似乎关心的是自我放纵和赋权,而不是改革社会结构。在这个方面,占领运动的战略性政治失败正是加速主义所指出的问题的征兆。占领运动崇拜小范围的、仪式化的、比喻形式的抗议和直接民主,导致了整体上的失败结果和崩溃,成为了加速主义所表述的理论上和力比多式的空间。这样,当代加速主义与他们的法国前辈们一样,从失败的意义与空间出发来谈问题。

作为左翼的政治理论策略,可以说加速主义首先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失败的回应<sup>[3]</sup>。在后来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绝望之下,早期的加速主义理论试图接触资本主义的力量,即那种在复制和吸收能力上无法阻挡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吉尔·德勒兹和菲利斯·加塔利将从理论上将资本主义概括为唯一打破所有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运动力量。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通过解码和解域化了现有的欲望流,让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然而,与此同时,资本不断地将解放出来的力量再辖域化,为了控制它们,为它们植入了一个抽象交换的公理。于是,正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样,这个系统不会因为其矛盾和危机而崩溃。相反,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段”<sup>[4]</sup><sup>230</sup>。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没有外部限制,只有一个内部限制,即它不断地通过重构自己来取代和超越自己。新的公理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他们将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商品,成为牟取利益的源泉。例如,在今天,全球激进主义给出的政治挑战逐渐被公司化和商品化的力量所消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激

\* 麦克雷迪了解了怪形的寄生性,在影片的最后,他和除他之外的唯一的存活队员柴尔茨只是在那里等待,在冰冷刺骨的营地等待着被冻死,这样可以确定,怪形会和他们一起死掉。

\*\* 水平论是新近一些左派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存在等级制的垂直轴提出来的。所谓水平轴,就是各个族群、性别、种族、组织都共存存在一个水平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治和治理的关系,只有彼此自治和互动的关系。

进主义的形式已经被吸纳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策略,采取了公司式的组织形式,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绝大多数抗议都变成了带有品牌效应生产的仪式性的活动。以能见度,“被看到”为目标(当然,还带有特有的标签),这已经取代了系统性变革或政治革命。与此同时,激进女性主义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也被殖民化、被品牌化、被市场化了,就像多芬公司提出为真正的美而战一样,像雪莉·桑德伯格这样的公司高层和激进分子,敦促女性倚靠她们的公司,来超越体制性的不平等和父权制。所有的政治形式似乎都内在地转化为商品形式,因为所有的问题或危机,似乎都有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令人恐惧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宣布:“资本主义的公理体系有着很强的弹性,它总是会拓展自己的界限,可以将新的公理纳入到之前业已饱和的体系中!你说你想要工薪阶层的公理,还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公理呢?好吧,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此后,利润随着薪资发展,携手并进,同进同出。即使用海豚的语言,也能弄出个公理。”<sup>[4]238</sup>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和超越市场。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革命道路在哪里?”<sup>[4]239</sup> 德勒兹和加塔利用挑衅的口气回答说,或许我们应该深入到市场运动中去,而不是抵抗市场或从市场中撤退。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即加速整个运动。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当代加速主义理论的种子。

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呼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因为批判,坏了良心或者“干了”正义的事情就死去,只有让其过剩,它才会死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韧性就是“不可触及的交换价值的公理”的结果,它可以生产和消耗所有东西,或“如你所

愿去打造出任何东西”<sup>[5]188</sup>。他认为,其后果就是所有社会形式和规范都被清除、被超越、被消解,直到“唯一只剩下了价格的标签,可以用来交换的标识”<sup>[5]188-189</sup>。这意味着,对于利奥塔来说,我们不要从对欲望的乡愁式依恋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看成一种纯粹的、对立的、外部的力量。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欲望的颂扬,在利奥塔看来很成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那里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欲望,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清白无辜的或解放的力比多的形式。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即便是死亡,资本主义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彻底根除其价值。利奥塔认为,死亡也没有给出替代资本怪物的方式,没有一种有机体或前力比多的主体不会遭受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这些说法的含义众所周知,同样,在当代批判理论中也被摒弃了:利奥塔有一段非常臭名昭著和声名狼藉的说法,他认为工人“吞咽了资本的屎,吞噬了资本的物质材料,它的金属棒,它的聚苯乙烯,它的书,它的香肠酱”<sup>[6]116</sup>。对于利奥塔来说,工人在早期资本主义的矿井和工厂的地狱般的条件下,经历了疯狂的快感和受虐狂式的爽快。他们(工人)实际上享受着对他们的身体和身份的怪异的毁灭,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解体了,而新出现了非人的郊区和旅店。这样,他们宁可受到奴役,“在数量过剩下崩裂”,而不需要被解放、被拯救,或者听从左派的道德化的倾向<sup>[6]116</sup>。总之,本杰明·诺伊斯将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的著作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螺旋”<sup>[3]5</sup>。每一个思想家不断地指责其他人没有完全看清形势,即资本主义已经囊括了一切,与此同时,他们都在寻求自己逃离这些囊括性权力的路线。

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的著作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种观点,尽管这

次是以技术未来主义和后人类的形式出现的。针对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冷酷无情的政策和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兰德回应说,要加快资本主义的速度,加强非人性与毁灭性的机器暴力。兰德的观点试图彻底地解放资本主义解域化的能力,让资本以各种方式蔓延,直至系统性地熔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拒绝承认反资本主义和资本本身之间存在区别,所有的左翼的消极性都会消失。兰德提出,政治过时了<sup>[7]274</sup>。我们不可能从政治上来区别兰德的理论和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sup>[8]</sup>。接下来,兰德说道:“走向更加不受限制的市场化进程,将社会领域撕得粉碎。”<sup>[7]55</sup>他说,整个疯狂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可以停下来,即便人类主体消失了——这个过程也得进行下去!当我们跨入机器领域时,我们正在被淘汰:“人类就像令人憎恶的噩梦一样消退。”<sup>[7]261</sup>

当代加速主义认为自己构成并延续了资本主义的修格斯重新出现的景象(或梦魇),或者说市场成为了无穷无尽的、恐怖的、无形的,最终让我们无法逃离的实体。这种看法直接承袭于兰德、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面对这只怪兽的时候,左派成为一盘散沙,十分羸弱。雷伊·布拉西耶说,今天大多数左派完全瘫痪了,毫无效率地仅仅关心那些小范围的转瞬即逝的正义和平等形式<sup>[9]</sup>。他认为,左派缺少政治上和认知上的雄心壮志,我们生活在左派祛魅和败退的年代里,当代加速主义者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声称要走出“困境”,找到一个出口。可以认为,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回应,我们必须要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内部加速前进,前进是唯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处理各种对立和过剩形式方面有着超强的恢复能力,以致我们没有其他方法

对付它。当然,提出找到一个出口,并非传统左派的看法。没有批判,没有抗议,没有占领,没有破坏,没有直接行动,没有非个体化的斗争或工人阶级的造反,根本不存在作为否定和斗争的无产阶级力量,我们再也找不到拿着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的库尔特·罗塞尔了。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合作撰写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提出传统左派的直接行动和水平论战略已经过时了:“今天左翼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坚持水平论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sup>[2]254</sup>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旧战略注定要失败,而他们只能导致更多的失败。在这里描述的“新原始-地方主义”的批判、抗议和破坏策略是过时的,是乡愁式的、最糟糕的、最无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左翼失败的标志,他们日益接纳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日趋复杂的局面和全球性。按照罗宾·马凯和阿曼·阿瓦尼西安的说法,我们今天具有的就是被掏空的左派,他们遭受了感染,“沉迷于纯洁和谦卑,在情操上更倾向于让个人得到满足的批判和抗议的仪式,以及他们的脆弱而短暂的集体形式”<sup>[10]6</sup>。他们说,左派将能量浪费在民主崇拜之上,他们将民主看作开放、协商、包容和水平化的地方化进程。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暴力已经让这种方式无法立足,它已经彻底清除了我们的未来。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我们需要做的是远离民众政治的地方主义,去建设

一个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政治学,“可以再一次开启未来”<sup>[2]362</sup>。他们说,加速主义恰恰能做到这一点,它涵括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全球性。“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就,发展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而群众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sup>[2]354</sup>甚至可以说,加速主义宣布,我们不需要抵制或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结构,相反,将其作为“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sup>[2]355</sup>。确切地说,《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然而,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对加速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含了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型、建设知识基础,还需要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平台。此外,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想让技术加速发展,同时实现那些现存技术的潜能。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来说,加速主义给出了一个目标,一个“集体自治”的普罗米修斯政治学,试图通过实验来提出一种“组织生态学”来达到这个目的。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是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本易于阅读、引人入胜的作品,号召左派要恢复建立新世界的的能力。它给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观点,超越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态和暴力状态。此外,它包含和调动了全球性、复杂性、抽象化和技术的资源,打破了知识分子左派的一些常识,从而激励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行动。然而,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和其他一般的加速主义作品的基本大纲和论断中也有些问题。下面,我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批评:(1)加速主义认为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钩了;(2)加速主义思想中弥漫着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上主体是无能为力的。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钩,需要加速主义一方面要避免主体形成的问题(《加速主义政

治宣言》采取了这个路径),另一方面要给出一个后政治的主体理论(即一种主体理论,这种主体的存在既不否定,也不斗争)。因为超越资本主义(这是加速主义者承认的目标)设定了一种集体主体的形态,通过这种主体,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发生,而主体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形式来实现,所以,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接下来我会谈谈马克思),无产阶级才具有这个特殊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阶级成为集体性的“我们”,来超越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在当代传播资本主义条件下,谁构成了“我们”却并不明朗。然而,当代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恰恰是构成集体性的“我们”,“我们”才能实现一个不同的未来社会。但是加速主义没有考察这个具体的让集体性的“我们”得以成型的生产性政治运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主体形态的政治维度被掏空了、被牺牲了,换成了诺伊斯所说的“加速主义最基本的幻想,即能够天衣无缝地将人们整合在一起”<sup>[3]103</sup>。加速主义的叙事采用了吸纳、从属和沉浸的观念,认为自己超越了政治批判、否定、斗争和抵抗。结果,加速主义理论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体。

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还可以认为,加速主义由于没有涉及主体形态理论,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实体理论,结果是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怪异的、恐怖的、形而上学式的存在,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避免,这或许实际上并未发生。这说明了加速主义的失败,摧毁了它可以带来一个新未来的能力。我的看法是,最终这些问题会让加速主义政治学无法获得成功。于是,一旦采用了加速主义的政治策略,它只会强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让我们在其许诺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 二、上街并不过时

加速主义的话语预设了加速主义和批判的脱钩,它让自己成为批判的对立面,他们追求肯定而不是否定,超越被他们戏谑地称为地方主义、水平论和抵抗的民众政治学。马凯和阿瓦尼西安写道,对资本主义唯一激进和有效的回应就是,“不去抗议、不去破坏、不去批判,更不要等待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矛盾运动中的死亡,而是加速让其断根、异化、解码、抽象的趋势”<sup>[10]4</sup>。不过,由于拒绝了批判、抗议和破坏,左翼加速主义产生了连贯性的问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不可行也不可取。抛弃否定性资源,是加速主义政治学犯下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我说过,这个错误源于对马克思的误读,消除了马克思的政治性,马克思十分强调对立和阶级斗争,而在加速主义计划的未来方向却消除了这些斗争。

加速主义将他们的线索追溯到马克思。费舍认为,若马克思不是加速主义者,那么他什么也不是。和兰德一样,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马克思就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并不拒绝现代性,也不试图颠覆资本主义的既有成就。相反,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变他的世界,他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sup>[2]353</sup>。他们说,马克思想要“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sup>[2]353</sup>。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的作品,这种解释具有强有力的支撑。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不能加速现代性及其技术成就的应用,就无法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

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sup>[11]</sup>

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唯有当现代工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必然王国之时,自由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唯有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范围,自由才能实现,在那里不再需要必要劳动。不能回头,不能退缩到前资本主义或小规模生产和生活的范围里。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技术和工具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掌握和采用技术才能实现自由。毕竟,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物质材料,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暴力、悲惨和苦难的状况,而财富的丰富过剩,意味着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分配的可能性,这将让我们过得更好。

加速主义十分喜欢用未来主义和肯定技术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不过,加速主义忽略了历史和政治进程,而只有这个进程才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历史进程决定了加速如何发生,以及谁在进行加速。加速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所遗漏的东西就是绝缘体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领域,以及革命主体的理论,而只有主体才能将人的生产活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于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内涵被掏空了。加速主义似乎想承认和利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关注,而忽略了让另一种未来可以诞生的生产关系。

若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消除马克思的政治性,并做出未来主义式解读的自相矛盾式的愿望,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在加速主义的话语中,这篇简要的文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它是第一

次喷发,是奠基性的文本,马凯和阿瓦尼西安称之为加速主义的“历史和概念谱系学”。他们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最开放的加速主义文本”<sup>[10]</sup>。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机械的“巨大有机体”巨变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利用这种机器不是用来减少工人的劳动量,相反,它成了通过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来尽最大可能剥削工人的手段。对加速主义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十分重要,因为他并不想为了修正这种状况而颠覆整个转变过程,他并不想摧毁资本主义所生产和使用的机器体系,相反,他想将机器生产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局限下解放出来。不过,对于这篇文本,加速主义没有讨论的问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为了让这一切得以发生,工人自己如何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换句话说,对马克思来说,这就是一个在冲突中出现和形成的集体主体,为了这个集体主义,必须重新改变机器的用途。

若是将斗争的力量与未来相脱钩,那么左派必定会被资本主义所吸纳。这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加速主义不可能像《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所建议的那样,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社会和经济建制,或者重新利用资本主义下由专家学者掌握的体制、技术和平台,以及左翼版本的朝圣山学社。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加速是一种站在批判和具体历史力量基础上的否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集体主体和转变的行动者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上街并不过时,甚至战场无处不在,从实体空间到赛博空间,全球地、抽象地、高度技术性地设计未来的任务,依赖于重新建构“我们”的进程,这是关于“我们”的未来。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作用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加速剂,通过斗争,革命主体成长起

来,并具有了自我意识。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斗争来推进,这些斗争独自进行,逐渐彼此发生关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全世界无产者的永久的联合”。他们写道,现代工业技术和传播网络可以让不同地方的工人更容易彼此联系,集中斗争的力量在更大范围里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工人组织形成一个阶级,继续形成一个政党。今天,在经济、技术和社会领域中的统一进程必须被彻底地重建。规训权力和福特制生产的式微,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之下的生活经验和劳动组织。原来的工厂是构成共同身份和阐释政治错误的发生点,现代已经被公司所取代,公司是一个网络,其中劳动者被无情地个人化,让其更富有弹性,也更具有不定性。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世界。不过,今天的政治斗争是一样的。斗争就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体形态的斗争,这既是地方性的斗争,也是全球性的斗争。加速主义政治理论忽略了这一点。

今天,知识分子左派的任务并不是抛弃分散的斗争和造就主体的领域,不是拒绝抗议、直接行动、游行或者将水平论视为注定失败的民众政治学的过时无效的残余物,也不是去摆脱让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我们”得以成长的场景,相反,任务是在表达这种“我们”的计划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力量,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计划,将同时在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领域里发生。麦肯齐·瓦克在对《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友善的批判中,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语义上的黏合剂,将各种冲突和斗争的点黏合在一起。从占领华尔街到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起义,再到反抗紧缩政策和学费涨价的罢工,我认为,跟随在瓦克之后,这是一个联合起来的问题,让各种愤怒和欲望形成多种多样

的具有爆裂性的关联。瓦克认为,这个关键性的策略,涉及各种反抗资本的劳动力量之间的关系。这里有组织和协调的问题。然而,加速主义拒绝了他们所谓的地方主义,转向了全球主义和抽象化的政治,在那一刻,他们需要培养出一种可以横跨领域的集体性身份和欲望的关联。

因为加速主义拒绝了阶级斗争和反资本的抗争,所以他们无法进入抗争的政治领域,因而他们对主体形态问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关注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谈谈马克思的核心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 三、回到造就主体的政治学

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谁是资本主体之后的主体?当加速主义涉及主体的生产和形态的时候,他们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语焉不详。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全篇中都谈到了发现一种“现代技术社会身体”,但很少谈到人类身体或身体的集合能够做什么或成为什么。还有,这里究竟是谁的“现代技术社会身体”?《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并没有说。此外,《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谈到了创建“真正的民主”,但基本上没有谈民众存在或形态是什么。相反,在整篇文章中,都弥散着对人民的不信任,试图削弱人民自治的能力,借用雅克·朗西埃的话来说,这里出现了对民主的憎恨。加速主义似乎制定使用自上而下的计划,(重新)编制计划,进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发地、反复无常地、无效地行动,因此,不让人民倒退到浪费能量的“新原始-地方主义的变体”。柏拉图的精英治国在这里起到了不少作用。

加速主义试图超越政治大众政治思想和行动中的地方主义(抗议、游行、直接行动、水平形式的组织等等),他们认为自己只关注于抽

象化的、复杂性的、技术性的、全球性的价值和形式。倘若说左派就是实际有效地反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权力的反霸权运动,那么,加速主义者十分推崇这些价值和形式。不过,加速主义推进这些东西,仿佛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仿佛对立和阶级斗争只是拖累一样。这样,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我们”就被牺牲掉了。由于加速主义将政治还原为技术专家和行政人员对社会领域的设计和管制,所以他们掏空了政治的内涵。

掏空政治的否定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最终导致了他们没有给出在政治上有用的主体理论,这一点在加速主义对太空旅行和逃离行星的崇拜中可以窥豹一斑。为了恢复左派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加速主义要求人们关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俄国宇宙主义观念。俄罗斯宇宙主义者尤其是尼克莱·斐多洛夫推崇这一模式,并认为左派要学会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思考是一个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它将超越地球上现存的生命形式的局限。于是,宇宙主义便采用了科幻想象力,来挑战中立本身:人类的基本计划就是想象出逃离地球的方式,来超越我们物种的行星范围<sup>[12]</sup>。换句话说,对于宇宙主义来说,地球是一个陷阱,科学技术试图让我们所有人从那里解放出来,开启更美好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在一篇更富想象力的加速主义论著中,本尼迪克特·辛格尔顿采用了行星越狱的说法,为了说明逃离我们自己、逃离我们寓居的环境的可能性和含义。在这篇论文的结尾,辛格尔顿邀请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陷入猎人陷阱的状况。为了逃离陷阱,不能靠运气,被困者需要理解它是如何陷入到自己的困境中的,必须理解它变成了什么。辛格尔顿写道,为了成为猎物,“这就是在捕猎中的一课,而这种认识是逃离陷阱的前提条件”<sup>[13]504</sup>。为了翻转局



面,被困者必须学会让自己避开猎人的视角,被困者需要通过自我变异来逃离。辛格尔顿写道:“逃离者自己需要改变:逃离陷阱的人,绝不是陷入陷阱中的人。”<sup>[13]504</sup>

与很多加速主义作品一样,辛格尔顿的思想实验非常有想象力,引人入胜,也趣味盎然。当然,强调为了逃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需要自我变异,他是对的;强调“被困者”的意识,他也是对的:“被困者”有能力理解自己及其状况。不过,意识及其形态,是一种集体产物,是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生成的东西,它并非个人知识,也不是单纯学会从不同视角去看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集体斗争和力量的问题。总而言之,辛格尔顿将政治问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从技术和生物学出发去避免阶级斗争的问题。仿佛资本主义是某种需要通过有效设计来逃离的东西。用迪恩的话说,我们或许可以说辛格尔顿抛弃了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行动,而倾向于一种普罗米修斯的方式,即通过掌握科学,来控制自己的生物形态学和行为可塑性,从而逃离他的状况。

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计划。这意味着左派获胜所需的战略(加速主义到处宣扬的战略如设计未来、建立新组织、科技再利用等)预设需要一种集体主体,这种集体主体是在与资本的具体斗争成长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就只有披着左派外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态主体。为了让加速主义避免陷入这种命运,就必须关注如何重建个体和集体主体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意味着消除我们自己的个体性,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主体(资本主义的无情的个体化、安全化、竞争性、自我中心和原子主义的个体存在物),为了实现新共产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将重新建构为一种

新的共同集体的力量。当约迪·迪恩说“共产主义主体并不是个体的集合或汇聚,而是一种对立个体主义及其附属物的力量”<sup>[14]</sup>时,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她来说,积极的集体斗争就是让我们不再是个体、生成为其他东西的渠道,即让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斗争就是彻底重构我们身体的力比多经济学,其在政策和设计的表面下运作。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渴望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集体渴望着实现集体的愿望。这就是通过否定实现的主体化形式,这样的主体化形式必将实现。这样,占领运动绝不是政治失败。

仅仅因为警察已经清场,或者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影响那时金融活动或政治政策,就认为占领运动失败了,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这就是迪恩和之前的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战斗的真正成果并不在于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是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和强化了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抗议、直接行动、游行,甚至自我关怀和关注他们的地位问题之类的实践,让政治团结得到成长,而不是丧失,给出这样的策略有助于建立反资本的集体主体。总而言之,加速主义需要将这种自我超越的过程看作反资本的政治集体任务,而不是在设计或技术能力上的一种后政治实践。的确,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和技术的过程,在范围上,它既是微观政治,也是宏观政治。不过,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完全不同于没有任何否定的加速话语。最终,牢记阶级斗争,会重新描绘出加速主义。回到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改变我们对加速的看法。向前进。加速,但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 参考文献:

[1] FISHER M.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

- native? [M]. Winchester:Zero Books, 2009.
- [2] WILLIAMS A, SRNICEK N.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Armen Avane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3] NOYS B.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 [M]. Winchester:Zero Books, 2014.
- [4] DELEZUE G, GUATTARI 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5] LYOTARD J F. Energumen Capitalism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6] LYOTARD J F. Libidinal economy [M]. Bloomington 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LAND N. Circuitrie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8] SHAVIRO S.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15 - 16.
- [9] BRASSIER 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469.
- [10]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M].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4.
- [12] FEDOROV N. The common task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83 - 90.
- [13] SINGLETON B. Maximum Jailbreak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14] DEAN J. The communist horizon [M]. New York: Verso, 2012: 192 - 193.



引用格式:田华静. 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比较[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39-45.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2.005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2-0039-07

# 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比较

##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Marxist language views of Bakhtin and Halliday

田华静

TIAN Huajing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巴赫金与韩礼德作为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语言观呈现出内在差异:在生成来源上,巴赫金从语言的社会性层面出发来形成其语言观,韩礼德则是在汲取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来构筑其语言观;在研究重心上,巴赫金重点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交往性,韩礼德则重点探讨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在理论实现上,巴赫金建构了话语理论,韩礼德则创制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此外,二者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又存在内在的互通性:在生成路径上,都是在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在研究路径上,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在实现路径上,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但是,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二者在对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键词:**

巴赫金;  
韩礼德;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内在差异;  
互通性

[收稿日期] 2020-10-26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ZZJH-383);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ZX003)

[作者简介] 田华静(1982—),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哲学、系统功能语言学。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在对语言的起源、本质和语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根本观点,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语

观。然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诞生之始却不被重视,一直被搁置于边缘化的境地,鲜有学者对其理论特质进行研究。直到近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学者们才开始逐渐碰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并将对其理论本真的系统阐释和超越发展作为己任。正是在这种研究热潮的驱动下,俄国语言学家巴赫金和英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出发,系统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本文拟科学比较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在差异,挖掘二者之间的内在互通性,以期对于我们当下全面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所裨益。

## 一、生成来源:单一促成抑或多元共筑

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主要呈现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但是对于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并未形成共识。评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巴赫金本人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语言学思想是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读过而且集中精力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若干作品中甚至还依据过他们的某些思想<sup>[1]</sup>,其语言学思想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身影。另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sup>[2]</sup>。巴赫金晚年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苏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思想时,不能把他的科学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不尊崇马克思主义。

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sup>[3]</sup>。巴赫金属于第二种类型,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其语言学思想生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语言和意识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社会的产物。巴赫金完全承继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指出,语言产生于和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际,并在人们的社会交际之中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语言进行研究,必须要始终把社会性作为其最基本的属性,注重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意识、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研究。显然,巴赫金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层面出发来探讨和构建其语言学理论的,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性,通过对传统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思想进行批判而逐渐生成的。

与巴赫金不同,韩礼德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语言的认识论基础,并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sup>[4]</sup>。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源的,主要受四个方面思想的影响:一是受其中国导师罗常培和王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罗常培和王力是中国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和方言研究专家,他们在考察和研究语言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二是受弗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弗斯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通过王力接触到弗斯的语言学思想,并进行了认真的研学。三是受苏联语言学

家的影响。苏联语言学家历来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等研究,这些研究都对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启示。四是受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影响。布拉格语言学派注重对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以及语言在交际中表达意义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的实践性和整体性。

此外,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还受到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巴赫金等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可见,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二、研究重心:语言特性抑或语言起源

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研究语言,但在研究重心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巴赫金重点研究语言的特性——意识形态性和社会交往性,韩礼德则重点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本质。

在巴赫金之前,机械论的因果范畴和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在语言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还未曾渗入。针对这一境况,马克思主义必须作出回应,科学解答语言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因如此,巴赫金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在书中指明语言哲学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中的位置,以及语言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语言现象的现实性问题,并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或现实指涉性进行了科学论证。巴赫金指出,语言是符号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

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3HaK)。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sup>[5]341</sup>。可见,在巴赫金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非外指向性(生产工具)和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两种特性。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索绪尔语言学,仅仅关注语言符号的非外指向性,而忽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这就为巴赫金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故此,他在批判和继承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但是,一谈到意识形态,大多数语言学家都会习惯地将它同阶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赋予其极强的政治性。巴赫金却不同,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与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述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其后来所形成的单一性和固定的所指,意识形态往往和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起着语义学的作用。

正是意识形态与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促使巴赫金从对话概念着手来理解意识形态。他指出,对话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的意识,一种是作为话语的形式。然而,这里的“人的意识”,是指人的一般意识,不是指苏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意识”。人的意识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意识的外壳,意识是语言的内容;但语言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且始终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创作,没有语言的参与,任何意识形态产品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同时,意识形态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和表现也都包裹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是最灵活、最细致、最忠实折射意识形态的媒体。在探讨了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之后,巴赫金还深入研究了语言的社会交往性。他指出,语言是在社会交际的生活中产生的,并且也是为人们的社交服务的,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处处都离不开社会交际这个语境。所以,语言的纯符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性。

不同于巴赫金,韩礼德重点研究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属性。众所周知,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流派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者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劳动或交际的需要,赞同语言的阶段论或语言的进化论;唯心主义者则不同,认为语言产生的真正原因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赞同语言神授论或语言天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张立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韩礼德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从人类个体的语言发展出发来探讨语言的起源。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而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潜势,语言与其他人类的行为一样,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考察人类语言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个体出发,而儿童语言的发展正好代表着人类语言的演进。可见,韩礼德立足于儿童个体语言的发展,对人类的语言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他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和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将语言看作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从本质上印证了其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达尔文主义者。

除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外,韩礼德还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sup>[6]</sup>显然,在他们的视域中,语言是由于交往的需要才得以产生的。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指出语言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幼儿交际活动和需要的增多使语言得以产生和发展。可见,韩礼德关于语言的起源和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理论,以人类的个体发展和交往互动为主线,并结合现实语境来审视和表达语言的意义,从本质

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起源观的精神要义。

此外,韩礼德还在继承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弗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注重从个体社会化的语义发生学、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语言的无意识性和语言使用中涉及的语境等角度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同时,还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可见,韩礼德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这种理论认知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完全一致的。

### 三、理论实现:话语理论抑或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如上所述,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重点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只有科学揭示和表达语言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才是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实现的根本理论。话语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和最纯粹的社会交际媒介,是巴赫金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凭借其符号结构独特的清晰性,能够科学揭示符号交际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而原有的一切关于复调、对话的理论,仅仅是话语理论的衍生形态。可见,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根本路径。

在话语理论确立之前,人们仅仅只是研究各种自然语言的历史沿革和逻辑演进,而鲜见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结构主义产生以后,人们改变了旧有的研究格局,开始注重对语言结构和体系的研究。不过,结构主义具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精神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割裂了语言发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语言研究逐渐走向死角。基于此,巴赫金提出了话语理论,内在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研究视角,把语言研究与文本研究融通起来实现对话,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只研究僵死语言而忽

视鲜活口语的弊病。同时,他还将话语理论作为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意识形态性的根本路径。他指出:“意识是在由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交际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符号材料中构成并实现的。个人意识依靠符号,产生于符号,自身反映出符号的逻辑和符号的规律性。意识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交际的逻辑、集体的符号相互作用的逻辑。如果我们剥夺意识的符号的意识形态内容,那么意识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意识只能够在形象、词语、有意义的姿势等处栖身。没有这一材料,剩下来的只是纯生理学的、未被意识奉为准则的行为,也就是未为符号奉为准则的、未为符号阐释的行为。”<sup>[5]346</sup>可见,在巴赫金看来,实现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符号。然而,符号本身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交际的物质化,其现实表达是依靠话语来实现的。因为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的媒介,“符号交际的一些基本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正是在话语的材料中能最好地揭示出来”<sup>[5]347</sup>。此外,话语还是意识形态实现的重要依托,“要知道,意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具有了灵活的和物质表现的材料。这就是话语”<sup>[5]348</sup>。但是,巴赫金又认为,话语是应对性的,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可以通过超语言学来对其进行研究,“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话语生命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当然,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sup>[7]</sup>。因为它们都研究词语,所不同的只是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所普遍具有的逻辑,而对于对话关系则抛开不问,无法把握话语的本质。超语言学则不同,重点关注和研究对话关系,同时,还在对话交际中研究话语。显而易见,话语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中是一把利器,借助于它,巴赫金开辟了各种语言学流派相互交流对话的场

域,实现了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意识形态性。

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为了实现这一理念,韩礼德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并将其作为实现这一理念的根本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建立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自然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批判的基础上,主要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部分,走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路子,把语言看作有规律的资源,其基本原理是认为语言描写的最主要的是系统而不仅仅是结构。因为在韩礼德看来,语言除具有一定的功能外,还具有折射和改造现实社会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主要来自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语义潜势。

针对语言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实现其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韩礼德作出了科学阐释,他指出,意义是在人类意识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而建构出来的,它既不存在于社会现实中,也不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人类之间辩论和协商的行为之中,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共享。从类型上讲,意义理论主要分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三种。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人际意义构建社会关系,语篇意义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中间环节。但是,这三种意义都是通过不同的基块来呈现的,概念意义依托于词汇语法层的概念基块,人际意义依托于人际基块,语篇意义依托于语篇基块,而韩礼德仅仅对概念基块构建经验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韩礼德通过对内含经验现象的成分、图形、序列与过程、参与者和有关的环境成分之间关系的澄清,使我们明晰了经验构建过程,并通过语言这一基本动力系统逐渐转化为意义。

可见,韩礼德所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知识构成经验观点的不足,实现了意义构筑经验的提升。因此,可以说系统

功能语言学将经验纳入语言范畴进行意义建构,构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和批判性。

#### 四、内在互通性:共同批判与继承发展

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尽管在生成来源、研究重心和理论实现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否认二者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存在着内在的互通性。

其一,在生成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都是在对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仅仅关注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逻辑,淡化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忽略作为自己内部生活表现主体的说话者,是一种纯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巴赫金在生成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对这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批判。他指出,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内容分离的符号系统或者规则体系,更是一种与外部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现象,其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sup>[5]409</sup>。抽象客观主义研究语言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语言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显然,巴赫金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传统的批判,凸显了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基点。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在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淡化听者在语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韩礼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语言的意义变化是交际双方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试和修正的,但这种调适和修正离不开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语法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起着引擎的作用。韩礼德这一意义产生于语境、

与行为相伴而生、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的观点,承继了巴赫金所强调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路径上,巴赫金和韩礼德都是在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二者都强调语言形成的社会性,赞同语言起源于需要和人际的互动。同时,韩礼德所强调的意义生成离不开语境,研究意义要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结合语境、语义和句法一起研究的思想,承继了巴赫金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

其二,在研究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都突破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传统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大多采用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把语言看作一套系统的规则,然后依据词语的句法位置,将词语归并到不同的范畴,并将逻辑的语法同修辞学和人类学剥离开来,强调语法是逻辑的一部分,语言的真实价值在语法的合逻辑性中得以真实体现。显然,这种研究路径,仅仅关注形式的语言,将合乎语法作为语言研究的最高标准,而忽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全是人造语言。巴赫金摒弃了这种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即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语言,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他还提出了超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当作意义资源而非规则体系,重视语言使用的合理性而非逻辑真值性。针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其不是在脱离对话的篇章和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而是在人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研究语言,即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部分。因此,他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规则体系,注重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来研究语言,重点关注语言自身的意义和功能,



丰富和发展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

其三,在实现路径上,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并将其作为社会解放力的重要表现。不管是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还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它们无不诠释着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语及其功能的分析,以及对波捷勃尼亚语言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索绪尔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充分展现了巴赫金秉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样,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是在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他看来,系统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个体发展上看,语言清楚地显露出双重功能: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反映方式,二者密不可分<sup>[8]</sup>。也就是说,语言除具有一定功能外,还具有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改造,正是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实践精神。但是,这种实践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被动反映,更是一种积极改造。

总之,通过以上对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生成来源、研究重点、理论实现与内在互通性上的系统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巴赫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关于语言的物质性、社会性与意识形态性,认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但是,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二者在对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一些不足。巴赫金在谈论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时,过度强调语言的阶级性,而淡化和否定语言的平等性,认为

语言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只要阶级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语言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是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思维符号,创造出来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缘由不是语言,而是言语活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而且研究对象和目的始终是统一的,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把人与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指出语言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与人的世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与其研究目的相分离的。

#### 参考文献:

- [1] 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199.
- [2] BRANDIST C. Review article: Bakhtinology and ideology, dialogisme[J]. Sheffield,1999:90.
- [3] SHEPHERD D. Reintroduction of the Bakhtin Circle [M] // BRANDIST C, SHEPHERD D, TIKHANOV G. The Bakhtin Circle: in the Master's Abs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18.
- [4] MARTIN J R.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118.
- [5]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M].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36.
- [8] MARTIN J R. Grammmar meets genre-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J]. The Journal of the Sydney University Arts Assocation,2000(22):47.



引用格式:殷轲.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以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为例[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46-53.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46-08

#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 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以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ake Hena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2020 for example

殷轲

YIN Lu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呈现以下特点:新冠疫情成为全年的舆论焦点;涉官负面事件减少,教育、医疗、公共道德类事件增多;网络舆情事件进入个案时代,背景因素不再主导事件的走向;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同时,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也折射出一些新问题:“信息瘟疫”干扰抗疫大局,自媒体乱象频出,网络空间的娱乐色彩日渐浓厚,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注重技巧而轻视本质。网络舆情的正确应对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发挥“舆论共同体”的作用,实现协同治理,彰显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舆情应对的根本。

**关键词:**

网络舆情;  
舆情应对;  
舆论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1-0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ZZ003)

[作者简介]殷轲(1964—),男,河南省舞阳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网络社会、社会问题。

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以来,现代性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随着人类能力的提升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风险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即便是偶发的外部性风险,最终也会演变成社会风险。例如,瘟疫是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流行病,它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一旦出现,就不仅仅是生物体的感染,更会在社会群体之间传播,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也不仅仅是局部的。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危机<sup>[1]</sup>。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社会危机,这是风险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网络社会,风险不仅是系统性的,还是媒介化的。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问题必然会在网络空间展现出来。网络舆情虽是由特定事件(议题)引发的,但不是脱离人的外在物,它是网络公共空间内围绕事件(议题)而形成的意见、态度、情绪,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网络媒介在聚焦事件的同时,也会将与社会问题相对应的社会情绪、共同心理、思维倾向激发出来。在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重合的时期,网络舆情并非事件的直观反映,

而是事件、现实矛盾、社会情绪与网络媒介的混合叠加。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一、网络舆情事件及其特点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在议题选择、事件聚焦,事件主导因素、舆情爆发力等方面均呈现不同于往常的特点。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不但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也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在居家隔离期间,网络媒介几乎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对外交流的唯一途径,即便在解除隔离之后,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型社交媒体依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新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舆论的风向标。与以往相比,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较多(见表1),且呈现出鲜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特点。

### 1. 新冠疫情是2020年网络舆情的焦点,抗疫成为贯穿全年的重大议题

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抗疫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也是民众关注的议题。河南与此相关的网络舆情事件较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有“硬核防

表1 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汇总表

时间	事件	时间	事件
2020年1月	河南“硬核防疫”	2020年7月	幼师发亲吻男童视频
2020年2月	河南严查制售“假口罩”	2020年8月	开封城管推倒卖菜老人
2020年2月	河南重罚发“疫情财”行为	2020年8月	南阳城管帮摊主卖瓜
2020年2月	河南女子抢购双黄连后被确诊染疫	2020年8月	酒店设餐饮巡视员
2020年3月	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	2020年8月	占用1.5万亩农田建养猪场
2020年4月	16年前“投毒杀人案”嫌疑人改判无罪	2020年8月	男子当街毆杀前女友
2020年4月	儿童被埋	2020年8月	早产儿“死而复生”
2020年6月	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	2020年9月	货车侧翻掩压路边捡蒜村民
2020年6月	郑大一附院伤医	2020年9月	焦作幼儿园投毒教师被判死刑
2020年7月	女子不堪家暴跳楼	2020年10月	虞城强拆伤人
2020年7月	专升本考试泄题	2020年11月	玛莎拉蒂案宣判
2020年7月	考生撕毁他人高考答题卡	2020年12月	郑州“9岁老赖”

疫”“打击‘假口罩’”“重罚发‘疫情财’行为”“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等事件。河南全民“硬核防疫”在网络舆论场引发热议,河南省雷厉风行的抗疫风格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但基层部门一些极端做法,如挖路封门、禁止外地车加油等也受到舆论的批评。从舆情爆发力来看,“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事件的强度和热度最大,影响也最为广泛。郭某某被网络舆论称为“一人害一城”的“毒王”,引发网民的人肉搜索,其家庭背景也被网民编派和揭露,引发舆论的鞭挞。郑州“毒王”事件的发酵与郭某某的自私行为有关,但也反映了民众对病毒的恐惧。在疫情传播期间,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慌乱等负面情绪,加上自媒体的过度渲染和随意加工,个体的焦虑很容易演变为社会恐慌,这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在疫情被控制之后,生物病毒的危害性大大减弱,但由其衍生的另类“病毒”却不会消失,流言、谣言的泛滥就是这类病毒在信息社会的表现。新冠疫情成为全年的舆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众对其他事件(议题)的关注,与疫情无关的事件(议题)不再像往年那样被媒介热炒。

## 2. 涉官负面事件减少,教育、医疗、公共道德类事件增多

在以往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涉官事件往往占据五成以上。这类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地方公共部门、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二是涉事地处置不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遮盖了其他社会事件,2020年河南涉官负面事件较少。由表1可知,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涉官负面事件仅有6件,占网络舆情事件的25%,与往年的50%左右相比,这类事件下降的幅度较大。从舆论影响看,“儿童被埋”事件因为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后续处置不当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事件的持续时间较长,其他涉官事件持续时

间都很短。郑州“9岁老赖”事件虽然有震撼性,但在金水区法院发布道歉信后迅速消退;“投毒杀人案嫌疑人改判无罪”事件引起人们对司法不公的忧虑,虽然引起网络关注,但舆情却一闪而过;“开封城管推倒卖菜老人”“占用1.5万亩农田建养猪场”“虞城强拆伤人”事件在涉事地通报情况、拿出处理意见后也很快消退。在涉官舆情事件减少的同时,教育、医疗、公共道德等方面的舆情事件增多,与校园欺凌、师德退化、贫富分化等问题相关的个案增长较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类事件在近年来上升较快。2020年又出现了“专升本考试泄题”“幼师发亲吻男童视频”事件等。这说明,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教育领域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网络舆情事件是对这些问题的映射。教育公平是民众的基本诉求和期待,其势必会成为网络热点话题。

## 3. 网络舆情事件进入个案时代,背景因素不再主导事件的走向

网络舆情事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事件,它不是事件与网络的简单结合,而是事件、背景、网络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背景因素,是指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和相应的社会情绪、预设立场、惯性思维、先入之见等。贫富分化、社会腐败、环境污染、粗暴执法、强征强拆等问题必然会对民众的思想、心理产生影响,形成社会的集体认同、共同感受,一旦出现象征性社会事件,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倾向、立场、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在网络媒介上形成舆论焦点。特殊事件连带着背景因素在网络上聚焦、扩散并产生群体性行为,这是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轨迹。在以往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情绪、惯性思维、先入立场、偏见往往掺杂到事件之中,舆情很容易脱离事件本身而向外扩散。例如,“天价过路费”“袁厉害”“房妹”事件,均形成了“媒介的狂欢”,与这些事件相关的蛛丝马迹都被

深入“挖掘”,从而形成舆论危机。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如2020年河南影响较大的“儿童被埋”事件,虽然舆论关注热度较高,也出现了衍生事件,但并没有像“袁厉害”等事件那样,被舆论狂轰滥炸,也没有被深度炒作。这说明,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呈现出个案特征,个案本身的特性以及后续政府应对成为决定事件走向的主要因素,背景因素虽然与事件的形成相关,但不再左右事件的走向。

#### 4. 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

影响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和持续时间的因素是多重的,除事件本身的震撼性、冲击性外,还取决于背景因素、过程性因素等。外在的偶发事件如果不触及内在的社会风险,其冲击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群体性聚集。事件背后的社会情绪、政府应对措施、网民围观程度、媒介炒作程度都会对事件的演变产生影响。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是事件、背景、网络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新闻事件那样仅仅被民众热议,它必然会引起相关部门的回应和处置。一旦涉事地相关部门介入,其一举一动就会在网络聚焦,政府应对成为重要的可变因素。如果应对恰当、互动渠道通畅,则网络围观不会持久,网络炒作也难以发挥作用,事态就会很快平息。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网络乱象的治理,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2019年“焦作幼师投毒”“官员深夜带队拆迁被撞身亡”“义马气化爆炸”“南阳水氢燃料车”事件本身有一定的冲击性和震撼性,但在当地政府发布通报后很快消退。2020年这类事件表现得更为明显,除“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儿童被埋”事件外,其他事件的爆发力都很弱,持续性都很

短,有些事件甚至瞬间即逝。

## 二、网络舆情折射出的问题

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背景下,社会风险的传播与展现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对舆论生态产生深刻影响。与往常相比,不但舆论聚焦点与舆情特点有所不同,而且网络舆情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 1. 疫情衍生另类“病毒”,“信息瘟疫”“媒介恐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瘟疫流行期间,各种杀死病毒的信息层出不穷,“槟榔抗病毒”“喝酒抗病毒”“烟花爆竹能杀死病毒”等,这些花样翻新的“偏方”对民众产生了误导。2020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联合发布研究成果,称双黄连口服液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种“体外”实验与中医辨证理念完全相悖,但双黄连却被视为“抗疫神药”,一夜之间,双黄连口服液被民众抢购一空,“信息瘟疫”的影响可见一斑,它已经成为影响抗疫乃至公共秩序的严重问题。在后疫情时代,生物病毒的危害性大大减弱,但“信息瘟疫”却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国外疫情大暴发的情况下,“信息瘟疫”此起彼伏。“毒王诞生”“数万华人拥入”“某地封城”“某地出现确诊病例”等标题新闻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新冠引发粮食危机”等信息引发一部分民众非理性抢购。“信息瘟疫”由瘟疫衍生而来,但其传染性不亚于瘟疫本身,其与谣言类似,但又不是一般的谣言,其传播基于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因此,其比一般的谣言更具传染性和杀伤力。在信息化时代,民众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于媒介,但媒介对事件的呈现并非真实的和完整的,存在狂轰滥炸、不当加工、随意捏造的问题。同时,信息化时代也是资讯泛滥的时代,会带来另类的信息封闭,为“信息瘟疫”的流行提供机

会。在世界性的疫情还没有完全被控制的时期,个体焦虑与“媒介恐慌”交互作用,“信息瘟疫”就会不断涌现,需要认真对待。

## 2. 自媒体乱象频出,网络环境受到污染

2013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网络水军及造谣网络大V的治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少数人裹挟大众舆论的状况基本消除。净网行动净化了网络环境,对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移动网络时代的来临,各种新型媒介不断涌现,信息传播方式、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自媒体乱象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网络直播低俗化。网络主播为了吸粉、获得打赏,进行伤风败俗乃至色情暴力的表演。“‘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事件就是这类问题的典型。“滴滴司机”“女乘客”“性侵”等成为吸引眼球、获得打赏的噱头,这种自导自演、以淫秽直播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恶劣。二是公众号的营销色彩浓厚。公众号与营销号的不同在于前者有公共、公益的内涵,不应该打着公共的旗号牟取私人利益;但在现实中,公众号却异化为隐秘的营销号,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为刷流量,利用民众的焦虑和“义愤”发布煽动性言论;为博关注、赚粉丝,打着“正义”的旗号渲染民粹情绪,搞道德绑架;为吸粉、博取点击率,打着“爱国”的旗号,发布类似于“某某国要求加入中国”的低俗新闻,这些都是公众号异化的表现。在“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事件中,一些公众号强蹭热点,利用民众的恐慌情绪,编造和传播谣言,毫无根据地将郭某某塑造成“贪官”后代,刺激民粹情绪。在“货车侧翻掩盖路边捡蒜村民”事件中,村民捡前一辆货车侧翻后遗落的大蒜行为被一些自媒体说成是哄抢大蒜,并将后一辆货车侧翻说成是哄抢行为所致,这种编造新闻赚取流量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自媒体本来可以发挥正面监

督作用,但由于流量、关注度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正面效应被淹没在大量的虚假信息之中。三是微信、抖音、新闻APP等社交媒介“圈层化”现象严重,侵蚀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网络时代的特征是信息开放,但技术上的开放并不一定带来认知的开放,反而有可能带来信息的“圈层化”。由于社交圈子化、信息获取定制化,加上一些新闻APP利用算法选择性发送信息,人们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封闭,片面认知不断被强化。大量涉猎和阅读,反而造成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极端化、非理性的话语表达盛行<sup>[2]</sup>,这是自媒体时代独特的现象。

## 3. 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足,网络空间的娱乐色彩日渐浓厚

网络空间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封闭性和界限,实现了互联互通,消解了现实社会中地位、身份、职业门槛,为不同地域的群体提供了交流、碰撞、沟通的平台。网络技术造就的全新交往媒介改变了社会交往形态,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任何人只要掌握基本的设备和技能,就能进入这个空间进行交流、发表意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成为公共交往的平台,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网民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却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高涨,相反却呈现回落的态势。手机游戏快速发展,线上娱乐方式不断更新,占用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此同时,微信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交平台<sup>[3]</sup>,朋友圈交往取代了公共交往,信息接收渠道越来越狭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开始受限,网络空间逐步向生活娱乐靠拢。网络空间娱乐化色彩日益浓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网络舆论的公共性,其突出表现是:猎奇式心态开始流行,对怪事见怪不怪,情绪性因素大于理性探究,从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这一点。网络舆情形成后,网民的围观、参与、评论都大不如以往,如果没有传统媒介的跟踪报道,舆情便会迅速消退,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开始弱化。

#### 4. 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存在注重技巧而轻视本质的问题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舆情的应对上下了很大功夫,应对和处置能力逐渐提升,封、堵、捂、压、瞒的应对方式不再流行,集体为个体买单的情况大幅减少,次生舆情也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旧习气并没有完全消失,舆情应对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政府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但地方或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却存在一个误区,即注重技巧而忽视本质。“持续监测、准确研判”、“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抓住“最佳48小时”、“统一发布口径”、“找到舆论关切点”、“用好网评队伍”,这些技巧和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被经常提及,已经成为政府舆情应对的基本知识,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应对中,知识和技巧并没有被用好,在特定的案例中,技巧和知识甚至成为旧习气的附属物。实际上,舆情应对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没有理念的更新,没有直面是非曲直的坦荡态度,不相信民众的良知和智商,而仅仅以消除负面影响为应对的出发点,技巧和方法同样可能被用歪。在原阳“儿童被埋”事件中,舆情监测不可谓不完善,信息发布不可谓不快,发布口径也不是不统一,但却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次生舆情,“打记者”成为影响地方形象的另一个严重事件,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二次伤害。这说明,技巧、方法若与本质相脱节,舆情应对就不会进入正确的轨道。舆情应对的根本在于还原真相、取信于民<sup>[4]</sup>。只有在本源确立的情况下,应对技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 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应对理念与策略

在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重合时期,网络舆

情事件频发是一种常态,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更是如此,但舆情事件出现之后的政府应对却是一个能动的可变因素。如果应对得当,是非曲直彰显,社会风险会借助于事件而释放,社会负面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如果应对失当,则会将矛盾引向政府部门,演变为公共舆论危机,造成社会风险和负面情绪的积累,影响政府公信力。

网络舆情的正确应对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在协同治理理念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垂直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政府是舆情应对的主导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网络舆情的形成是各个舆论主体围绕事件(议题)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原因与影响是社会性的,其治理和应对需要社会共治<sup>[5]</sup>。将网络舆论看作大众对政府的意见,将舆情应对或治理视为政府对民众意见的矫治,这是人为地将政府与民众分开,无法真正解决舆情的变异与失真问题。舆情与实情的脱节,并非管理者没有控制好被管理者,而恰恰是“舆论共同体”(多元主体)割裂的结果。如果“舆论共同体”不能共同治理舆论,被割裂为控制者与被控制者,那么,舆情就不可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之上。信息技术架构的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水平性、多中心、互动性的特点,单向垂直性控制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机制以适应技术革新带来的变化。如果停留在“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的模式之上<sup>[6]</sup>,网络舆论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技术革新为契机,以新促新,推动理念和方法的创新,网络公共空间的正面效应就能够彰显。

#### 1. 以彰显是非曲直、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舆情应对的根本

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与应急管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舆情应对方法

也成为其必修课,然而当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应对失当却时有发生,其原因不在于没有掌握必要的应对技巧,而在于应对之本的欠缺。舆情应对分为应对之本和应对之术,前者是手段、方法的依止之处,后者是技术性手段。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虽然有身份、角色的外在差异,但事件有着本来的是非曲直,这是一切共识建立的基础。网络舆情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与实情不相符合,但是其不可能长期偏离实情,只要去除私心杂念,不偏不倚,以真诚的态度去应对,网络舆情就会回归真相。彰显本来的是非曲直,公正解决舆情所反映的问题,这是治理理念的落实,也是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本出发点。只有明确了这一根本出发点,应对能力才会真正提高。如果不相信民众的理性和良知,将舆情应对仅仅视为搞定舆论、平息事件,再高明的技巧都无法发挥其正面的作用。摒弃搞定思维、对立思维,消除“术治论”习气,解决问题而不是搞定问题,网络舆情才会得到有效治理。网络舆论需要进行引导,但引导不是以先入之见去“矫正”舆论,而是主体之间在追求真相和公道的基础上相互引导。没有探究真相、彰显公道、解决问题的态度,即便是掌握了预警、监测和回应技巧,网络舆情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平息。

## 2. 区分公众号和营销号,发挥自媒体的正面效用

公众号与营销号的区别是,前者是非营利性的具有公益内涵的自媒体,而后者是被市场逻辑支配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介账号。前者创作、分享的目的是表达诉求、维护社会公正,后者则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的。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出于营销目的的公众号,一些本来以创作、分享为目的的公众号也为了追求流量带来的利益而异化为营销号。媒介账号、公关公司、网络平台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媒介大号追求流量,

公关公司以“刷量”营利,网络平台也从广告主那里获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的经营活动严重受损,自媒体传播内容日益低俗,公共利益无从谈起。网络公共空间被市场化,其结果必然是民粹情绪上升、舆论极化和品位的下降。舆论环境恶化的问题不解决,谣言、流言、“信息瘟疫”泛滥的状况就无法被遏制,自媒体的正面效应就无法发挥。解决网络公共空间的异化问题,当务之急是规范广告行为,区分公众号和营销号,对其进行分类标注,斩断公众号营利的链条。只有保证公众号的公共性、公益性不被商业资本侵蚀,网络舆论环境才能得到改善。

## 3. 改进信息发布方式,构建良好的互动沟通环境

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协同中最为关键的粘合剂<sup>[7]</sup>。网络公共空间是一个水平式、开放式的交往平台,垂直性单向信息发布模式在网络时代已经难以发挥作用,迫切需要在技术的平等性、交互性基础上实现内涵式提升,建立多维度、全方位的互动与沟通机制。网络舆情事件出现后,不是搞一次简单的新闻通报就了事,独白式、无细节、无证据的信息发布无法满足民众探究真相的要求,互动沟通应该成为新的信息交流方式。互动沟通的本质在于通,在于发现各种意见、态度背后的问题,从而做出合理的修正。话语沟通的有效性并不是因为话语自身具备理性,也不是因为交往本身蕴含着真理,而是因为话语沟通是与人的理性和良知联系在一起的。真相、公道与公开、理性沟通的舆论氛围相适应,而强辞、谣言、流言和情绪的鼓噪却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盛行。在公开、理性的舆论氛围中,各种偏私的观点、歪曲事实的言论、过激的意见就会被看得清清楚楚,不会持续地蒙蔽人的双眼。相信民众的良知和理性,拓宽互动渠道,构建良好的互动沟通环境,让每个主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能够形成基于真相和



公道的公共舆论。

#### 4. 将清理淤堵作为舆论引导的原则,摒弃围堵式引导方式

舆论引导与河流引导相似,其基本原则是清理淤堵。如果不顺应人性、人情,不畅通人心,所谓“舆论引导”同样会带来祸患。在舆情事件之上的意见差异和对立,其实类似于河流的淤堵。本有之明被外物所遮蔽,事件之上附着了私利、私意、情绪、先入之见,真相和公道就不能显现。若清理这些障碍,舆论就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之上。因此,舆情失真变异,其原因不是没有公道,而是人心本有之明被外物所遮蔽,无法发挥作用。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顺性而导,则道义通流,舆情自然回归实情。因此,舆论引导不是防人之口,不是操纵人们的意识、强行为事件定调,不是构筑堤坝而将舆论引导到某个方向,而是清理淤堵、通顺人心,还原本来的是非曲直。舆论需要引导,但却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引导,而是舆论主体相互沟

通、消除主观遮蔽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宋林飞.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原则与指标体系[J]. 社会学研究,2020(4):46.
- [2] 葛明驹.“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主导舆论的机制及其治理[J]. 东岳论丛,2020(5):118.
- [3] 唐云锋,孙萍萍. 圈层化连接、虚拟公共场域与微信舆情治理[J]. 学术界,2021(2):171.
- [4] 童星. 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路径[J]. 学术月刊,2015(10):113.
- [5] 殷轲. 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 电子政务,2017(7):11.
- [6] 汤景泰.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2):116.
- [7] 喻国明. 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J]. 新闻界,2020(5):13.



引用格式:王天笑,邓静静.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与结构要素探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54-61.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7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54-08

# 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与结构要素探析

## Analysis on the deductive process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of network accountability

王天笑,邓静静

WANG Tianxiao, DENG Jingjing

郑州轻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的背景下,网络问责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成为新时代扩大公民参与、强化社会监督、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助推力量。作为一种全新的问责范式,网络问责在特性、触发模式、演变过程、结构要素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模式。网络问责具有明显的平等、开放、交互、便捷等特性,其演绎进程主要表现为问责问题的曝光、问责信息的积聚、舆论压力汇聚、形成问责结果等阶段,其结构要素可以分解为主体要素、内容要素、客体要素、助推要素、保障要素等。对网络问责演绎进程与结构要素的精准把握,有利于构建网络问责的优化机制,推动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网络问责;  
演进过程;  
结构;  
要素

[收稿日期]2021-02-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ZZ00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8-ZZJH-606)

[作者简介]王天笑(1981—),男,河南省郸城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社会治理;邓静静(1993—),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sup>[1]</sup>。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话语权在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分配不公平的状况。在此背景下,网络问责在我国快速发展,成了网络时代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推动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渠道。“躲猫猫”“天价烟”“70码”“平安经”“掌掴书记”等问责事件成了众所周知的公民网络问责标签,展现出了较高的问责效率和民主价值。同时,作为一种全新的问责范式,网络问责也面临着过度问责、虚假问责、迫害性问责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责异化问题。如何以健全而有效的举措消解网络问责的困境与风险、促进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成了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成了学界较为关注的理论问题。

## 一、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有关网络问责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对网络问责这一新范式内涵的研究。周亚越等<sup>[2-3]</sup>从民主政治的高度论证了网络问责在网络社会存在的必然性,指出网络问责虽然是一种新的问责范式,但其并没有超出传统民主参与的范畴,而是公民问责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司林波<sup>[4]</sup>认为,网络问责并不是一种独立的问责形态,而是与行政问责密不可分的一种特殊手段,其是利用网络舆情对官员的不当行为进行追责的活动;宋涛<sup>[5]</sup>通过对2003—2012年135个网络问责案例的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网络问责在发起方式、议题设置、议题传播等方面的创新本质;刘力锐<sup>[6]</sup>认为,网络问责

具有明显的抗争属性,社会行动者在网络问责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表演特征。二是对网络问责的运行过程与结构要素的研究。肖滨<sup>[7]</sup>认为,网络问责的过程包括责问、回复、奖惩三个环节;王敏<sup>[8]</sup>以政治系统理论为分析工具,把网络问责的过程分为网络表达及其输入、网络问责议题的形成、网络舆论压力的积聚、政府对网络舆论压力的反应、政策行动的输出与反馈五个环节,并详细分析了网络问责的各要素在各个环节的作用及其互动过程。三是对网络问责面临问题的研究。王慧敏等<sup>[9]</sup>从问责的主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分析了网络问责暴力化倾向及其原因;刘力锐<sup>[6]</sup>在把我国网络问责形态总结为网络曝光、网络扒粪、网络审判三种网络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问责在诽谤、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方面面临的法律风险。四是对网络问责路径的研究。谷茵等<sup>[10-11]</sup>认为,应从提高网民素质、加强网络媒体自律、完善政府对网络问责的监督、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构建等途径着手促进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冯勇等<sup>[12-13]</sup>指出,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对网络问责主体、问责平台、问责客体各个环节的制度规范,以及确立网络时代的民主理念、保障决策进程中公民的充分参与等。

综上,学界对网络问责问题已有一定研究,形成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网络问责演进过程与结构要素的研究还相对匮乏,而对网络问责进程与结构要素的精准把握恰是规范网络问责发展、提升网络问责绩效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拟在阐释网络问责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与结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 二、网络问责的内涵与特征

只有先了解事物,才能了解事物的过程;只

有先了解事物的本质,才能发现深藏于其中的变化。对网络问责问题的研究也要先了解其内涵与本质,在精确把握其内涵、特征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过程、结构要素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 1. 网络问责的内涵

作为一种全新的问责方式,网络问责必定有着与传统问责方式不尽相同的内涵和本质,呈现出全新的特征。“问责”之“问”乃追问、追查、追究之意;“责”即责任,既包括主观责任,也包括客观责任。“问责”即追究责任之意。从结构上来看,“问责”应当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依据、问责程序等要素构成。因此,“问责”即指问责主体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针对问责客体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要求问责客体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行为<sup>[14]</sup>。

网络问责是网民基于互联网这种新的平台在网络场域对官员(在职或离职)的不当言行进行追责的行为。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构成网络问责的几大要素:其一,网络问责的主体是网民,是通过电脑设备或手机进行网络活动的公民;其二,网络问责的客体是承担或是曾经承担过公职、拥有一定权力且承担相应责任的人;其三,网络问责的事由是问责客体职、责、权的履行情况,具体包含其政治、道德、法律、廉洁、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其四,网络问责的目的主要是追责,即让具有不当言行的官员承担相应的责任。从网络问责的结构要素来看,其与公民问责的差别不大,但这些要素在网络空间组合方式的改变,又使网络问责呈现出与公民问责截然不同的特征。因此,在理解网络问责时既要把它与公民问责等传统问责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又要把它放在网络空间进行全新考察,做到既不脱离传统又不违背现实。

### 2. 网络问责的特征

网络问责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平等性与开放性。网络空间打破了精英阶层通过传统媒体控制话语权的局面,赋予了普通民众更多、更平等获取、分享、发布信息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sup>[15]</sup>。在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下,信息的发布与获取较多集中于具有较高学识、较高社会地位、物质条件相对丰裕的精英阶层,当涉及政治层面的信息时,这种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介对信息的垄断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信息的掌握与控制,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广阔的获取信息、分享信息、发布信息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性,一方面,表现为入网门槛较低。在科技高速发展和教育不断普及的今天,入网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简单。只需要具备简单的网络设备、较低的经济条件、较低的学识,就可以在网上自由获取与发布信息。另一方面,表现为话语分量的均衡。在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发声能力大大强于普通民众,其所发出声音的分量也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精英阶层发出的声音往往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其诉求也更容易被纳入政策议程;而具有数量优势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却很微弱,很容易被决策层忽略,利益诉求难以实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在网络空间里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的发言权,精英阶层在网络上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必然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网络空间实现了发言权、影响力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均衡分配,精英阶层想要垄断信息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的,话语的民主化意味着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sup>[16]</sup>。

其二,交互性与便捷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信息发布者与信息受众之间缺

少即时的沟通,这也就几乎切断了信息受众对信息发表意见和建议、表达看法的通道。网络空间可以很好地弥补这种不足,使信息发布者和信息受众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你对别人的信息进行回复的同时,自己也成了信息的发布者。网络的这种交互性特征为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通过网络进行有效、便捷、即时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方便。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信息传播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信息可以瞬时传遍地球的每个角落<sup>[17]</sup>。

其三,虚拟性与现实性。所谓虚拟性是指公民在网络空间进行信息的发布、传播等活动时,并不必然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其署名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随便设定或者由电脑随机生成,其身份是虚拟的。同时,网络空间也是虚拟的。网民身份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为网络问责主体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伞,可以让网民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涉事者的报复与迫害。情景是虚拟的,而体验与功效是真实的;空间是虚拟的,网民之间的互动却是真实的。

### 三、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与结构要素

费斯勒曾指出,发自内部地心甘情愿地服从、目标明晰、监督有效、制裁有力是实现行政责任过程中控制系统必不可少的四大结构要素<sup>[18]</sup>。通过网络问责,以自下而上的外在压力实现行政责任是实现行政责任的诸多路径中的一种,其与传统行政问责的控制系统有不少交集,也会涉及自愿服从、标的确定、监督与制裁这些结构要素。但是,作为一种新的问责方式,网络问责有着自身的特质,其在触发模式、演绎机制、演变过程、结构要素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问责范式。

#### 1. 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

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其一,问题曝光。问题曝光既是网络问责的起点,也是网络问责的触发机制。根据网络问责主体是否有举报的实质意愿,可以把网络问责问题的曝光方式分为无直接问责目的的问题曝光与有直接问责目的的问题曝光。在第一种曝光方式下,曝光人可能出于好奇、炫耀、引起关注、打趣等心理,把相关事件挂在网上,网友经过细心的观察、解读、分析之后发现问题并对之进行声讨和质疑,且这种声音在网络空间被不断进行复制传播,影响越来越大,进而引起普遍关注。在这种曝光方式下,初始曝光人并无意问责,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例如,2009年湖北省宜城市政府网站发布其市长下乡视察的新闻照片,发布该消息的目的本是赞扬领导工作认真、勤奋的,但该照片被转发到“凯迪社区”后,网友对其视察过程中专人为其打伞的场景所透露出的官僚作风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声讨,随后演变为网友对其短时间内的快速升迁进行质疑并曝光其硕士论文有抄袭嫌疑,进而引发广大网民对当时湖北省最年轻市长的声势浩大的问责。在第二种问题曝光方式下,问责目的直接意图明显,即曝光时有明确的问责指向,其实质是一种网络举报,如“史上最无耻的公安局长”“最无耻的纪委书记”“掌掴书记”“平安经”等。另外,根据网络问责问题的性质,又可以把其分为焦点事件、政治谣言、官员不当言行、宣泄型等问题曝光方式。

其二,信息积聚。在相关问题通过网络曝光之后,即网络问责的过程被相关事件激发之后,网络问责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网络问责信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积聚,形成磅礴的民意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有些网络问责问题,事实比较清楚、情节清

晰、真相明了。此类事件经网络曝光之后,短时间内就会积聚起汹涌的民意,出现一边倒的舆论指向,形成强大的、较为一致的舆论压力,问责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结果。而有些问题被曝光之后,由于事实不清、情节复杂,需要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较为开放的大范围讨论,网络问责的进程才能延续下去。这时,网民们会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元性、互动性、即时性特征,从全国甚至是世界的范围内掀起针对相关事件的话语狂欢,相互交流观点、尖锐表达看法、深入挖掘信息、力求挖掘真相,从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网络公共领域的讨论高潮。同时,对问责对象其他相关信息的深入挖掘,往往会获得推动问责事件不断前进的意外发现。通过不断质疑、释疑、对相关信息的过滤,网民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与看法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在讨论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网民们会对该事件形成若干个相似或相同的观点,不同的网民根据自己的偏好与兴趣围绕着不同观点形成深度讨论的问题子领域。例如,在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中,事件主人公李某明狱中死亡,警察宣称是其在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而死的。后经过网民对相关信息的不断挖掘、汇聚、质疑,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李某明并非与狱友玩游戏时意外死亡,而是相关管理人员没有认真执行公安部监狱管理的相关规定,以致形成牢头、狱霸。在被关押期间,李某明多次遭受牢头、狱霸的殴打、虐待,身受重伤医治无效而亡。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和对事实真相的不懈追求,最终揭开了“躲猫猫”的骗局。与此相似的还有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经过网友的广泛讨论和不断的质疑与释疑,整个事件出现剧情大反转,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大讨论之后,事实真相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此可见,网络信息的积聚是网络问责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特定的问责事

件就难以真正展开,其在整个网络问责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其三,形成舆论压力。网络问责是典型的下问上责,草根性特征明显,其优点是可以激发网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其本身并没有直接处理问责事件的权力,网络问责的效果依赖于具有正式权力的政府机关等权力部门,所以,其是以外在压力触发内部行动的问责典型。但是,政府管理的官僚特性总是倾向于把公民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其会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千方百计地对外——尤其是对那些对其持批评意见的群体隐瞒其所知与所为<sup>[19]</sup>。要想通过外在的压力触发行政部门的问责程序、不断推进问责进程,就需要外在压力强大到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并促使其下定决心去实施问责行为。因此,网络问责的成效有赖于其在现实社会所能引发的关注,这时,形成舆论压力就显得极为重要。

而实际上,网络问责舆论压力的形成是一个信息不断积聚的过程。在问责事件被曝光的同时,压力就已经出现,只是这时强大的舆论场域还没有完全形成,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也相对较小,还不足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更难以触发问责程序。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发酵、参与人员越来越多、人们的意见渐趋一致、共意逐渐达成,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对相关事件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最终会触发问责程序。例如,2010年发生在辽宁省的集体下跪事件,刚开始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甚至是被有意地忽略。但是,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发生在地方的群体下跪事件逐渐演变为全国性事件,形成了千夫所指式的舆论场域,最终促成了群众诉求的满足和对相关人员的追责。网络问责虽不具备强制性的、以权力监督权力的资格,但可以用其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把问题推到世人面前,触发权力对权力的监督程序<sup>[20]</sup>。

其四,形成问责结果。正式问责程序被触发之后,网络问责事件即进入体制内的法定问责流程,相应监管部门会对网络问责事件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若是网络问责问题真实存在、问责是由清晰明了,监管部门会依据权责对等原则,根据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等明确规范对问责对象采取处罚措施,形成问责结果;若是网络问责问题不清、事实不明,或者问责问题为虚构甚至是诬陷或谣言,监管部门也会依据相关规定对外公布调查结果,以明确真相、消除谣言,维护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

从以上对网络问责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其整体的演进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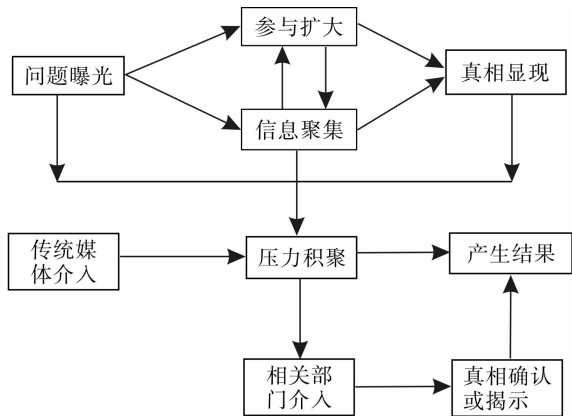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问责的演进过程

## 2. 网络问责的构成要素

网络问责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所构成。

### (1) 主体要素

网民是网络问责的发起者,也是推动网络问责向前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但网络问责的成功发起及最后成效的取得,都对网民的理性精神、网民的媒介素养、网民的数量规模有着特定的要求。

首先,网络问责的成功对网民的数量规模有着一定的要求。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通过外在聚焦形成压力、提出议题的问责形式。网

络问责所提出的议题能不能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与其所能形成的外在压力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在舆论场域越强大,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形成的压力就越大,问责主体的诉求被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网络空间的舆论场域能否形成、能达到什么强度,与活跃在网络空间中的网民的数量和规模有关。因此,网络问责的发展与网络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有关,网络问责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网络技术、网络的应用范围。正如亨廷顿所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sup>[21]</sup>

其次,网络问责的成功有赖于网民的媒介素养。网民的媒介素养是指网民发现有用信息、获取有效信息、传播信息、识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这要求网民具备处理网络信息的相应能力,以理性的态度和情感从事网络问责行为。根据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系统的分析,网络问责属于公民参与的特定形态,对政治系统来说是外输入的一种。每一个政治系统都只有有限的处理外在要求和支持的能力,当外在输入过于多元、所提要求的数量远远大于系统的处理能力时,政治系统就存在崩溃的危险。而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良好运转,会对外部输入的信息进行过滤、分级,以避免信息输入过量所引起的系统紊乱状态。政治系统的这个特点要求网络问责对政治系统输入的信息不能过于多元化、不能超过政治系统的承载能力,输入信息时要遵循既定的规则。因此,网民能否针对相关事件深入挖掘信息、理性传播声音、冷静进行协商、妥协彼此观点、循法提出诉求等直接关系到网络问责的成效,而网民的这些特质均与其媒介素养密切相关。

### (2) 内容要素

网络问责的事由也即是网络问责的内容,它是网络问责成功发起并顺利演进的事实依据。因此,网络问责的事由必须是清晰的、真实

的,这是追究责任的事实基础,也是权责对等、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更是让追责对象心悦诚服、甘愿服法的保证。而近些年所发生的网络问责事件中,凡取得预期问责效果的事件,无一不是事实清楚、客观真实的。现实中网络问责的事由可能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涉及公职人员职权行为的,也有涉及公职人员个人生活甚至是私人生活的,但是不论以什么样的事由对公职人员进行问责,都可以归结到公职人员所承担的责任体系——道德的、管理的、政治的、法律的,若是问责事由无法归结到问责对象的责任体系,那么问责事由就不能成立。所以,问责事由是网络问责的坚实基础。

### (3) 客体要素

网络问责的成效除了依赖于成熟的问责主体、客观真实的问责事由之外,还要求问责内容有具体明确的承载主体,问责进程中的责任承担者必须是清晰的、具体的。因此,在问责的过程中,对于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必须明确其属于哪个部门、哪些人员的管理范畴,这是问责进程中的法律后果承担者,否则问责就没有了对象。现实生活中,一些网络问责事件无法取得问责效果、问责主体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往往与问责对象不清晰、不明确有关。

### (4) 助推要素

网络空间打破了精英群体对信息的垄断,实现了话语权在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再分配。但是,网络舆论场域的作用空间主要局限于网络领域,对网络空间之外的影响力较弱。同时,在网络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会影响其在网外群体心目中的可信度,而传统媒体恰好克服了网络的不足。因此,传统媒体应积极参与到网络问责事件的讨论中来,尤其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权威媒体的参与是网络问责顺利向前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它可以很好地弥补网络舆情的不足,扩大问责事件

的影响。只有在传统媒体的支持下,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形成合力,才能使网络新闻事件超出网民的范畴在更为广阔的舆论场域内感染受众、创造更为强烈的宣传效能,进而更好地推动事态向前演变、促使管理者以低姿态更加有效地倾听民众对诉求的表达<sup>[22]</sup>。

### (5) 保障要素

网络问责是下问上责、异体问责,网民这一问责主体对问责对象的检举、质疑甚至责难是现代政治民主精神的体现,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网络问责主体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处理问责事件的条件和权力,网络问责的成效还依赖于其与体制内问责的顺利、有效对接。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对问责行为不理睬、不回应而导致问责不了了之的情况,这均与网络问责与体制内问责无法有效对接有关。另外,仅靠网络技术手段很难挖掘问责事由的全部信息,尤其是在有关部门有意回避的时候更是如此。公众建议和意见并不能自发地成为主宰力量,而是需要经过政治民主的步骤把自身塑造成交往权力,才能触发行政问责程序、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引导至相应的路径<sup>[23]</sup>。

## 四、结语

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的背景下,网络问责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其在推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态建设,以及形成廉洁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新时代扩大公民参与、强化社会监督、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助推力量。整体由其各个部分构成,它不能先于或脱离其部分而存在,没有部分就无所谓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离开整体的要素只是特定的他物而不成其为部分,没有整体就无所谓部分。网络问责效能的彰显源于网络问责各进程的井然有序、无缝对接,源于其各个部分的健康发展与优



化组合。因此,推进网络问责机制的优化,应基于网络问责的特性,推动问题曝光、信息集聚、舆论压力形成等问责进程的充分发展,不断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公职人员权责体系,提升政府回应技能、增强政府回应性,健全网络问责与体制内问责的衔接机制,以各结构要素的优化推动网络问责整体的和谐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2-03)[2021-02-04]. [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
- [2] 周亚越.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1.
- [3] 邓蓉敬. 网络舆论与问责公正:网络舆论引发的行政问责现象探讨[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2(5):44.
- [4] 司林波. 网络问责的理论探讨[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29.
- [5] 宋涛. 问责机制与网络问责创新内涵的实证检验[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9):25.
- [6] 刘力锐. 网络问责中的抗争表演与法律反制:一种抗争政治学的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52.
- [7] 肖滨. 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J]. 学术研究, 2012(12):42.
- [8] 王敏. 从网络问责的特征与过程看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3):188.
- [9] 王慧敏, 杨文华. 网络问责的暴力化倾向及其矫正[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136.
- [10] 谷茵. 网络问责:异体行政问责的有效途径[J]. 电子政务, 2010(10):61.
- [11] 佟林杰, 孟卫东. 网络问责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J]. 新疆社科论坛, 2013(3):16.
- [12] 冯勇. 网络问责的负面效应及防控路径[J]. 领导科学, 2014(14):60.
- [13] 丁宇, 姜丹. 公民网络问责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及其对策[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150.
- [14] 韩志明. 公民问责:概念建构、机制缺失和治理途径[J]. 探索, 2010(1):62.
- [15] 杨鹏. 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J]. 南风窗, 2005(24):60.
- [16] 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187.
- [17] 郭小安.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21.
- [18] 费斯勒. 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M]. 陈振明, 朱芳芳,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434.
- [19] 韦伯. 经济与社会:下[M]. 林荣远,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314.
- [20] 冯英. 论网络舆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2):1.
- [21] 亨廷顿, 纳尔逊.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 汪晓寿,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174.
- [22] 赵万里, 王菲. 网络事件、网络话语与公共领域的重建[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9):112.
- [23] 曹卫东. 哈贝马斯精粹[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46.



引用格式:符加林,张依梦,张怡然. 中国企业声誉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62-69.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8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62-08

# 中国企业声誉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 Evolution context and prospect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research of Chin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

符加林<sup>1</sup>,张依梦<sup>1</sup>,张怡然<sup>2</sup>

FU Jialin,ZHANG Yimeng,ZHANG Yiran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河南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运用 CiteSpace 软件,梳理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 1994—2020 年 1075 篇企业声誉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文献数量、研究机构、作者、关键词、主题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研究表明:企业声誉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上基本保持一致、交互融合,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企业声誉的研究主题在不断持续和传承;研究主体整体呈现较分散态势,尚未形成核心研究团队;研究机构合作较少,认知和体系尚未达成一致。探究企业声誉负面效应的边界条件,完善企业声誉评价体系,加强企业、学界、政府之间合作,以及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等,应成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

企业声誉;

评价体系;

CiteSpace;

知识图谱

[收稿日期]2021-0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JY030);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202102310305);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HNYJS2020JD04)

[作者简介]符加林(1970—),男,河南省淮滨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声誉管理。

互联网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使得各行各业都更加重视挖掘和培育企业竞争优势,企业声誉就是其中重要的优势资源之一。企业声誉是企业经过长期努力所形成的综合性无形资产,是企业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可以作为企业本身的担保和抵押,保障契约能够顺利实施<sup>[1]</sup>,本质上是公众对企业的信任与忠诚,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过去行为和未来发展的一种累积性的价值评价<sup>[2-3]</sup>。好的企业声誉对企业长期的经营绩效<sup>[4]</sup>、财务绩效<sup>[5]</sup>、市场价值<sup>[6-7]</sup>有正向影响,有助于降低离职率<sup>[8]</sup>。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速度快、透明度高,企业更应加大对声誉的投资。企业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就会迅速在网上曝光,社会公众对其负面评价会急剧增加,而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出现负面新闻后会更容易获得公众的谅解,从而赢得解决问题、恢复形象的时间。企业声誉的评价体系、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声誉机制的有效性提升等一直是声誉领域研究的热点<sup>[9]</sup>。研究中国企业声誉的演化发展,厘清企业声誉研究主题的变迁,探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企业提升绩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风险,对企业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塑造独特的竞争优势、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国内企业声誉的研究图景,本文综合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中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作者和机构共现网络等,分析国内企业声誉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势。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检索界面搜索关键词或者主题词为“企业”“声誉”,文献类型为“期刊”,来源期刊设置为“核心期刊”“CSSCI”“CSCD”,年限为 1994—2020 年,检索到相关文献 1084 篇。检索完成后,对所有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复查,剔除无关文献和重复文献,最终筛选出 1075 篇有效文献,确定其能够覆盖国内企业声誉研究的主要成果。

## 一、企业声誉研究的动态演进

1983 年《财富》杂志推出企业声誉榜,引起了企业和学术界对“企业声誉”相关研究的重视。大约从 20 世纪中期,我国开始了企业声誉方面的探索,并渐次形成了一些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成果。本文结合年度发文章量和关键词共现图谱来分析企业声誉研究领域的动态演进过程。

年度发文章量是反映一个研究领域演进趋势的重要指标。本文以 CNKI 收录的有关“企业声誉”研究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以论文数量为依据,对 1994—2020 年中国学术界有关企业声誉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具体见图 1。由图 1 可知,从时间维度上将企业声誉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94—1999 年)、发展阶段(2000—2010 年)和平稳阶段(2011—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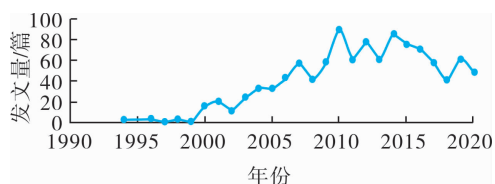


图 1 文献发表年度变化趋势图

年度发文章量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声誉相关文献数量的变化。为了解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需要对关键年份的重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不同阶段的企业声誉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再结合年度发文章量变化分析企业声誉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

### 1. 萌芽阶段

自 1994 年开始,CNKI 开始收录以“企业声誉”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说明学界对企业声誉有了初步的探索,但相关文献较少。这个时期我国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尚不完善,行业规模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企业往往没有条

件对费用高、回报周期长的声誉投入过多的资金。企业处于低水平过度竞争和严重的行为短期化时期,缺乏一种长远发展的声誉制度基础,对声誉多是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sup>[10]</sup>。该阶段企业更多重视的是眼前的短期利益,企业声誉这个需要付出长期精力和费用的无形资产还未受到企业和学术界的重视。

### 2. 发展阶段

21世纪初,企业之间历经价格、质量、服务竞争后,开始进入声誉竞争阶段,此时“声誉管理”对国内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学者们希望引起企业的重视<sup>[11]</sup>。企业声誉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开始呈上升趋势,10年间增长了近5倍。运用 CiteSpace 对 2000—2010 年我国企业声誉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见图 2。由图 2 可知,关键词主要有“声誉管理”“声誉机制”“企业声誉”“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竞争优势”“无形资产”“企业社会绩效”等。

企业声誉作为一种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无形资产,能为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利益相关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亲身经历和信息积累对企业的综合性评价。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提供理论基础。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声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值得尊敬,会获得更好的声誉<sup>[12]</sup>,声誉良好的企业也更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建立经营者有效的声誉机制,激励经营者行为长期化,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sup>[13-14]</sup>。质量、业绩、吸引力、管理团队、技术、资金等因素也会对企业声誉产生影响<sup>[15-16]</sup>。

此阶段企业和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声誉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声誉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为此,学者们开始构建有效的声誉机制、研究影响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为之后

的企业声誉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 3. 平稳阶段

自 2011 年开始,企业声誉领域研究年度发文数基本趋于平稳。由此可见,企业声誉研究仍然保持一定的热度。运用 CiteSpace 对 2011—2020 年我国企业声誉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见图 3。由图 3 可知,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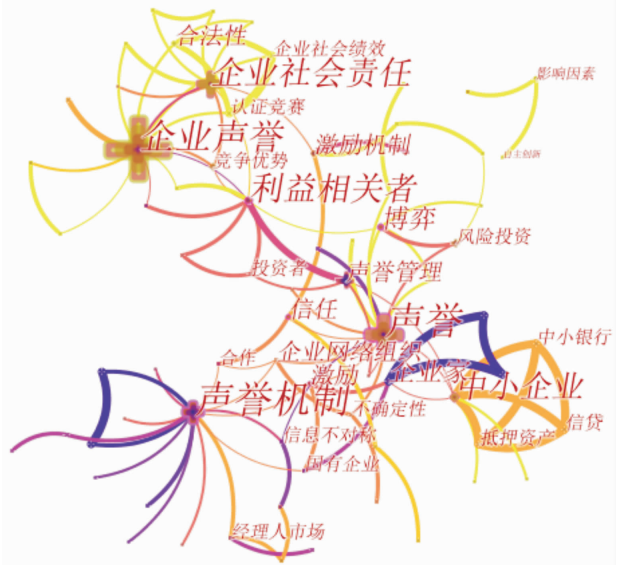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0 年我国企业声誉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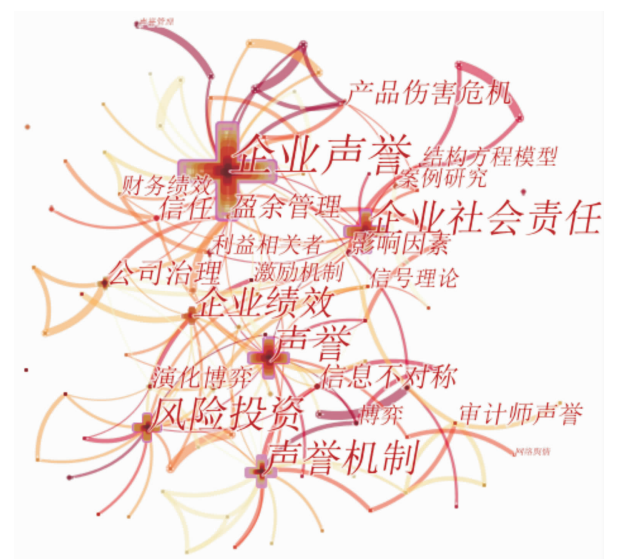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20 年我国企业声誉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词主要有“企业声誉”“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投资”“声誉机制”“企业绩效”“公司治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绿色创新”“媒体监督”等。

“大众排放门事件”“联想 5G 投票门事件”等企业负面新闻的频频出现,使得社会面临着冗长的责任问题清单,企业希望通过加大社会责任践行力度来提升企业声誉,因此企业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sup>[17]</sup>。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大众媒体会将企业的负面新闻披露出来并迅速传播,对企业声誉产生负面影响,无形中加大了企业压力,这种压力会推动企业投入更多精力构建良好的声誉<sup>[18-19]</sup>。此外,企业声誉对风险投资、研发投入、企业绩效、企业创新的作用也颇受学者关注。风险投资能发挥与承销商和审计师类似的第三方鉴定作用,以此来保护声誉<sup>[20]</sup>。企业声誉可以增强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sup>[6]</sup>。研究发现,创新对企业声誉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声誉也能通过资源获取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sup>[21]</sup>。《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绿色创新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但是绿色创新的高成本和外部性导致资本市场短期内反应消极,良好的企业声誉可以弱化资本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sup>[22]</sup>。

由于建立良好的声誉费用高、周期长,企业早期对其重视不足、投入不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公开化,企业声誉在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者和企业家开始重视“企业声誉”这个问题。如何有效提升和维护企业声誉,建立良好的声誉机制,从而打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主题之一。总的来说,从内容维度上看,企业声誉研究主要经历了概念引入、体系构建、机制建立、有效性提升四个阶段。

## 二、企业声誉研究的主题演进

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企业声誉研究主题的分布,深入了解主题共现关系,本文根据关键词相似度,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聚类。所谓聚类,就是研究主题、内容上的相似度,一定程度上代表某领域研究的热点。通过 LLR 算法,从关键词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对聚类进行命名,由此得到企业声誉研究关键词主题聚类图谱(见图 4)。由图 4 可知,有 10 个主要聚类(聚类排序越靠前,说明聚类规模越大),共 204 个节点和 416 条连线,密度为 0.020 1,模块值  $Q = 0.581 4$ 。一般来说,  $Q > 0.3$ ,表示聚类结果显著。根据图 4,本文梳理出 5 个重点研究主题。

### 1. 企业声誉研究

企业声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企业更应做好声誉管理,制定有效的声誉危机防范措施。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声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研究表明,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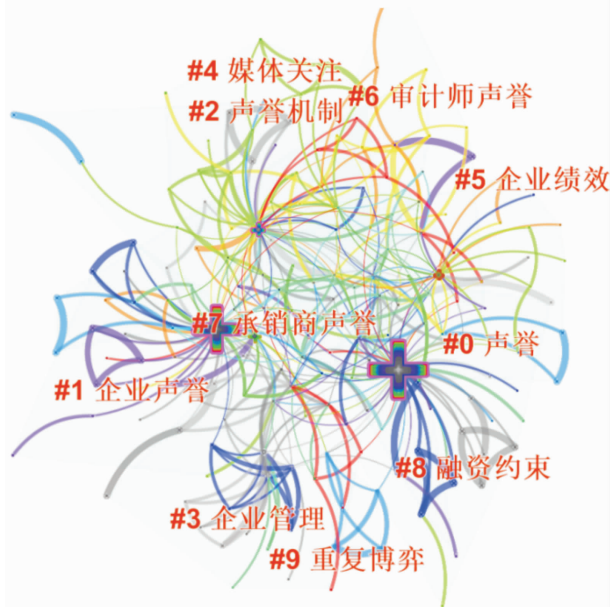


图 4 我国企业声誉研究关键词主题聚类图谱

企业声誉战略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sup>[20]</sup>。大多数主题都是以这个阶段的研究为理论基础,反映出企业声誉相关研究的持续和传承。

## 2. 声誉机制研究

声誉机制是维护市场稳定的基本工具,企业声誉研究非常重视声誉机制的完善,该主题聚类主要关注如何在市场博弈中改善声誉机制,使其发挥最大作用。初期,学者们主要探索了企业声誉测量模型和指标,虽然国外已经有了测量模型和指标,但是他们的标准不一定适合我国企业,适当调整国外的模型结构和增减指标,旨在开发出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的测量模型和指标体系<sup>[15]</sup>,同时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声誉机制。

## 3. 媒体关注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在企业声誉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媒体作为外部监督者,可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也可为公司并购和投资效率提供保障。媒体关注能给企业带来压力,发挥其治理作用,推动企业投入更多精力构建良好声誉。探讨媒体关注在声誉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议题。

## 4. 企业绩效研究

企业声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企业声誉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问题,研究企业声誉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有助于企业构建声誉与创新协同机制。尤其是在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我国目前的一大目标就是助力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和经营发展,而科技型小微企业轻资产和高风险特征导致其难以从传统的商业银行获得融资,只能依赖风险资本的股权投资。目前企业声誉领域研究了风险资本的声誉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效率,发现良好的声誉能够提高企业绩效,高声誉的企业能够缩短获取风险投资的时间<sup>[23]</sup>,拥有高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会比低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拥有

更高的长期企业绩效<sup>[24]</sup>。

## 5. 审计师声誉和承销商声誉研究

近年来,审计师和承销商在声誉管理中发挥着第三方鉴定作用,其声誉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升级,巩固和开辟市场,提升绩效以保证资金融通。此外,企业也会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来实现其经营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审计师声誉对融资成本的影响也是研究的热点。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承销商声誉能够调节投资者情绪对IPO首日收益的影响<sup>[25]</sup>。发挥承销商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三方作用,对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能有效督促上市公司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促进我国承销商声誉机制不断完善。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声誉机制等一直是企业声誉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贯穿整个企业声誉研究领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近年来出现的研究主题大多与它们有共现关系,体现了企业声誉领域研究的持续和传承。

## 三、企业声誉研究的主体分布

### 1. 企业声誉研究的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是科研资源、信息、人才等相互交融的场合,承载着重要的科研成果。由中国企业声誉研究发文量机构分布图(见图5)可知,企业声誉研究发文量在15篇以上的机构有20家,占据了企业声誉研究领域的半壁江山,其中,南京大学发文量最高,共发文36篇;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1所大学发文量均在20篇以上,占总发文量的30%,说明这些机构是企业声誉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发文机构较为分散,集中程度不高,大多数机构发文量仅有一篇,绝大多数机构对企业声誉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体系,并且该领域各个机构之间相对独立、缺少研究合作。

## 2. 企业声誉研究的作者分布

根据普赖斯定律,可计算出核心作者发文量,核心作者撰写了其所在领域 50% 的论文。根据公式可得: $M = 0.749 \times \sqrt{N_{\max}} = 0.749 \times \sqrt{5} = 1.67$  ( $M$  是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N_{\max}$  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数)<sup>[26]</sup>。即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2 篇,通过统计得出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发文量为 5 篇。通过对企业声誉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著有 3 篇以上的作者有 35 名(见图 6)。这 35 名作者的总发文量为 122 篇,占总发文量的 11%,远达不到普赖斯定律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总发文量一半的要求,尚未形成

核心作者群。同时结合 CiteSpace 生成的作者合作图谱(见图 7),可以看出党兴华、徐金发、李军林、张萍的节点最大,表明其发文量最高。但是图谱整体呈较分散态势,彼此之间合作不够紧密。总的来说,企业声誉领域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合作,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和研究体系。

## 四、结论与展望

### 1. 研究结论

(1)企业声誉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上基本保持一致、交互融合,但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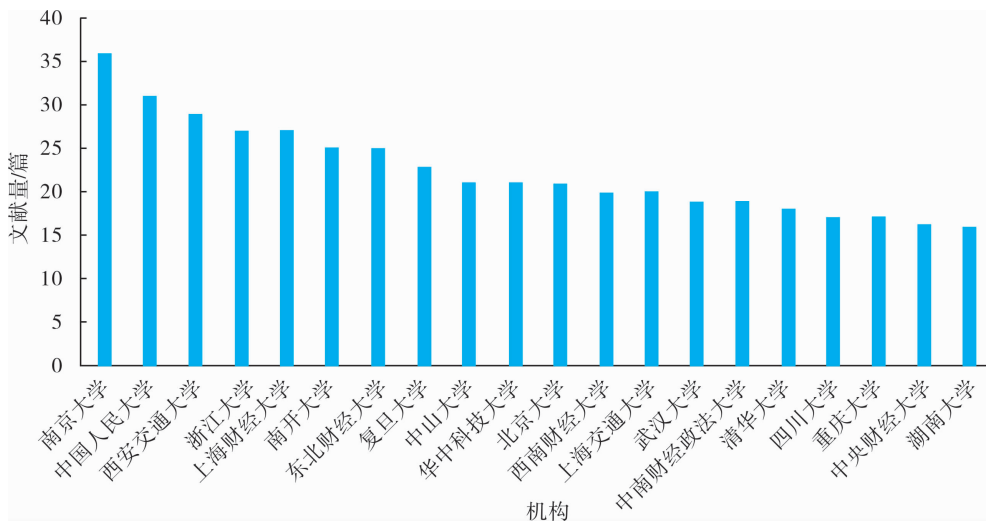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企业声誉研究发文量机构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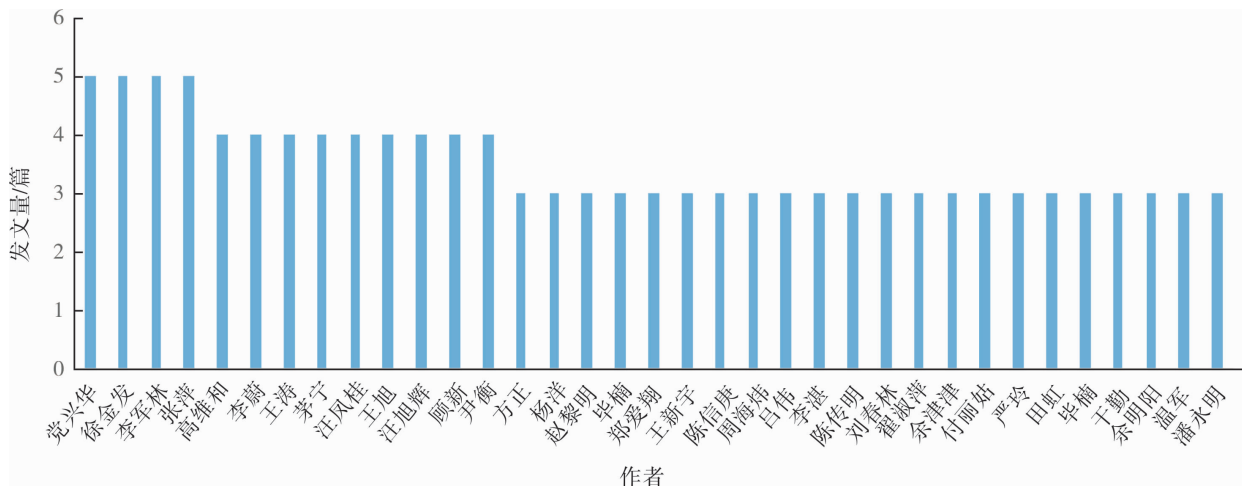


图 6 发文量较高的作者统计分析图





- 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声誉视角的分析解释[J]. 江苏社会科学,2016(3):95.
- [6] 刘睿智,张鲁秀. 企业声誉、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J]. 财经问题研究,2018(8):105.
- [7] 洪祥骏,赵婧,马征. 券商监管与声誉价值:中国证券市场治理与企业并购绩效[J]. 经济评论,2020(2):86.
- [8] 杨海兰,林欣蓉,王硕. 董事会多元化对 CSR 及企业声誉的影响研究[J]. 财会通讯,2019(23):20.
- [9] 唐贵瑶,陈琳,袁硕. 道德型领导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管理评论,2019(12):170.
- [10] 周黎安,崔兆鸣,周为,等. 从信息经济学看当前假冒伪劣现象[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29.
- [11] 刘兵,罗宜美. 论企业管理的崭新阶段:声誉管理[J]. 中国软科学,2000(5):96.
- [12] 任巧巧.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J]. 经济管理,2005(19):16.
- [13] 付玉秀,张洪石. 风险报酬、控制权与声誉:创业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J]. 中国科技论坛,2003(5):102.
- [14] 黄群慧,李春琦. 报酬、声誉与经营者长期化行为的激励[J]. 中国工业经济,2001(1):58.
- [15] 刘彧彧,娄卓,刘军,等. 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消费者口碑传播行为的作用[J]. 管理学报,2009(3):348.
- [16] 张春香,张百舸. 新创高科技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19(3):109.
- [17] 齐丽云,李腾飞,郭亚楠.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选择的调节作用[J]. 科研管理,2017(7):117.
- [18] 陈红,杨鑫瑶,尹树森. 媒体评价、声誉治理与投资者权益保护[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104.
- [19] 靳馨茹. 碳会计信息披露、媒体态度与企业声誉研究[J]. 会计之友,2017(23):20.
- [20] 吴翠凤,吴世农,刘威.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风险投资的介入与退出动机研究[J]. 经济管理,2012(10):128.
- [21] 赵淳宇,冯瑛. 企业声誉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10(2):34.
- [22] 王晓祺,胡国强. 绿色创新、企业声誉与盈余信息含量[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0.
- [23] 张春香. 新办高科技企业声誉、风险投资获得与技术创新[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 [24] 段贵恒. 基于投资者关系战略的上市公司声誉模式构建[D]. 天津:天津大学,2007.
- [25] 张学勇,陈然,魏旭. 承销商与重返 IPO 表现: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0(1):164.
- [26] 冯雪,吴国春,曹玉昆. 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生物质能源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1):35.
- [27] 孙涂蔚,骆南峰,石伟,等. 企业高声誉的负面效应的心理学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2020(3):497.



引用格式:李燕华,王文茹.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70-75.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70-06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

##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path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李燕华,王文茹

LI Yanhua, WANG Wenru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内在契合之处:二者同属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同为我国农村工作的实践要求。目前,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然存在着体制机制衔接不畅、乡村产业发展困难、内生动力难以激发等困境。应从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优化升级、激活内生动力等方面,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关键词: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乡村产业;  
内生动力

[收稿日期]2020-03-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YJCZH037)

[作者简介]李燕华(1963—),女,河南省辉县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基层治理;王文茹(1995—),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该文件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学界围绕该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面临的困境问题;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问题。

通过梳理发现,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的研究虽然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该问题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在两者之间关系上,现有研究大多从“五大振兴”的宏观角度提出相应的衔接路径,较为宽泛,缺乏对二者逻辑关系的具体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内在契合的基础上,指出二者有效衔接面临的困境,提出摆脱困境的相应对策,以期为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参考。

## 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契合性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弛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两者既有其各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也有内在契合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农村工作一向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贫困人口获得

土地,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施小规模救济式扶贫,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取得空前绝后的伟大成绩,为新时代开展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从耕者有其田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三权分置”改革,从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工作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心。可见,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贫困治理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关注的焦点,我们党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更是连续多年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展不同规模的扶贫行动。这都彰显出我们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三农”问题的密切关注。

### 2. 共同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城乡关系理论、消除三大差别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同理论渊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是建立在对直接生产者完全剥夺基础上的,是以一线工人的贫困化为代价的<sup>[1]</sup>,阶级剥削和压迫是贫困产生的原因。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土地所有权的研究,指出土地国有化是社会大生产的必然发展,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sup>[2]</sup>,强调城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融合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废除私有制、实现土地国有化、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三权分置”的改革,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指出的,“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sup>[3]</sup>。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不断推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避免返贫现象,逐步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3. 我国农村工作的实践要求

2021年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预示着农村工作的重心从脱贫转变为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对脱贫县要持续关注再送一程,切勿高奏凯歌、打道回府,同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和帮扶,继续在乡村推进扶贫政策落实。针对不同地区开展特色种养业,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展动态监测,掌握贫困人口脱贫后的生活状态。经过八年脱贫实践,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相对落后,教育、医疗、交通、基本公共服务等水平较低,农民持续增收动力不足,城乡差距仍然比较大,还需要提高“三保障”的水平。同时,基础较好的乡村已经先行一步进入振兴的初步探索阶段,基础较差的乡村才刚刚脱贫,长此以往,村与村之间的差距会慢慢扩大。另外,贫困问题并没有彻底消除,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任重道远,我国依然需要进行乡村贫困治理。因此,我国农村工作需要进一步持续发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持续推进,以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困境

虽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关系密切,但二

者之间的有效衔接还面临着体制机制、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等方面的困境。

### 1. 体制机制衔接不畅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健全的扶贫体制机制,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扶贫工作经验。乡村振兴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其在体制机制方面的要求与脱贫攻坚不尽相同,而体制机制的有效衔接是两大战略顺利衔接的基础条件。目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政策衔接不到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实施方案,目前,虽然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但具体的衔接政策和实施方案还不完善。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为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指明了方向和工作重点,但依然缺乏促进二者有效衔接的具体细则。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在实践中二者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不畅导致二者无法有效衔接。其二,衔接随意化、零散化。准确理解政策是科学执行政策的前提。当前,各地对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有的还存在一定偏差,有的地方就脱贫谈脱贫,就振兴谈振兴,忽略了两大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sup>[4]</sup>,在二者的衔接问题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断层,导致二者衔接工作的随意化和零散化,衔接“两张皮”现象。其三,组织衔接较为困难。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中,负责两大战略实施的机构和部门不统一,一般来说脱贫攻坚由扶贫办负责,乡村振兴战略由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二者在产业发展、文化宣传、人才培养、生态保护等具体工作上存在诸多职能交叉和错位,在具体实践中存

在一定的沟通协调困难,组织衔接较为困难。

## 2. 乡村产业发展困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推动力。产业发展都有一定阶段性周期性,大部分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升级换代,扶贫产业同样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市场规律,特别是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乡村产业。导致乡村产业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扶贫产业同质化,缺乏地域特色。多数地区扶贫产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生搬硬套不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模式,无法形成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扶贫效果不明显。其二,扶贫产业可持续性不强。由于政策、市场和扶贫干部自身等因素,脱贫攻坚阶段被选中的产业前期往往能得到高度关注和大量资源投入,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是后期往往供血不足,扶贫产业可持续性不强。其三,农民主体性缺失。目前,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认知能力较差,脱贫能力不足,思想认识不到位,扶贫态度消极。而且,基层政府在脱贫指标压力下易采取资产收益扶贫的方式,通过发放红利分红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而通过发放红利分红的扶贫并没有使贫困人口切实地参与扶贫,贫困人口依然没有掌握可持续脱贫的能力,脱贫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重新返贫的隐患。任何脱离农民自身的产业发展,都与产业兴旺相悖<sup>[5]</sup>,持续的产业兴旺需要的不只是外界的帮助,更是贫困人口自身脱贫致富的心态和能力。

## 3. 内生动力难以激发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因此,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快激发农村居民的内生动力。当前,在激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生动力

方面尚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农民异质性、流动性增强,难以激发其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生动力。随着农村“半工半耕”劳动方式的日益普及,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已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去城市工作学习,使得乡村人力资源出现空心化现象。目前农村居民的大部分收入是进城务工所得,小部分收入是通过务农或其他方式所得,农民与农村关联的黏性降低,难以激发农民回乡创业的积极性。其二,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动性难以协调。当前,扶贫方式多由政府主导和推动,以责任捆绑方式自上而下推进帮扶脱贫,而且,脱贫政策特有的特惠性,客观上会滋长一些贫困户的惰性思维,使其坐收渔利。所以,在实践中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动性难以协调,贫困群众参与脱贫的积极性不高,自主脱贫意识淡薄,存在“早脱贫、早吃亏”的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其三,自主脱贫意识淡薄。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扶贫政策存在一定的福利性,扶志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助长一些贫困户产生不劳而获的心理,对于扶贫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思想认识影响脱贫态度,部分贫困人群自主脱贫意识淡薄,缺乏信心和勇气。

##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1. 创新体制机制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其一,应加快制定衔接政策。为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对一些重大政策的调整优化提出了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要求，对于二者的衔接做出了初步探索，各地应加快衔接政策制定速度，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其二，应大力宣传减贫振兴政策，提升政策认同感，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扫清思想障碍。通过搭建网络乡村平台、专家咨询平台、精准扶贫对接平台、人才招聘推介平台等，宣传减贫振兴政策，提升贫困群众的政策认同感。同时，应通过农民服务站为农村居民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传、法律援助等，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能力。其三，应积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应充分借鉴脱贫的成功经验与教训，重视当前农村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进一步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构建起权责清晰、各司其职、执行有力的工作机制。

## 2. 推动乡村产业优化升级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加快推进乡村产业优化升级，其一，应大力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产业。应充分响应“产业+扶贫”和“产业+振兴”的号召，因地制宜探索特色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根据不同村庄的实际情况，鼓励贫困人员参与特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将特色产业与贫困户、村集体等实现有效对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实现特色扶贫产业与产业振兴相衔接的路径，进一步将乡村产业做大做强。其二，应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增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对现代农业体系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农业产业融合可以发挥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乡村产业兴旺<sup>[6]</sup>。应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链增值分享机制，拓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乡村产业优化升级。其三，应培育农民主动性。一方面，应提高乡村贫困人口主体意识，唤醒贫困人口脱贫自主性；另一方面，应通过各种农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构建，培养一批有主体意识的乡村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为乡村长期繁荣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 3. 激活农村居民内生动力

马克思指出：“人类进行一切实践和历史活动的前提，是需要的满足。”<sup>[7]</sup>因此，应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强化其自身主体性，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使其摒弃不劳而获的思想，积极主动创业兴业。其一，应鼓励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回乡发展，为其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同时，吸引城镇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扶贫事业，投身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的社会大潮中，为农业农村的发展保驾护航。其二，应正确处理政府主导和农民自主之间的关系，培育村民主体意识，唤醒农民脱贫自主性。一方面，应处理好政府主导和农民主动之间的关系，积极聆听采纳群众意见，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应针对乡村扶贫脱贫过程中内生动力不足的状况，采取各种措施引导贫困人口提高主体意识，激发群众的脱贫活力。其三，应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培育乡风文明。一方面，应帮助贫困人口树立主动脱贫的意识，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鼓励贫困人口树立脱贫致富的志气；另一方面，应通过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要求，提高乡村基础教育水平，转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使其做到自力更生、自主脱贫。应通过提供农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培

训,提高农民脱贫致富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为乡村长期繁荣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 四、结语

我国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不仅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且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贫困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当前,只有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才能保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顺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6.
-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20.
- [3]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3-03)[2021-03-1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03/c\\_121104931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03/c_1211049315.htm).
- [4] 高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逻辑关系及政策安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0.
- [5] 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9.
- [6] 张红宇.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理论参考,2018(4):54.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引用格式:柴秋霞,于小雅.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艺术价值初探[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76-83.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10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76-08

# 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艺术价值初探

## Exploration on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strip murals of exotic birds and monsters in Dahuting Han tombs

柴秋霞<sup>1</sup>,于小雅<sup>2</sup>

CHAI Qiuxia, YU Xiaoya

1. 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 200433;

2.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描绘了大量丰富的异禽怪兽造型,反映出汉代人非凡的想象力和淳朴的升仙思想。壁画中的构图更是独具一格,通过边饰与界格让繁杂的珍禽瑞兽图形成了多个独立的小画面,反映出汉代壁画丰富又有条理、繁杂但不繁琐的严谨布局。同时,壁画的线条流畅,色块清晰,各种色彩的搭配相得益彰,主次分明,使得壁画内容既统一又充满变化。该壁画的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集中体现了汉代壁画艺术的较高成就,其对于东汉时期绘画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

### 关键词: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

边饰;

界格

[收稿日期]2021-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G110)

[作者简介]柴秋霞(1969—),女,河南省兰考县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设计学、博物馆学;于小雅(1996—),女,江苏省盐城市人,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是展现我国东汉初年大型石刻绘画艺术和彩色壁画艺术成就的综合墓葬,于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该墓分一号墓(石刻墓)和二号墓(壁画墓)两部分,一号墓保留有大量雕刻精湛的石刻画像,二号墓残存有内容丰富的彩绘与墨绘壁画。二号墓壁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况的壁画;另一部分是反映墓主人死后企望升天的壁画。

目前学者们围绕汉墓壁画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韦娜<sup>[1]</sup>认为,汉代墓葬壁画多以羽化升仙等神仙故事为绘画主题。杨爱国<sup>[2]</sup>指出,汉墓壁画作为表现生死转化体验的图像体系,是从想象路径构筑的地下世界,是一个围绕重生体验建立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处于封闭形态的艺术图像;杨爱国<sup>[3]</sup>还认为,汉墓壁画反映的升仙故事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信立祥<sup>[4]</sup>通过对汉墓壁画中常见的车马出行等内容研究指出,壁画往往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仕途经历。练春海<sup>[5]</sup>则认为,西汉壁画中大量出现动物或狩猎的场面,画面生活气息浓重,具有一定的务实精神。从壁画技法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汉墓壁画侧重反映汉代绘画的奔放与动感,表现出拙朴、生动的造型特征。马振龙等<sup>[6]</sup>从现代平面设计的角度指出,汉墓壁画中描绘的飞天图像在于表现人物飞动的美感,其线条的流动与虚实手法的运用是汉墓壁画的艺术价值所在。练春海<sup>[7]</sup>则从色彩和绘画技法的角度指出,

汉墓壁画中的形象造型极具张力,以红绿对比为主,线条多为即兴发挥,用线也比较泼辣奔放。目前学界对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研究聚焦于其所反映的升仙思想上,对其艺术特色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绘画手法上,而对于壁画的边饰和界格特色少有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在归纳梳理该壁画所反映的思想与内容特色的基础上,对其构图与装饰特色进行阐述,以期为理解汉墓壁画的内容、艺术特色提供史料素材。

## 一、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概况

墓葬是古人对于灵魂的认识和对死后世界的观念展现。汉代墓葬形制内容中有大量的体现臆想升仙的题材,表现了墓主人臆想升天成仙的愿望。打虎亭汉墓的墓主人生前享受世间荣华富贵,死后更是希望到一个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在打虎亭汉墓彩绘壁画中,不仅有反映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还不乏一些极具想象力的神仙图案,希望用来保护墓主人免受鬼魅邪祟的侵扰,以便在死后通过引魂升仙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打虎亭汉墓中具有代表性的祥瑞题材的壁画是二号墓中的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其是一组条幅壁画,分布在中庭券顶藻井图案南北两侧,即中庭券顶南侧和中庭券顶北侧,由西向东各有七幅,共有十四幅,以边框界格分隔开。该壁画形象生动地将墓主人死后向往的瑰丽奇幻的神仙世界描绘出来(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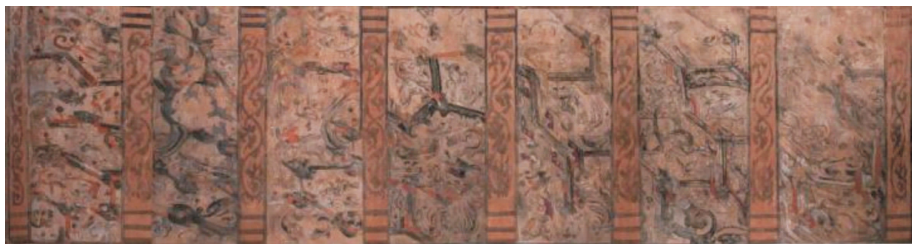


图1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南侧七幅\*

\* 文中图片均来自打虎亭汉墓二号墓摹写墓壁画异禽怪兽条幅壁画。



图2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北侧七幅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绘制于二号墓中室东段券顶上,分布于券顶南北两侧。南侧七幅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东西长约 7.4 m、南北宽约 1.0 m;北侧七幅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东西长约 7.4 m、南北宽约 1.85 m。其中,所绘的异禽怪兽与仙人等形象,大体与墓内石门上所雕刻的画像内容相同,但也有一些壁画内容是石刻画像中所没有的。条幅壁画中的异禽、怪兽与仙人等图像,均是用不同颜色绘制而成的,形象生动、华丽醒目。在这十四条幅的彩色界格画中,内容以奔虎、奔鹿、立熊、立鸟、飞鸟、仙人和仙草的数量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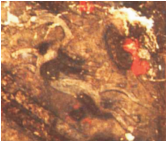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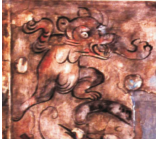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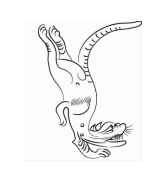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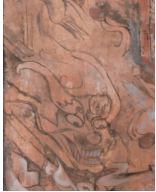



## 二、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容特色

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探究打虎亭汉墓壁画的构图形式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壁画的内容。异禽怪兽条幅壁刻画了大量丰富的异禽、怪兽、仙人、仙草等意象造形。下面将从壁画内容中的异禽怪兽元素及其造型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内容特色。

### 1. 异禽怪兽元素

墓室中绘制的异禽怪兽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形象美好,表达对墓主人的美好祝愿;另一种造型夸张,用凶恶的形象来克制邪祟鬼魅,起到对墓主人尸体和魂魄的保护作用。打虎亭汉墓的画师发挥想象力,充分利用各种异禽怪兽的变形(见表1),使得信手拈来的描绘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

表1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部分异禽怪兽元素

序号	图案名称	壁画扫描图	线稿示意图
1	飞廉		
2	熊		
3	虎		
4	蟾蜍		
5	鹿		
6	龙		
7	青鸟		

### (1) 飞廉

飞廉,亦作蜚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飞鸟与鹿相结合的神兽,外形是鸟身鹿头或鸟头鹿身。飞廉是蚩尤师弟的名字,作为风伯,是掌管风的神灵。对于何为飞廉,王逸作出了自己的解释:“飞廉,风伯也。”<sup>[8]</sup>《三辅黄图》中具体描述了飞廉的外形:“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sup>[9]</sup>可见,飞廉就是长了翅膀的鹿,即“天鹿”,是福运的象征,象征着墓主人死后可以羽化成仙、乘风飞翔。

### (2) 熊

河南新郑曾是有熊国的都城,新郑市的“能庄”原名“熊庄”,距离打虎亭汉墓所在的新密约 50 km,由此可以推测出熊在打虎亭汉墓中的图腾式意义。打虎亭汉墓中的熊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凶神恶煞的猛兽形象护佑墓主人升仙;二是黄帝轩辕氏的图腾。由于熊有冬眠春出的习性,因此熊作为图腾有死而复生的象征意义。

### (3) 虎

白虎作为汉代“四方神灵”之一,在汉代人们心目中是辟邪神兽。《风俗通义》中对虎有这样的描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sup>[10]</sup>古人认为虎为天生神物,纯阳之性,是百兽之王,所以能克杀阴浊之物,驱走邪恶之气。白虎有食鬼之能,可驱妖镇宅、祛邪避灾,墓室中绘虎是为了保护墓主人死后不受鬼魅侵害。同时,虎也是升仙的辅助工具之一<sup>[11]</sup>。打虎亭汉墓中的虎千姿百态,但大多都是凶兽的形象。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虎或两虎相斗,或其他珍禽瑞兽对峙,或追逐猎物,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捕食者”形象,起到为墓主人的升仙之路保驾护航的作用。

### (4) 蟾蜍

在神话中,蟾蜍与月亮有着关联的寓意。

传说广寒宫中因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而又叫蟾宫。蟾蜍还是“五毒”之一。古人认为,一切力量都处在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过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恶毒的东西需要有更加恶毒凶狠的东西来制服它。“五毒辟邪”“饕餮镇恶”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sup>[12]</sup><sup>24</sup>。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蟾蜍动作神态夸张、横眉怒目,是典型的凶兽。一方面,蟾蜍本身的凶恶形象对墓室可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蟾蜍能吞凶食恶,可起到趋利避害的作用。

### (5) 鹿

古代“五灵”中的龙和麒麟都有鹿的特征,可见鹿在古代吉祥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鹿同时还是一种能够驱邪的瑞兽。在古代传说中,鹿神还能啃食毒草而不怕病秽,或与生命树同在,或衔来仙草或灵芝,使人长寿,这些都是鹿成为“吉祥物”的重要缘由<sup>[13]</sup><sup>37-38</sup>。

因“鹿”与“禄”同音,所以人们认为鹿有神性,象征吉祥福祿之意。《述异记》记载:“鹿千年化为苍,又五百年化为白,又五百年化为玄。汉成帝时,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视之,骨皆黑色,仙者说玄鹿为脯,食之,寿二千岁。”<sup>[13]</sup><sup>8</sup>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描绘的鹿就是玄鹿,寓意长寿。鹿还常与仙人同现或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以表达人死后可以骑乘仙鹿得道成仙的愿望。

### (6) 龙

龙起初是作为神人登天的坐骑而存在的一种神兽。《山海经》中的龙是东方之神句芒、南方之神祝融、西方之神蓐收的坐骑,《湘君》《河伯》等中的“乘龙”只是一种对龙的驾驭,遨游天空,幻想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汉代的神仙思想盛行,有黄帝乘龙升天之说。《论衡·记妖》中记有黄帝上泰山时驾车的是六条蛟龙,《淮南子·原道训》中记有黄帝得道成仙时是乘龙而上天,《大戴礼记》说黄帝升天时要“乘龙”。由此可见,龙是供神灵乘骑的神兽之一。



汉代的人们将龙作为一种升天的工具,在汉代的墓室中常常出现神龙腾云驾雾的画面,表达了墓主人渴望乘龙飞升成仙的愿望。

### (7)青鸟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西王母驾临前,总有青鸟先来报信。《山海经·西山经》中写道:“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sup>[14]</sup>墓主人希望飞升成仙以延续生前奢靡生活,而蓬莱仙山无路可寻,唯有西王母的信使青鸟引路。作为司启,青鸟的职责是沟通人间与仙界,同时作为墓主人的侍从与护卫,引领着墓主人去往蓬莱仙境飞升成仙。

### 2. 异禽怪兽造型

在造型方面,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虽采用写实手法描绘动物,但对其表情动作描绘极具夸张性、拟人性,显得生动风趣,充分显示出仙界动物与人间动物的区别。异禽怪兽的造型,更是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造型,如寓意祥瑞的四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造型、飞龙造型、舞凤造型等。还有一些造型是将动物身体某个局部相互置换产生的臆想造型,如鸟头兽身、兽头鸟身、鸟头龟身、马头虎身、虎头鸟身、兽头龟身等。还有一些是在动物真实造型基础上对其局部加以改动或添加,如长颈虎、高冠鸟、长尾鸟、三头鸟、三足鸟、三尾鸟、独角虎、双翼虎、角熊、翼马等。这些动物有的相互打斗,有的相互嬉戏,形态不一,生动有趣。

壁画中的这些动物造型不仅生动,而且每幅自成一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思想。例如,“仙人骑马图”(见图3)绘制了一个头挽发髻、身穿褐色长衣、左手执盾、右手举刀的仙人,骑在一匹鞍辔俱全、奔驰于灰白色云气中的红马背上,吓得一侧的一只褐色鹿作惊逃状;“仙

人骑鹿图”(见图4)绘制了一个头挽发髻、身穿短衣、胸部外露的仙人,骑在一只奔驰于白色云气纹间的棕色鹿背上,左手紧握拴在鹿颈部的绳子,右手举一长棍状物,形似赶打奔鹿快跑状。



图3 仙人骑马图



图4 仙人骑鹿图

## 三、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构图特色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构图很有特点,是典型的界格式构图,具体可以分为外部边饰与内部界格两种形式。边饰是指围绕主题画像边缘的、带有纹路的外框,界格是指画像内部用以划分画面各部分的框格,二者往往同时存在<sup>[15]</sup>。

### 1. 边饰

从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外部界格来看,其属于带图案的纹案框格,也就是边饰。其形制与打虎亭一号墓前墓室门正背两面刻画的界格类似,只是壁画中的界格纹是在绘制的黑色双直线之

间涂染朱红色或棕黑色,在变形云纹间则涂染棕黑色,形成色泽鲜艳醒目的界格纹图案<sup>[16]</sup>。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边饰有着丰富的层次关系,界格在前,图像在后。边饰内的图案没有受到界格的影响,画面本身是无限延伸的,界格更像是一扇把画面展示出来的窗户。被边饰遮挡的多是云纹、仙草纹、内部界格等一些装饰纹样,而人物、瑞兽等比较重要的主题大多保留得很完整,属于离边界格或切边界格。离边界格和切边界格用的是类似平面几何中圆与另一个几何形状相离或相切的位置关系,在边框界格中则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的位置关系。离边界格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界格分离开来,保持一定的距离,使画像可以在画面中保持完整的形态。切边界格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相切,但是没有互相交错,具体来讲就是虽然画像上的人或物的一部分与边框界格相切,但画像与界格相接触部分是各自完整的,没有因边框界格而有缺失。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通过外部的边饰(见图5),让整个壁画形成了既分离又统一的艺术作品,犹如后世山水画中的四条屏一般,既让每一部分的壁画各自独立,又让整体和谐共存。而作为外部界格的边饰图案也极具较高的艺术价值。通过一些传统纹饰的穿插、点缀、装饰,边饰的装饰性功能、审美价值得到彰显,成为打虎亭汉墓壁画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一大构图特色。

## 2. 界格

除外部的边饰外,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画面也并非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是被内部界格划分成若干独立的画面。内部的边框界格将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分割成十四幅,每一幅又被更小的界格分割成8~10个小画面,本文将这种壁画画面内的分割形式称为内部界格(见图6、图7)。



图5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局部及边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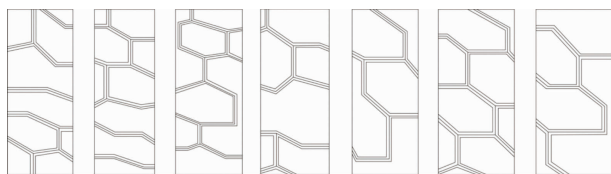


图6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  
南侧七幅界格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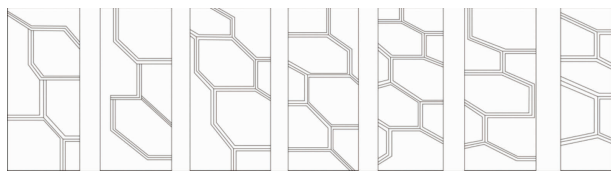


图7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  
北侧七幅界格示意图

内部界格也可以理解为“界格内的界格”。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部界格由多个不规则的六边形组成。《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中对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部界格描述如下:“纹样与石刻画像界格画纹同,唯双道间多涂色,变形云纹涂黑色或棕色,并加有其它颜色小点,显得相当醒目而美观。”<sup>[16]</sup>内部界格属于“破板式”界格,突破常规、打破界格的限制,使画面活泼而灵动。界格在后、图像在前,层次清晰,画面不受界格影响,有些画像会从一个界格延伸到

\* 左边为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南侧壁画截图,右边为笔者手绘的线稿。

占据多个界格,将各个界格内的画面勾连起来。内部界格就像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格,使每一幅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既分区又不分隔开,在画面的整体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丰富了画面层次,使二维的壁画拥有了多维的画面效果。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运用界格式构图布局,整齐合理;丰富多样的文案框格,从像边关系上来说属于遮挡式界格、离边界格和切边界格;尤其是具有独特构图美感的内部界格,破边的处理方式在丰富画面内容的同时也增强了空间层次感。

#### 四、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装饰特色

打虎亭汉墓中的壁画是绘制在白灰墙面上的。首先用青石砖砌出砖券、墙壁,用经过淘洗与沉淀后的纯净白灰泥刷在砖墙上,形成一层厚5~8 mm 的白灰面墙皮,然后打磨墙皮直至光滑,再在白灰面墙皮表面绘制壁画。壁画虽然是在墙面上绘制的,但其绘画手法、装饰效果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艺术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 1. 线条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怪兽形态各异,造型生动。用来勾勒怪兽的线条简洁流畅,刚劲有力,富有节奏感。由于汉代墓室壁画处于中国绘画发展的早期,在造型技术上还不是很成熟,粗犷的线条还带有原始时期绘画中朴素的影子。分割画面的界格严谨准确,与人物、瑞兽和植物线条的古朴粗犷形成反差,使画面有紧有松,从而在整体画面上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动态美。

##### 2. 配色

汉代对于色彩的使用,遵循着传统文化礼制下的色彩程式,有着规范的色彩观。《周礼》记载:“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sup>[17]</sup>《释名》释“五色”为:“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

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sup>[18]</sup>汉代人将“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视为“正色”。打虎亭汉墓中的彩色壁画正是以这五种“正色”为基础,并将以这五色为基础调和出的间色作为点缀,搭配出富有美感的色彩组合,足见画师丰富的绘制经验和对西汉礼法的深刻理解。

##### 3. 设色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设色方法丰富,勾填法和没骨法的熟练运用,表现出画师丰富的绘画经验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单线平涂法,也称勾填法,多见于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人物与瑞兽的绘制,其工序为先用赭色或墨色细线条勾勒出瑞兽的外轮廓线,然后在轮廓线内涂染不同的颜色,再用棕褐色或黑色细线条刻画瑞兽的眼睛、胡须等细节(见图8)。

没骨法多运用于界格中装饰图案的绘制,其不勾勒出外轮廓线,直接用颜料描绘纹案(见图9)。没骨法由于没有草稿打底,对画师的技艺要求更高,表现出画师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高超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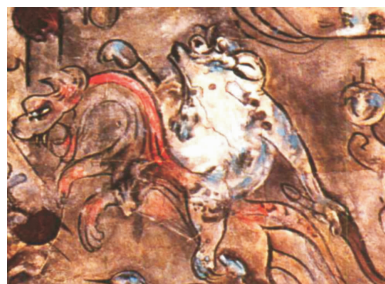


图8 单线平涂法



图9 没骨法



## 五、结语

汉代壁画艺术整体气势宏大,内容有序丰富,笔触飞扬流动。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为汉代墓葬彩绘壁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该画中描绘的珍禽瑞兽反映出汉代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淳朴的升仙思想,是对去世后神仙世界的宏大描述。壁画中的构图更是独具一格,通过边饰与界格让繁杂的珍禽瑞兽图形成了多个独立的小画面,表现出汉代壁画丰富而有节奏、繁杂而不繁琐的严谨布局。同时,壁画的线条流畅,色块清晰,各种色彩的搭配相得益彰,主次分明,使得壁画内容既统一又充满变化。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高度统一,集中体现了汉代壁画艺术的较高成就,其对于东汉时期绘画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韦娜. 略论汉代壁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J]. 考古与文物, 2005(4):62.
- [2] 杨爱国. 重生之路: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J].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0(3):99.
- [3] 杨爱国.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的世纪开篇:读《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J]. 考古与文物, 2002(4):57.
- [4] 信立祥. 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J]. 东南文化, 1999(1):47.
- [5] 练春海. 西汉长安墓室壁画研究综论[C]//河南博物院.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5.
- [6] 马振龙, 朱荔丽. 从敦煌壁画的艺术表现谈现代平面设计[J]. 敦煌研究, 2008(4):54.
- [7] 练春海. 汉代墓室壁画中的修改与涂覆[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0(5):159.
- [8] 王逸. 楚辞章句:第1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0.
- [9] 何谷清. 三辅黄图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329.
- [10] 应劭. 风俗通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58.
- [11] 顾颖. 汉画像祥瑞图式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 2015.
- [12] 萧兵. 避邪趣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3] 任昉. 述异记[M]. 武汉:崇文书局, 1875:8.
- [14]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54.
- [15] 王芳超. 汉画像石边框界格的艺术语言[D]. 西安:西安美术学院, 2016.
-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密县打虎亭汉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3:276.
- [17] 郑玄. 周礼[M]//汉魏古注十三经. 北京:中华书局, 1998:35.
- [18] 刘熙. 释名疏证补[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7.



引用格式:马全福.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84 - 90.

中图分类号: J52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1. 02. 011

文章编号: 2096 - 9864(2021)02 - 0084 - 07

#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

## Power and disciplin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narrative

马全福

MA Quanfu

广西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权力与规训现象广泛存在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并深刻影响着信息的准确传达。设计叙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叙述者(掌权者)的权力意志,并通过其叙事文本的传播对受众(权力对象)做出规训行为,以达到掌权者所需的预期效果。通过对权力理论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的结合研究发现,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主要通过操纵、说服与权威三种设计策略来实现。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有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叙事文本隐蔽结构中操纵、反复灌输主张态度渗透操纵三种形式;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有立足诉求的直接说服和罗列数据的承诺说服两种形式;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有权力诉求的命令性表达、利益驱动的诱导性表达、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三种形式。厘清这些叙事设计策略的方法与特征,可使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做到有的放矢,进一步提升信息传达的准确度。

**关键词:**  
视觉传达设计;  
叙事;  
权力;  
规训

[收稿日期] 2020 - 12 - 17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一般项目(20BZS002)

[作者简介] 马全福(1984—),男,甘肃省天水市人,广西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理论与实践。



只要存在资源掌握的不均就会存在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权力<sup>[1]</sup>。权力与规训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各类叙事之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掌权者所拥有的叙事话语权优势,导致其在整个叙事过程中都夹杂着其权力意志。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权力如影随形,掌权者的权力意志通过叙事作品的传播来体现,同时也实现对受众的规训目的。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多从图像叙事、广告叙事、书籍设计叙事等微观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几乎很少有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的宏观视角对权力与规训现象进行研究的。鉴于此,本文拟对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现象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在具体的设计叙事实践中,有效把握设计策略进而完成信息的准确传达。

## 一、权力与规训

权力与规训是一对互为前提的概念,掌权者为了自身利益会通过权力的某种形式对权力对象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对权力对象施加的影响可称为规训。权力与规训表里相依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具有同一性特征。

人们对权力的性质与定义存在多种认知。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sup>[2]</sup>。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sup>[3]</sup>。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 达尔认为,“权力是影响力”<sup>[4]</sup>。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sup>[5]</sup>。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权力是指某些个人或集体具有的,能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非预期效果的一种能力。可见,谁都有掌握权力的权利,但因某些原因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也会造成权力分配

的不平等。掌权者必然会对权力对象行使自我意志的权力输出,由此完成一次有目的的规训行为。

由权力的定义可以看出:其是通过对他人的施加影响或控制来达到某种预期或非预期效果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通过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来呈现的,因此可以说权力是由以上四种形式来施加影响或操控权力对象的。权力与规训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权力的行使过程即是其规训过程。因此,权力是通过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来完成规训的。

## 二、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策略

只要存在双方的沟通交流行为,就一定存在权力与规训现象。作为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叙事可分为时间特征的线性叙事、空间特征的非线性叙事、时空结合的综合叙事三种类型。人们依赖视觉进行非线性的空间叙事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在其漫长发展历程中的个别时期被文学的线性叙事所掩盖。在机械复制技术成熟之后,视觉叙事重新走向前台,非线性的时空结合的综合叙事形式开始充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视觉叙事的一种重要形式,视觉传达设计叙事在信息的视觉化传播过程中,与文学一样同样存在着权力与规训现象。作品信息的叙述者即掌权者,通过各种设计叙事手段来完成掌权者自我意志的表达,由此来达到对观者的规训目的。由前述可知,权力与规训是同时进行的,权力的行使过程同时也是其对观者的规训过程,因此从权力的呈现形式入手,分析视觉传达叙事过程中的权力与规训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中的“规训”一词虽借鉴自福柯,但此规训非彼规训,福柯的规训主要针对人身体的干预,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

等手段,认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作对象又视为操作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sup>[6]</sup>。而本文中所指的规训是不能干预现实身体的,只能通过视觉、心理或思维等更为隐蔽的手段进行。如前所述,权力的呈现形式有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由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属于视觉语言叙事领域,即便其带有超强的权力意志,也决不能采取武力干预来实现规训,一切还需从视觉、心理和思维等层面进行。因此,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剔除权力的武力模式,其权力与规训可采用操纵、说服与权威三种叙事设计策略来实现。

### 1. 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

在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操纵式权力与规训模式是一种不告诉权力对象行为目的的隐蔽行为,其既能体现掌权者的权力意志,又能使权力对象有所觉察,是在隐蔽状态下完成权力规训的。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是一种在叙事中传达信息的传播方式,其受叙对象既可以是熟悉的人,也可以是陌生人。因此,采取操纵式设计叙事策略行使权力与规训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权者可以通过用作隐蔽暗示的符号通信,对权力对象行使秘密控制,以限制或有选择地决定权力对象的信息供应;一种是不露声色地反复灌输某些积极或消极态度<sup>[5]35</sup>。这就需要设计者在进行设计叙事文本建构时不能使用明显的劝告、指引或强制性的视觉语言,权力只能隐蔽于某一叙事设计程序中,权力对象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并执行着掌权者的预期行为,在不经意叙述中体现掌权者的意志,由此完成一次权力的操纵式规训。

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叙事文本隐蔽结构的暗中操纵、反复灌输主张态度的渗透操纵。以上三种策略可以说是一种“阴谋”式的

策划行为,反映在设计叙事结构中可以五种方式存在,即交互、并叙、正叙、插叙与重复,唯独缺了倒叙,因为不能直接给出权力诉求与目的。权力对象在不知不觉间跟随掌权者所设定的程序进行,在完成预设程序之时才感知到叙事目的与诉求,由此产生权力效果,也就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训行为(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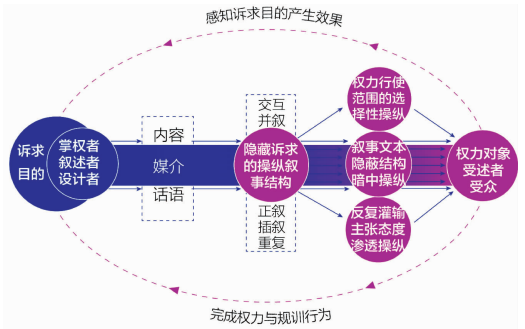


图1 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是对权力行使范围选择或数量的有意控制,以完成既定的规训目的。直邮广告就是一种有意选择传播范围和数量的操纵行为,通过对特定受众群体的定位且采取相应的设计手法,从而达到对特定目标群进行权力的操纵规训。例如,音频工程公司GGRP Sound的直邮广告(见图2),将一个简易的纸盒唱片机放入信封中,并邮寄给特定的目标群体,当人们组装后用铅笔转动唱片时会发出声响,暗示着GGRP Sound在声音工程领域拥有的强大能力。

叙事文本隐蔽结构的暗中操纵,是在叙事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掌权者并不告诉受众叙事主题,也不告诉受众具体目的,仅仅营造一种叙事情境,充分利用目标受众群的知觉特性,隐蔽地操纵受众,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掌权者所希望的预期行为。例如,Wilkinson剃须刀户外互动广告(见图3),在户外竖立一块满脸胡须的男性形象展板,其中的胡须是由玫瑰花从展板背面穿插出来形成的,行人看到这样的广告

板会忍不住去拔掉胡须,结果拔出来一朵玫瑰花,花上附有 Wilkinson 剃须刀的产品信息。这一广告叙事是通过受众的广泛参与实现的,广告方有意设置一个隐蔽的操纵式叙事设计结构,通过与受众的互动来体现叙事主题,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完成了规训。

反复灌输主张态度的渗透操纵是潜移默化式地影响受众的思想与行为,甚至采取视觉轰炸般的方式反复进行。例如,农夫山泉广告(见图4):“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其并没有告诉受众要购买产品,而是通过反复地灌输品牌主张,暗示其产品不含任何添加剂,主打纯天然无污染的品质价值取向。在反复播放的过程中,品牌主张逐渐渗透于目标受众的意识之中,受众有了一定的知觉经验后,就会转化成为先验认知而影响自身行为,从而完成对权力对象有目的的规训。

## 2.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

与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的隐蔽性引导不同,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是明显带有劝说意味的一种视觉叙事策略,它是利用视觉形象来完成说服目的的。视觉形象叙事有着语言文字叙事所没有的叙事优势,具有形象性、标记性和结构不确定性。形象性可以通过模拟再现某人或物的真实情况而引起受众的情感变化;标记性在说服过程中起到突出叙事主题而增加叙事可信度的作用;相较于语言文字的确切叙事,视觉语言的时间表述缺陷使视觉叙事具有结构不确定性特征,在叙事过程中赋予受众更高的参与度,使叙事主题可以在受众参与下得以显现。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采取特定视觉符号组织成意义文本,在构建意义文本时会遵循一定叙事主题,因此视觉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一定会带着掌权者的权力意志,并明白直接地告知受众



图2 音频工程公司 GGRP Sound 的直邮广告



图3 Wilkinson 剃须刀户外互动广告



图4 农夫山泉广告



叙事权力诉求。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既可采取直接劝说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视觉语言营造某种叙事情境来引导说服,列出相关依据给受众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有真实的和不真实的两种形式:参照事实依据进行叙述来说服的,承诺就是真实可实现的;对事实依据进行了夸张叙述的承诺即是不真实的承诺。与操纵式叙事不同,说服式叙事包括了视觉叙事的全部六种结构(交互、并叙、倒叙、正叙、插叙和重复),其设计策略主要有立足诉求的直接说服和罗列数据的承诺说服两种,综合考虑权力诉求、叙事内容、叙事媒介和叙事结构等的关系,最终确定使用哪种叙事设计策略,告知受众需要进行某种行为改变或产生预期效果,进而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训(见图5)。

立足诉求的直接说服主要利用视觉语言建构一种直白式说服叙事文本,也可将抽象的数据信息进行视觉化转换,清楚明白地告知受众叙事主题。例如,由詹斯·蒙哥马利·弗拉格设计的美国二战征兵海报“**I WANT YOU**”(见图6),就是利用文图结合的方式进行权力的直接说服叙事,从权力诉求入手直接明白地劝说青年为国参军。图中指代美国形象的山姆大叔和说服话语相互配合,清楚地告知受众这一广

告叙事的诉求与目的,进而完成权力的输出和对受众的规训。

罗列数据的承诺说服常通过邀请名人代言陈列数据进行视觉说服,给受众一种潜在的承诺,暗示使用某种产品即可享受代言明星般的生活,以此来规训受众,产生预期的行为变化。例如,雅诗兰黛护眼霜广告(见图7),即通过明星代言,告知受众使用该产品将会拥有明星那样的光鲜肌肤,进而说服受众产生购买行为。由于广告设计艺术处理手法不同,会有真实与虚假承诺之分,一般鼓励在数据基础上进行合理夸张的真实承诺,对毫无依据的虚假承诺需要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 3. 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

权威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是权力的一种呈现形式,“权威”这一权力呈现形式有着权力强制性、命令性特征,同时与权力又有所不同,“权威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带来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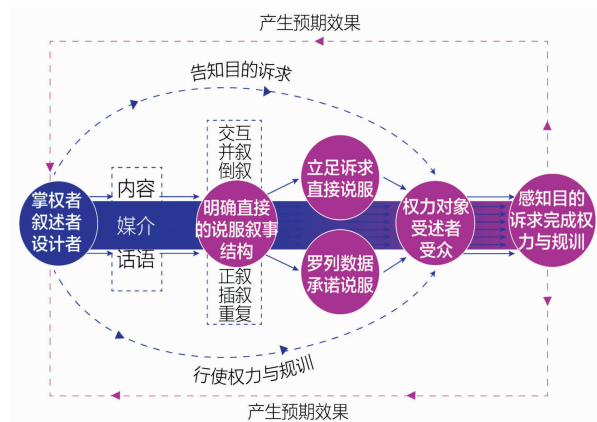


图5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图6 美国二战征兵海报



图7 雅诗兰黛护眼霜广告

威信和力量”<sup>[7]</sup>。权威可以使权力效果增强,也可以降低行使权力的成本。“权威性权力实际上是集团或制度以意志力造成的。它是由明确的命令和有意识的服从组成的。”<sup>[8]</sup>由此可知,权威是更高层次的权力形式,建立在相同认知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强制权威、诱导权威和合法权威三种形式。强制权威具有命令性特征,直接明白地告知受众掌权者的权力诉求,并要求其遵守并执行相关规定准则;诱导权威是通过给予权力对象某些奖励,诱导其产生预期的行为变化;合法权威建立在广泛共同认知的基础上,这种共同认知不局限于权力双方,而是更大范围的共同认知。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应准确把握这三种权威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使用其对应的权力诉求的命令性表达、利益驱动的诱导性表达、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三种叙事设计策略。

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与前两种叙事设计策略的最大不同点,在于这类设计策略有一个广泛的共同认知基础。在进行叙事设计时,可根据权威性权力的特征与诉求,选择相应的叙事内容与叙事媒介,然后以此为基础考虑叙事结构的编排与设计策略的选择。权威式叙事设计同样包括了叙事的六种结构类型,在确定采用某种叙事结构时,需要考虑叙事结构与设计策略的匹配关系,选择三种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中的最佳方案,把权力诉求告知权力对象进而完成规训行为(见图8)。

(1) 权力诉求的命令性表达。此类叙事设计常见于各类规章制度、行为准则、公益宣传等领域的视觉叙事设计中,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编排或创意表达,来达到对权力对象的命令或警示。强制性是此类叙事设计策略的主要特征,如果权力对象没有进行相应的行为改变,权力将会上升到武力干预,也就超出了视觉设计范畴,这也是与其他几类叙事形式的最大区别。

例如,拒绝酒驾广告(见图9)清楚明白地告知权力对象不要酒驾,这一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如有违反必将受到惩罚。当然,权力诉求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直接会影响到权力的施行效果,甚至会牵涉到法律层面。

(2) 利益驱动的诱导性表达。它通过对权力对象给予某些奖励,从而诱导其按照掌权者的意志行动,是把奖励与诉求同时呈现的一种叙事形式。例如,设计大赛征集海报(见图10)为首届中国“繁昌窑”陶瓷创意设计大赛的征集海报,其通过奖项的设置来诱导大家积极参与比赛。此类叙事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如超市促销宣传材料、公益活动宣传海报等。

(3) 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该类视觉化设计主要是针对权力双方共同认可的某些行为准则或制度,把一些抽象或复杂的双方认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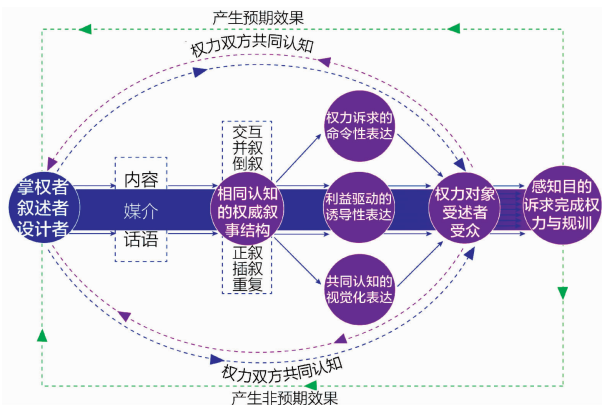


图8 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图9 拒绝酒驾广告 图10 设计大赛征集海报

内容视觉化地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一次权力的规训。由于有了共同的认知基础,权力的施行较为容易且更易被权力对象所接受。例如,交通导向标志牌(见图11),就是采用这种设计策略,通过对大家所公认的公共交通规则进行视觉化设计,以视觉的方式告知受众行为准则。



图11 交通导向标志牌

### 三、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且时刻影响着权力双方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掌权者通过或隐或明的引导与劝说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训,使其产生预期行为。权力通过长期累积之后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权力共识,当人们有了某种权力共识之后权威自然应运而生,其反过来也会促进权力的操纵与说服策略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权力与规训行为。

因此,无论是操纵式叙事还是说服式叙事或权威式叙事,其权力的规训过程都是一个双向的闭环式结构。掌权者(叙述者)选择一定的叙事内容与叙事媒介,并根据相应的权力特征与特定诉求,选取相应的叙事结构与设计策略,从而把权力诉求告知权力对象(受述者),权力对象在接收到信息并完成规训之后,又通过不同方式反馈给掌权者(叙述者),并影响掌

权者进一步的权力规训行为。由此可见,权力与规训是在权力双方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提高的螺旋式循环中进行的。

本研究通过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的权力理论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相结合,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问题,并研究总结出具体设计策略,希望能为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对设计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指导。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有关权力在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传播机制、叙事话语分析和权力三种设计策略间的相互关系等的研究,是今后需要继续关注的研究重点。

### 参考文献:

- [1] 菲佛. 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M]. 杨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6.
- [2] 罗素. 权力论[M]. 靳建国,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3.
- [3] 米勒,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95.
- [4] 达尔,斯泰恩布里克纳. 现代政治分析[M]. 吴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6.
- [5] 朗. 权力论[M]. 陆震纶,郑明哲,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
- [6] 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93.
- [7] 陆德山. 认识权力[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7.
- [8] 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M]. 刘北成,李少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



引用格式:尹悦,景莹.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热点、问题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91-101.

中图分类号:H05;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91-11

# 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热点、问题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 Hot spots, problems and trends of domestic diplomatic discourse research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of CiteSpace

尹悦,景莹

YIN Yue, JING Ying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2010—2020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外交话语研究的 265 篇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近 11 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论文刊发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外交学和语言学是其分布最多的两大学科;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比例较低;话语分析法是其研究使用的最主要方法;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与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翻译是其研究的热点;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体育外交等将是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前沿。通过梳理文献,深入剖析发现: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深度融合不够、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和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以及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匮乏等问题。未来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加强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互动,促进外交话语的跨学科理论构建;应发挥语料库、Ucinet、SPSS、CiteSpace 等数字人文技术在外交话语研究中的信息挖掘和分析运用功能,拓展外交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应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助力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关键词:**  
外交话语;  
CiteSpace;  
话语分析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收稿日期]2021-01-0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第 68 批面上项目(2020M68232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CYY029)

[作者简介]尹悦(1987—),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外交话语、语言政策;景莹(1996—),女,山西省大同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交话语。



外交话语是一国外交实体关于本国外交理念、政策、立场等所用的语言与话语行为,即与外交活动相关的所有官方语言、文本。国外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1980年左右,主要是将其融合在政治话语中进行研究的。我国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2006年左右,早期的研究较为零散、不系统。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呈井喷之势。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最早始于外交学领域,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语言学界逐渐关注外交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外交话语如何反映国家间关系、建构权力与对外政策、促进外交政策实施等<sup>[1]</sup>。然而,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急需学界对目前的外交话语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对策,以推动我国外交话语的跨越式发展。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论文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的知识图谱分析,把握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态势,预测外交话语的研究前沿,并指出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不足和可提升空间,以期为我国外交话语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 一、研究方法

### 1. 研究工具

利用 CiteSpace 5.3.R8 进行数据矩阵创建、数据转化和整理,利用 CiteSpace 5.0.R1 进行图谱绘制。根据图谱中的关键节点、聚类 and 颜色分布来分析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并结合

主题路径和突现词来分析外交话语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 2. 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将检索关键词设定为“外交话语”,时间设定为2010—2020年,共获得期刊论文277篇,经人工筛查后,滤除无效数据,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265篇\*。

### 3. 研究问题

本文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呈现什么特征?二是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有哪些不足和可提升空间?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 二、数据分析和讨论

### 1. 年度分布

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年度发文量走势见图1。由图1可知,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论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缓慢发展期(2010—2015年)。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发文总量为65篇,年均发文量11篇左右。这一情况与在此之前外交话语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增长期(2016—2020年)。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相关文献量开始大幅度增加。2016—2020年总分文量为200篇,年均发文量为40篇。这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规划密不可分。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2016年3月5日,“中

\* 本文数据只限于期刊论文,不包括学位论文、报纸文章、书评等其他文献类型。



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次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后,我国外交战略、外交规划、外交理念越来越清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国外交总体有了新理念和新定位,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和构建也逐渐重视起来<sup>[2]</sup>。因此,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逐年增长,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外交话语研究项目也逐渐增多,本文所统计的265篇文献中,有87篇是基于该类项目的资助。2020年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虽有大幅度回落,但不影响发文量整体增长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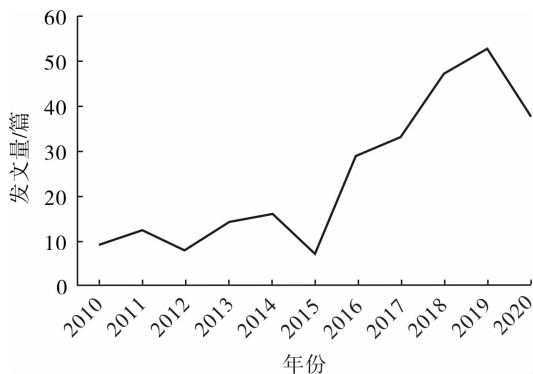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年度发文量走势图(2010—2020年)

## 2. 学科分布

通过对265篇文献的学科分布统计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是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分布最多的两大学科,分别占比46%和35%,然后依次是新闻传播学(10%)、历史学(7%)和经济学(2%)。外交学视阈下的外交话语研究,多为宏观探讨,主要集中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话语的体系构建,包括构建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等。杨洁勉<sup>[3]</sup>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应充分发挥外交话语优势,如中国外交实践所产生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同时应注重外交话语体系的多重构建,如

外交话语的政治构建、学术构建、政界和学界的共同构建、中国和外国共同构建,以及外交话语的领域和技术构建等。二是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现状与提升策略。张志洲<sup>[4]</sup>提出了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明确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与战略重点;努力拓宽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重视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建设。随着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剧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常用的外交话语策略进行探讨,如规避回答、“前景化”、隐喻、互文性;二是对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讨论,如杨明星<sup>[5]</sup>提出了外交话语翻译的四大原则: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三是对外交话语功能的探讨,如徐中意<sup>[6]</sup>认为外交话语具有正常化意识形态、模糊化外交立场和合法化外交行为的功能。

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外交话语研究多局限于本学科的视角,跨学科互动不足,如外交学界的研究很少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很难为外交话语构建提供具体的策略指导;语言学界的研究则偏向于话语策略、翻译等微观层面的探讨,未能揭示话语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等,无法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为外交决策提供有效谏言。此外,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合作率\*统计发现,作者所在单位总合作率为0.23,作者之间总合作率为0.34,均距1.00相差较远,这反映了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领域各机构和学者间的合作度较低,跨学科互动不足。

## 3. 期刊分布

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发表期刊分布统计发

\* 合作率能够揭示某领域内的合作智能发挥程度,数值越接近1,合作智能发挥就越充分,其计算公式为合作率=相关合作论文数/相关论文总数。

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有72篇,占全部发文量的27%。其中,发表在外交学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25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20%,主要发表在《外交评论》《南亚研究》《西亚非洲》等刊物上(见表1)。发表在语言学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39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41%,主要发表在《外语研究》《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见表2)。总体来说,外交话语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比例较低。

#### 4. 研究方法

外交话语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诠释法、案例分析

表1 刊发外交话语研究成果的外交学类  
核心期刊统计表(2010—2020年)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量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量
1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3	11	当代世界	1
2	南亚研究	2	12	思想战线	1
3	西亚非洲	2	13	社会主义研究	1
4	国际观察	2	14	国际问题研究	1
5	世界经济与政治	1	1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
6	东北亚论坛	1	16	当代亚太	1
7	国际展望	1	17	当代中国史研究	1
8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1	18	国际政治研究	1
9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1	19	俄罗斯研究	1
1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	20	瞭望	1

表2 刊发外交话语研究成果的语言学类  
核心期刊统计表(2010—2020年)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量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量
1	外语研究	6	7	外语学刊	2
2	中国外语	6	8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
3	教学与研究	6	9	现代外语	2
4	外语教学	4	10	外国语文	2
5	上海翻译	4	11	当代修辞学	1
6	中国翻译	4			

法、语料库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包括批评话语分析法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法)等。通过对265篇期刊论文的梳理发现,一篇论文中经常会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其中话语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部分学者尝试将语料库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相结合来研究外交话语中的国家形象、外交思想等<sup>[7]</sup>。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将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引入外交话语研究中,探讨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和身份建构<sup>[8]</sup>。

#### 5.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共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反映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sup>[9]</sup>,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则能够揭示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sup>[10]</sup>。基于共词分析原理,可以通过统计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的共现情况,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而确定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研究热点<sup>[11]</sup>。通过网络节点选择关键词,采用默认聚类视图,将图谱中零散关键词剔除,手动进行简单调整后,得到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见图2。图2中共计330个节点和624条连线,节点数表示关键词个数,节点间连线越多,表示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关系越紧密。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近十年国内外交话语的研究主题,又利用Co-occurrence 6.1\*软件进行了分词、关键词频次统计与词云图绘制(见图3),字体越大表明该词出现的频次越高,研究结果与图2基本一致。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能够说明目前国内外交话语方面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在图2中,“外交话语”节点最大,共现频次最高,在图中最为显著;然后依次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和“习近平”。在图3中,“外交话语”的字号最大,接着依次是

\* 该软件是一款用于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的软件。



图2 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节点网络图(2010—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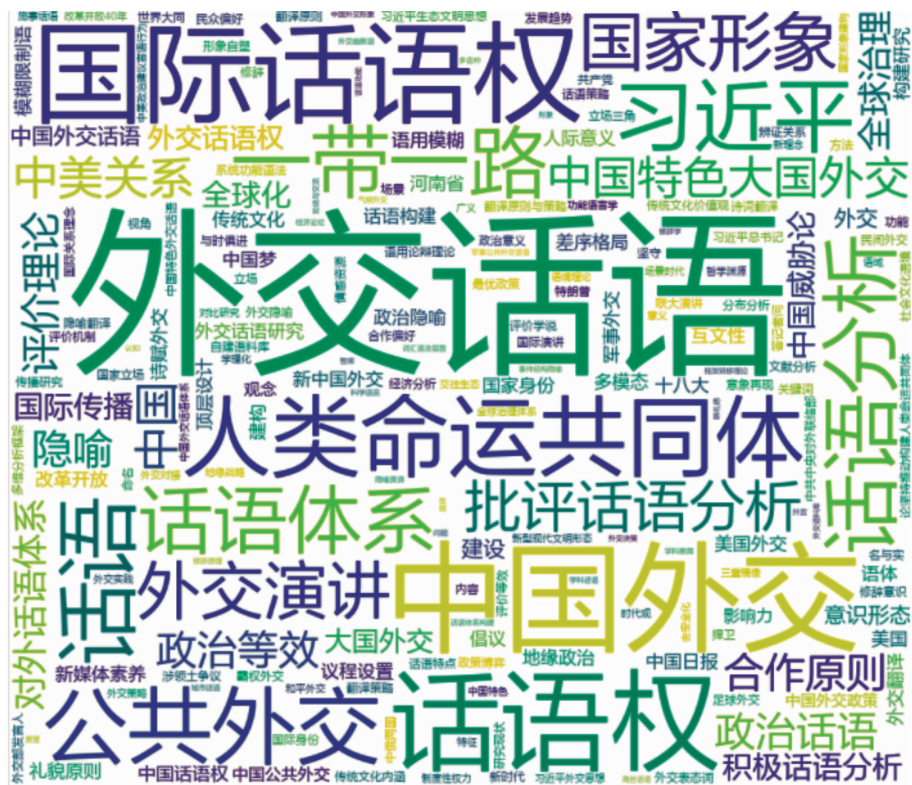


图3 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词云图(2010—2020年)

“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和“习近平”，与图2的

结果基本一致。利用 CiteSpace S. ORI 的自动计算功能,对关键词的中心性数值进行统计后

发现,高中心性的关键词依次为“外交话语(0.41)\*”“话语权(0.25)”“国际话语权(0.22)”“中国外交(0.13)”“习近平(0.11)”“公共外交(0.07)”和“话语分析(0.07)”。由此可见,“话语权”“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习近平”,不仅是近十年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是外交话语研究中起联结作用的重要支点。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该领域研究文献,可以将外交话语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外交话语权是指一国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sup>[3]</sup>,其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sup>[12]</sup>。外交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外交话语权,在外交实践方面通过不同路径不断提高中国的外交话语权<sup>[13]</sup>。因此,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例如,王义桅<sup>[14]</sup>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方案;李战子<sup>[15]</sup>则从军事外交领域出发,梳理了话语权构建的四个方面,讨论了构建军事外交话语权的内涵和路径。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近年才提出的,目前尚在建构完善之中,学者围绕其展开了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构建、翻译和传播三个方面。例如,卢静<sup>[16]</sup>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内涵、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功能定位等进行了具体阐释;安丰存等<sup>[17]</sup>从话语秩序、话语体系差异、政治词汇标准化和规范化、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外交话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胡开宝等<sup>[18]</sup>关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

播效果,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中国核心外交词汇在国际上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和翻译两个层面,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较为薄弱,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其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翻译。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内涵丰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和平发展、大国外交、全球治理等核心理念。宋效峰等<sup>[19-20]</sup>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价值、理论内涵、发展演进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包括独立自主的道路观、和平发展的世界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秩序观,展示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观与战略理念。邢丽菊<sup>[21]</sup>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与互鉴观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容,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性、整体大局性和包容互补性等内涵。钟含春等<sup>[22]</sup>从语用角度对习近平外交话语的风格特点及其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话语的特点是善讲友谊故事、博引中外经典和巧用概念隐喻,译者应学会使用“信”“转”“化”等翻译策略。

## 6. 研究前沿

通过对265篇外交话语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提取,根据其出现次数,得到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见图4),圆圈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标签,根据时间跨度将每个聚类下的词簇按照初次关键词出现时间进行排列,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5),该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间段内外交话语领域的热点主题。通过计算关键词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出现的次数,得到外交话语研究和关键词突现图(见图6),该图可以反映出外交话

\* 括号内的数值为该词的中心性数值。



语研究领域的转折点,便于发现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骤然变化<sup>[23]</sup>。通过图 4 和图 5,我们

大致可以梳理出近 11 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2013 年以前,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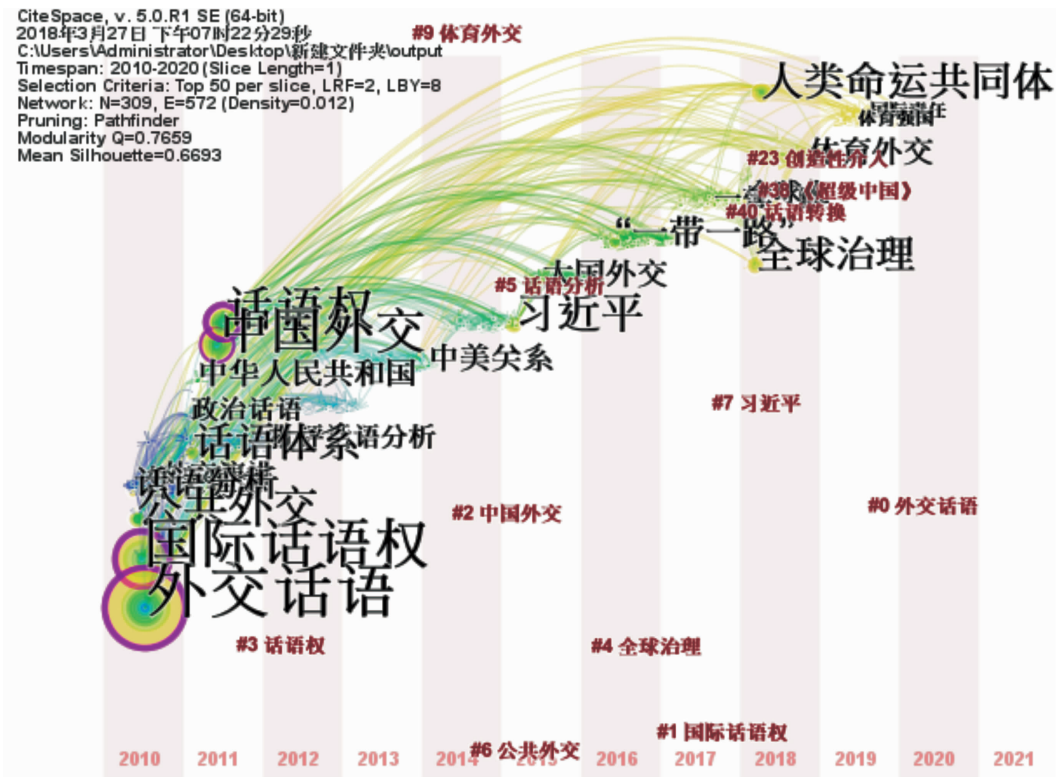


图 4 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分布图(2010—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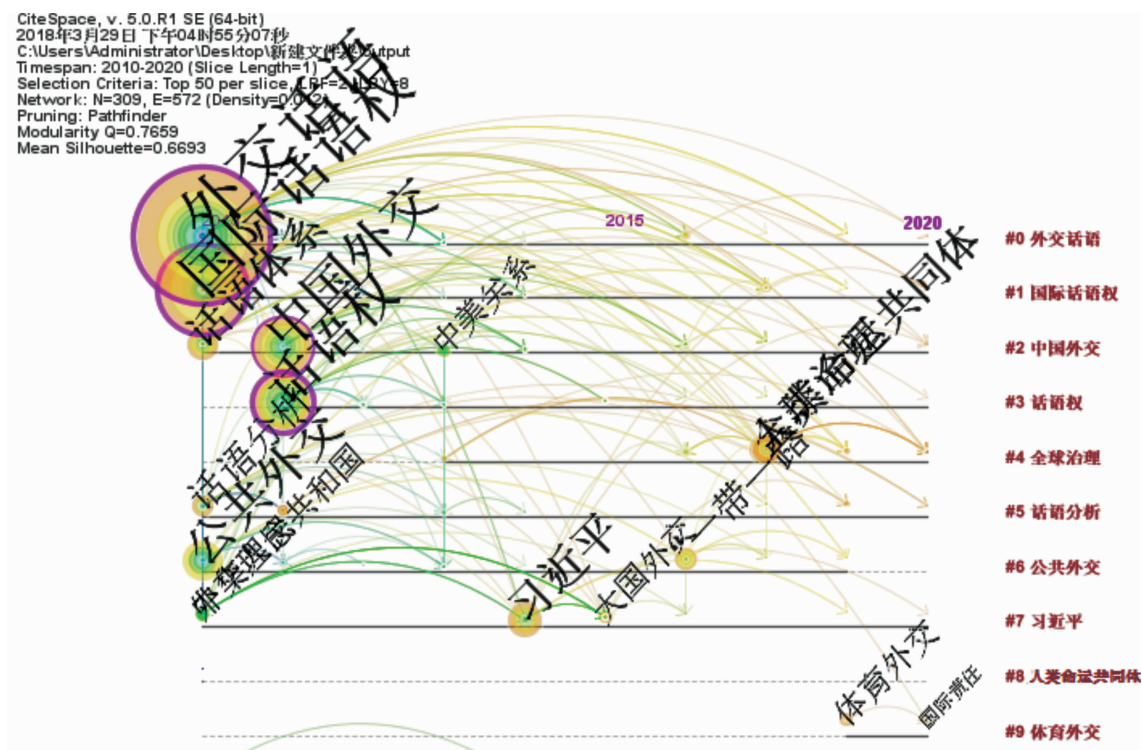


图 5 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时间线图(2010—2020 年)

集中在话语权构建、中美关系等方面,很少讨论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更加强调“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因此,对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责任等中国外交话语、外交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由图6可知,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外交、习近平等是2016年以来的热点研究主题。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现强度远大于其他词,为3.3404,表明其研究热度最高;“全球治理”紧随其后,突现强度为2.5522。这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蓬勃发展的方案不谋而合。将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关键词时区分布图、时间线图和突现图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治

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体育外交将成为外交话语研究的前沿。

### 三、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 1. 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论文刊发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结合265篇具体的研究文献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还有许多可提升的空间。

其一,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的融合不够。从外交话语研究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外交学界和语言学界还未形成良性互动。虽然有部分学者尝试从语篇和话语分析角度研究对外政策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很少有研究真正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略显不足,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而语言学领域多将外交话语作为话语的一种特殊体裁,

**Top 13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6 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2010—2020年)

仅关注外交话语的语言特点和使用规律,很少关注外交话语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本文所搜集的 265 篇期刊论文中,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外交话语研究的共有 95 篇,其中 27 篇文献探讨了周恩来、习近平、奥巴马、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外交话语风格;46 篇文献探讨了外交话语中常用的话语策略,如互文性、隐喻、模糊语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阐释外交话语背后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文献不足 13 篇。但是外交话语的超学科属性,决定了外交话语的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唯如此,才能解释、解决外交话语背后隐藏的外交问题。

其二,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近 11 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体育、气候、科技、卫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见图 7)。这主要是因为外交话语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但其他领域的外交话语也是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相对于政治话语而言,体育、气候领域的外交话语争议较少,如果能找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外交优势,探寻出建设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权路径,便能促进我国外交话语权的整体提升,从而为处理好外交事务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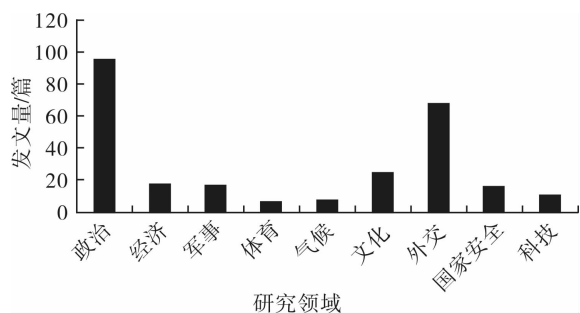


图 7 外交话语研究的具体领域分布图  
(2010—2020 年)

其三,对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胡开宝<sup>[24]</sup>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不仅包括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也包括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美英等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上,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统计发现,现有的 40 篇他国外交话语文献中,涉及美国的有 21 篇,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的国别研究较少关注周边国家。但是我国横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甚至北亚区域,周边邻国较多,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 对全球 100 多种语言的媒体调查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并不友好,对中国评价负面报道最多的三国媒体,分别是韩国、日本和越南。因此,研究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体系,把握周边邻国对我国外交话语的议程设置、态度倾向,对于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促进我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四,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不足。杨明星<sup>[25]</sup>认为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要依次经过三个关键路径:话语构建(文本生成和中文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表达)和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这三个层面不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其对外传播,而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反过来又可以为构建和翻译提供建议和参考。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外交战略的导向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力度虽大,但效果甚微。一国的外交话语能否在他国起到预期的效果,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接受。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方面,很少关注外交话语的受众特点和传播效果。这就需要通过数字人文等技术手段,加强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依据

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符号、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构建受众习惯的、易于接受的外交话语体系。

## 2. 未来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趋势

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提出,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未来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其一,加强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互动,促进外交话语的跨学科理论构建。外交话语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外交学者和语言学者应展开广泛的合作。因为外交话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必须有外交学的理论支撑,而具体的话语分析实践,又可以为外交学理论的阐释提供话语事实依据。外交学和语言学只有实现从理论到具体分析层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外交话语学科的发展。

其二,注重语料库、Ucinet、SPSS、CiteSpace等数字人文技术在外交话语研究中的信息挖掘和分析运用,拓展外交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国内语言学界的外交话语研究停留在语言策略、语言特征等表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用的语料库方法无法提取语义、句法、文本与话语的关系,无法解释话语的生成机制,需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的深度挖掘。

其三,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改变只关注大国外交的现状,形成以外交事件为导向和驱动的外交话语研究。

其四,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助力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因为只有通过对中国外交话语在他国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才能全面把握他国受众对中国外交思想、外交理念的认

知和理解情况,进而找出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规划。

## 参考文献:

- [1] 尤泽顺. 外交话语研究:话语分析如何与外交研究深度融合[J]. 外国语言文学,2019(5): 487.
- [2] 王鹏. 2014 中国特色外交:新定位新理念新挑战[EB/OL]. (2015-01-20)[2020-11-10]. [https://theory.gmw.cn/2015-01/20/content\\_14574970.htm](https://theory.gmw.cn/2015-01/20/content_14574970.htm).
- [3] 杨洁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J]. 国际问题研究,2016(5):18.
- [4] 张志洲. 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J]. 当代世界,2012(7):12.
- [5] 杨明星. 中国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J]. 中国翻译,2014(3):103.
- [6] 徐中意. 外交话语模式分析框架的构建: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J]. 外国语文,2020(1):19.
- [7] 汪徽,辛斌. 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研究[J]. 外语教学,2019(3):32.
- [8] 潘艳艳. 多模态认知批评视角的军事新闻报道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5):22.
- [9] 辛伟. 知识图谱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342.
- [10] 赵蓉英,许丽敏. 文献计量学发展演进与研究前沿的知识图谱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65.
- [11] 冯璐,冷伏海. 共词分析方法理论进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88.
- [12] 鲁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话语权与信息安全[J]. 求是,2010(14):13.
- [13] 孙吉胜.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3):19.
- [14] 王义桅. 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2):60.



- [15] 李战子. 建设军事外交话语权:内涵和路径——从话语分析的视角[J]. 外语研究,2017(1):16.
- [16] 卢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刍议[J]. 教学与研究,2018(5):85.
- [17] 安丰存,王铭玉. 政治话语体系建构与外译策略研究[J]. 外语教学,2019(6):5.
- [18] 胡开宝,田绪军. 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中的中国外交形象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 中国外语,2018(6):79.
- [19] 宋效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探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8(5):15.
- [20] 苏长和. 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J]. 人民论坛,2014(6):28.
- [21] 邢丽菊.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J]. 东北亚论坛,2018(6):3.
- [22] 钟含春,范武邱. 习近平外交话语风格特点及传译研究[J]. 上海翻译,2018(3):46.
- [23] 陈超美,陈悦,侯剑华,等. CiteSpace II: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 情报学报,2009(3):408.
- [24] 胡开宝.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研究:内涵与意义[J]. 山东外语教学,2019(4):12.
- [25] 杨明星. 一带一路话语政策规划推动大国外交形象构建[EB/OL]. (2020-04-17)[2020-11-10]. [http://www.cssn.cn/skjj/skjj\\_jjyw/202004/t20200417\\_5115471.shtml](http://www.cssn.cn/skjj/skjj_jjyw/202004/t20200417_5115471.shtml).



引用格式:潘晓瑜. 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构建和理解[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102-07.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2.013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2-0102-07

# 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构建和理解

##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from the relevance theory perspective

潘晓瑜

PAN Xiaoyu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关联理论;  
隐喻;  
推理;  
认知语境;  
临时概念

摘要: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 强调隐喻的深层认知机制, 对交际过程和认知语境重视不够。作为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 关联理论强调理解隐喻时交际过程和认知语境之间的互动, 是对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补充。研究发现, 关联理论视域下的隐喻构建和理解是听者在特定认知语境下经过推理以寻求符合关联期待的临时概念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20-02-10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YY027); 郑州轻工业大学第四批青年教改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YY021)

[作者简介] 潘晓瑜(1981—), 女, 河南省安阳市人, 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自亚里士多德时期起,隐喻就广受各界关注。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看作语言的偏离现象,视为锦上添花的装饰物。同样把隐喻作为偏离标准和字面意义的现象的还有传统语用学。H. P. 格莱斯<sup>[1]</sup>认为,隐喻、夸张和反讽等都有特殊会话含义,其都与事实存在一定差距,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指不说假话,只说真实可信的话)。传统语用学认为听话人对隐喻的理解经过了以下步骤:其一,听话人分析语句的字面意义;其二,判断该字面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下是否合适;其三,如果字面意义在当时语境下不合适,需要根据合作原则寻求其符合说话人意图的隐喻义。也就是说,人们对隐喻的理解比对字面意义的理解更困难,需要进行额外的推理和认知加工。但是,B. 克拉克<sup>[2]</sup>认为,H. P. 格莱斯的隐喻观对言者意图、听者推理能力、隐喻类型缺乏清晰的解释,且心理学实验证明人们对隐喻和非隐喻的加工时间并没有明显差异,不支持 H. P. 格莱斯对隐喻的解释<sup>[3]</sup>。因此,传统修辞学和传统语用学对隐喻的解释均不够清楚。

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对隐喻有了全新的解释,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隐喻研究转向认知视角。之后,隐喻不再是文学的附属品,而开始被视为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一种认知和思维工具<sup>[4]</sup>。1980年代,语用学在法国学者 D. 斯珀波和英国学者 D. 威尔逊的带领下发生了认知转向,他们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的认知语用学关注意义的在线推理,探讨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是一门在动态的语境中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sup>[5]</sup>。关联理论的隐喻观兼顾认知和语用交际,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隐喻理论作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

尽管关联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存

在差异,但二者都试图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如何使用和理解隐喻的,都认为隐喻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的、普遍的甚至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sup>[6]</sup>,都从认知角度探讨隐喻的发生和理解。然而,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机制在语言理解(如隐喻理解)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和效果重视不够。因此,学界开始关注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对隐喻研究上的结合和互补研究,如张辉等<sup>[7-9]</sup>。本文拟从认知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视角探析隐喻是如何构建和理解的,以期拓宽隐喻研究的范围和理论视野。

## 一、认知语言学和隐喻

认知语言学中有关隐喻的创新理论当数概念隐喻理论,其由认知语言学创始人 L. 乔治和 J. 马克在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系统阐述。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不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因此,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sup>[10]</sup>。但是,概念隐喻理论面临着来自学界的诸多质疑。李福印<sup>[10]</sup>总结了概念隐喻的 14 个问题,如方法论问题、映射的量化标准问题、隐喻鉴别问题、恒定原则问题等。

与认知语言学和隐喻有关的另一个理论是由美国认知语言学家 G. 福康涅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包括 4 个概念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投射特定的结构,从而在合成空间产生新的浮现特征,即不是喻旨和喻体本身的特征,而是听者在隐喻解读过程中临时出现的特征,这一浮现特征与输入空间的意义不同且有创新性,在隐喻理解过程中有重要作用<sup>[11]</sup>。例如,在对“Surgeons

are butchers”这一经典例句的理解上,概念整合理论要比概念隐喻理论更有解释力。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Surgeons are butchers”(外科医生是屠夫)的意义是“Surgeons are incompetent”(外科医生是无能的);而概念整合理论认为,分别从目标域输入空间“surgeons”(外科医生)和源域输入空间“butchers”(屠夫)中选取某些特定的语义信息,这些信息组合之后在合成空间生成新的额外的浮现特征,即“incompetent”(无能力的)。概念整合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和其他认知现象包括推理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强调认知机制的重要性,但对交际活动和语境重视不够。

隐喻是一种涉及大脑神经和认知活动的复杂语言现象,仅靠一种理论或一种视角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因此,需要对其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隐喻的语用学视角解释的是隐喻是如何被理解的,听话人是如何解读说话人的意义的。尤其是关联理论,认为隐喻是在自然交际过程中的松散使用,夸张和近似表达等都不是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概念映射下的表层语言。

## 二、关联理论和隐喻

关联理论由法国学者 D. 斯珀波和英国学者 D. 威尔逊于 1986 年提出、1995 年修订的,是语用学领域最具争议性、影响最广的理论。关联理论,顾名思义,以关联性作为人类交际和认知的核心,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推理过程,尤其注重探索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sup>[12]</sup>。早期的关联理论以 D. 斯珀波和 D. 威尔逊所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为代表,新关联理论以美国语言学家 R. 卡森的《思维和话语:明示交际的语用学》为代表。

早期的关联理论不涉及临时概念,认为只要听者能识别出言者意欲表达的蕴含义和摒弃言者不欲表达的蕴含义,则对隐喻的理解就算完成了。新关联理论则认为,编码概念在解读过程中被不断调整,隐喻表达的命题是一种明示,包含一个随语境调整的临时概念。也就是说,早期的关联理论认为隐喻的含义是命题整体层面产生的隐义,新的关联理论则把很多原先归于隐义的隐喻含义(整体命题含义)重新划归为显义(局部概念含义)。

不论是早期的关联理论还是新关联理论,都认为对隐喻的理解并无特殊性,所需的认知能力和推理过程与理解其他语言现象并无二致,都遵循关联原则<sup>[13]</sup>,都认为对隐喻的理解与对近似表达、夸张和其他语言的松散使用等的理解和工作机制相同。根据关联理论的话语理解程序,言者通过隐喻话语引起听者的注意,让其产生关联期待,听者首先想到的信息就是言者意欲传达的意图。

总之,关联理论为解释我们如何理解隐喻和隐喻过程中的认知能力提供了复杂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隐喻的构建和理解是听者在特定认知语境下经过推理以寻求符合关联期待的临时概念的过程。

### 1. 推理

语言交际是指言者将自己的意图进行语言编码,听者对其语言编码进行解码的过程。尽管语言是主要的编码工具,人类交际主要依靠语言进行,但是通常言者编码的语言与实际的言者意图之间存在差距,特别是当言者使用隐喻时。除语言编码外,言者还可以借助手势或书写等明示行为来传达意义。听者在理解言者的隐喻或明示行为时不是通过对语言的解码,而是通过推理来理解言者意图的。不管是使用语言还是其他符号,人类的交际过程就是推理

的过程,推理的目的就是正确解读言者的意图。

H. P. 格莱斯认为,通常情况下,言者使用语言编码,听者需要同时使用解码和推理的方法来理解言者意图,而使用隐喻时例外,听者需要全部使用推理<sup>[14]</sup>。与 H. P. 格莱斯的观点相反,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并不例外,所有的人类交际都遵循同样的过程,即言者提供一些证据、语言或手势等明示行为,听者根据这些证据、语言或手势等明示行为和语境来推理言者的真实意图。

关联理论提出两大原则,即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是指人类认知倾向于获得最大关联,交际原则是指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sup>[15]</sup>。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语句或明示交际行为只有必需的足够关联时才值得听话人付出认知努力,而推理是人类获取事物间关联性的方法和途径,关联理论强调推理在交际中的重要性。推理不仅在隐含层面而且也在明示层面进行。推理为获取言者意图提供了保证,而交际原则和最佳关联假定是推理的基础。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字面意义、松散使用和隐喻是一个连续统。连续统是指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夸张、近似表达和隐喻等现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对它们的解读方式相同。因此,隐喻的推理过程和一般语言的推理过程一致,且都是在线解读。对明示内容和蕴含的解读假设是平行进行的而不是线性进行的,二者同时协调,当达到听者的关联期待时处于稳定状态。例如,以下两个例句分别呈现了字面含义和隐喻含义,二者的推理过程一致。

(1) Peter: For Billy's birthday party,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some kind of show.

Mary: Archie is a magician. Let's ask him.

(2) Peter: I've had this bad back for a while

now, but nobody has been able to help.

Mary: My chiropractor is a magician. You should go and see her.

例(1)中的“magician”指的是字面含义,即进行魔术表演的魔术师;而例(2)中的“magician”则是用的隐喻含义,表示的是“通过施展魔法具有超能力的人”,语义范围发生了扩展。对两个例句的理解和推理经过了以下过程:首先,听者解读言者的字面含义;其次,产生关联期待,激活推理假设;再次,得出符合关联期待的隐含结论;最后,得出同时具备明示内容和推理内容且符合关联期待的解读。

为了解读言者所说语义,满足最大关联推定,听者必须通过消除歧义和指称派定等手段,在显义层面丰富解码的语句意义或提供语境假设,产生语境推理和认知效果,从而在隐义层面补充说话人的语句意义。在此过程中,听者遵循使用最小认知努力达到满足关联期待时就停止的路径。也就是说,听者会自动对语句产生关联期待,使用最小认知努力,得出足够的推理,产生关联性。因此,对隐喻的构建和理解涉及使用较少认知努力、产生足够推理、满足听话人的关联期待、丰富显义内容、满足最大关联推定、构建符合语境的语句意义等方面。

## 2. 认知语境

关联理论的隐喻观是建立在词汇语用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词汇语用学强调语境的作用,认为词汇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概念不一定与词本身的编码概念相同。词汇语义学研究词汇的编码意义,而词汇语用学研究在特定语境中词汇的表达含义。关联理论认为,认知语境对语言的理解至关重要,对隐喻的理解同样重要。隐喻含义是词汇意义在使用过程中随时调整(扩大或收窄)的结果。隐喻含义、字面含义和夸张含义等是一个连续统,中间没有明晰的边

界,且意义解读机制相同。

关联理论认为,认知语境即人们所知道的一系列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听者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形成用来处理新信息的认知语境<sup>[16]</sup>。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归属于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言者话语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者所识别,这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显映或互相显映。认知环境互明是交际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认知语境会对语句的解读产生影响,在听者心中形成某种期待目标,以目标为导向的回溯推理会加快解读过程,提高结果的预测率。D. 威尔逊和 R. 卡森<sup>[17]</sup>认为,语境推理通过改变语境假设和蕴含,可以影响相互理解过程,满足听者的关联期待。连续统观点认为,隐喻和其他语言的松散使用,如近似表达和夸张等,都会出现浮现特征。听者对语境假设的选择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在交际过程中,言者总是提供相关的假设,听者也总是以最小的认知处理努力选择最具有可及性的语境假设来处理言者提供的假设,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认知语境是获取推理的前提和来源。语境的选择对话语的关联性有直接影响。言者故意或非故意说出一句并不十分关联的话,听者必须扩大语境范围来寻找最可能的关联,从先前的语篇或之前的推理中记忆起额外信息,或来自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例如:

(3) Robert is a computer.

例(3)中的“computer”不是指词汇的编码意义或字面意义,而是指在交际和解读过程中产生的语义范围扩大的临时概念,即指“与电脑有相同百科知识特征的人”,如处理信息

精准、缺乏常识直觉和人类情感等特征的人。因此,例(3)中言者的语句蕴含意义是 Robert 处理信息精准或缺乏人类情感等,具体选择哪种语义需要视特定语境而定。如果给例(3)添加了例(4)和例(5)两个不同的语境,那么“computer”在这两种语境中的隐喻含义就是不同的。

(4) Is Robert a good accountant?

(5) How good a friend is Robert?

在语境(4)中,“computer”激活的是与语境相一致的“百科知识”,与“最好的会计”语境一致的是“电脑”的“处理大量信息且具精确性”语义;在语境(5)中,与“好朋友”语境匹配的是“电脑”的“缺乏常识和人类情感”等语义。语境不同,激活的语义就不同。根据关联理论,词汇语义是为了满足关联期待而随语境随时调整的,该调整是即时的、在线的、动态的。

### 3. 临时概念

“临时概念”这一术语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L. 巴萨卢<sup>[18]</sup>提出,指听者在对语句进行理解的过程中由于语用目的而临时构建的概念,即听者对词汇意义进行推理和在线建构时对语义的调整所带来的意义扩大或收窄。词义的扩大和收窄是对词义动态解读的结果。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言者使用的词汇编码概念中蕴含了非词汇的言者意图,听者在语用过程中基于词汇编码概念在线推理出言者的真实意图。临时概念即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为特定的关联期待而临时在线构建的概念。关联理论认为,词汇意义的调整目的是要满足关联期待。由语境和认知效果共同调整得出的显义不仅需要经过歧义消除和指称派定,还包括编码概念的调整。言者用词汇编码概念表达出非词汇编码概念<sup>[19]</sup>。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言者使用的词汇编码概念中蕴含了非词汇的概念或原子概念,该原子概

念因为与词汇编码概念享有同样的逻辑和百科语义,所以听者在语用过程中可以基于词汇编码概念在线推理出言者的真实意图。词汇有逻辑语义和百科语义之分,而临时概念体现的就是语义的百科性。因此,临时概念并不是由语言编码的,而是在具体语境中为寻求最佳关联而在线动态构建的结果,是人类概念认知能力灵活性和创造性的体现。

临时概念的构建包括词义的扩大和收窄,体现了人类概念认知能力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在不同语境中为不同目的,人类可以从长时记忆中整合各种信息形成不同概念。对语言意义进行构建和理解的过程同样适用于隐喻。隐喻理解的过程也涉及语义的扩大或收窄,这种意义理解的语用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平行进行的。例如:

(6) Caroline is a princess.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例(6),“princess”的逻辑语义是指“女性皇室成员”,仅从逻辑语义出发并不能构建出“宠溺”的语义。听者通过百科知识,即“有一些公主是被宠溺的”,可推理出该句的语义是“卡罗琳是被宠溺的小姑娘”。对例(6)中隐喻的理解过程是,将“princess”的逻辑语义收窄之后构建出临时概念。在推理过程中,编码概念被不断调整,直到与言者意图有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被创建。触发语义收窄或扩大的机制是关联性,即以最小认知努力满足听者的关联期待;通过给编码概念语义增加相关语境百科知识,增加明示内容,丰富编码义,进而得出蕴含语义。以编码概念为起始点,推理出与言者意图有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一旦该推理为言者和听者互显,听者推理过程完成。

### 三、结语

有关隐喻的研究历史久远,一直以来都是

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从原来的修辞角度转向认知视角,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机制解释到关联理论的交际和认知解释,隐喻研究的深度不断加深,研究视野逐渐开阔,研究方法日趋科学。从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视角解读隐喻,可以把认知语言学忽略的语境和交际因素考虑进隐喻研究的范畴之内,是对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补充性研究。关联理论强调推理、认知语境和临时概念在隐喻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隐喻、字面意义和夸张等语言现象是一个连续统,对它们意义的理解机制别无二致。听者对言者发出的隐喻语句产生关联期待,运用推理机制,寻求符合特定认知语境的临时调整的语义,最后创建出符合言者意图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未来的隐喻研究应注意跨学科的理论融合,既要注重学科共性,也要彰显学科个性;应扩大隐喻语料的研究类型,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应注重实证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

### 参考文献:

- [1]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M] // COLE P, MORGAN J.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2] CLARK B. Relevance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4.
- [3] GIBBS R, TENDAHL M. Cognitive effort and effects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Relevance theory and psycholinguistics[J]. Mind & Language, 2006(3): 379.
-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 [5] 张巨文, 蒋永久. 认知语用学视域下的隐喻解读: 以 G7 峰会报道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90.

- [6] 陈新仁. 语言隐喻的来源域理解: Deirdre Wilson 和 Raymond Gibbs 的对话评议[J]. 当代语言学, 2015(2): 204.
- [7] 张辉, 蔡辉. 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 外国语, 2005(3): 14.
- [8] 何奕娇.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 外语学刊, 2007(5): 78.
- [9] TENDAHL M, GIBBS R.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releva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1823.
- [10]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33 - 140.
- [11] MORENO V.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and emergence [J].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04(16): 297.
- [12] 张亚非. 关联理论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3): 9.
- [13] 范振强. 关联理论视域下的隐喻研究: 问题与展望[J]. 外语学刊, 2019(2): 16.
- [14] BIRNEER B.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92.
- [15] SPERBER D, WILSON D. A deflationary account of metaphors [M] // GIBBS R W.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4 - 105.
- [16] 苗兴伟.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 1997(4): 7.
- [17] WILSON D, CARTSON R. Metaphor, relevance and “emergent property” issue [J]. *Mind & Language*, 2006(3): 404.
- [18] BARSALOU L. The ability of graded structure in concepts [M] // NEISSER U.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1 - 140.
- [19] CARTS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322.